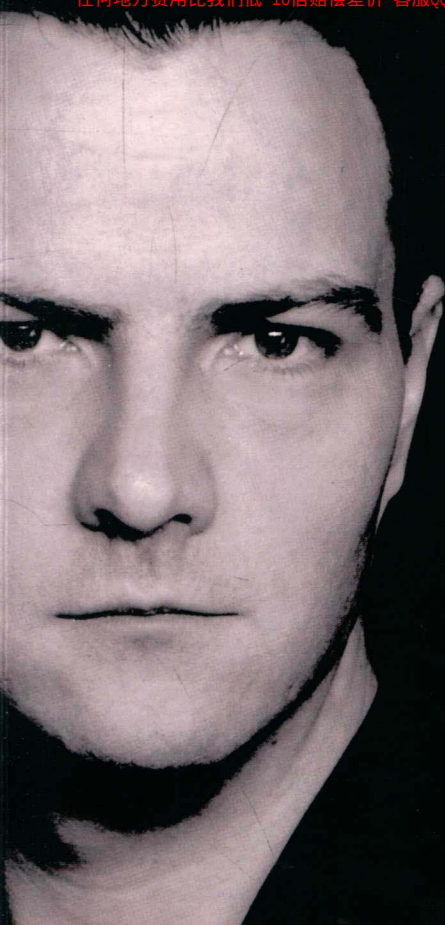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法」热罗姆·凯维埃尔·著 袁汇林·译

# 我不是 魔鬼交易员

法国兴业银行欺诈案当事人自述

# L'ENGRENAGE MÉMOIRES D'UN TRADER

南海出版公司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L'ENGRENAGE  
MEMOIRES  
D'UN TRADER

# 我不是魔鬼交易员

法国兴业银行欺诈案当事人自述

〔法〕热罗姆·凯维埃尔◎著 袁汇林◎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是魔鬼交易员/[法]凯维埃尔著;袁汇林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2.4

ISBN 978-7-5442-5791-6

I.①我… II.①凯… ②袁… III.①金融-事件-法国  
IV.①F83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948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158

Copyright©2010 by Jerome Kervie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na Jarota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我不是魔鬼交易员

[法]热罗姆·凯维埃尔 著

袁汇林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 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出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http://www.readers.com.cn)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聂敏

特邀编辑 彭展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内文制作 文辉伟业

印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150 千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791-6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名声不是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大衣，可以随意抖一抖、扯一扯；名声是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牢牢地长在身上，仿佛一层皮肤，刮破一点儿，蹭破一点儿，都会鲜血淋漓。

——歌德

谨以此书，  
献给我坚强而慈爱的母亲，  
献给永远活在我记忆深处的父亲，  
献给自始至终一直支持我的亲友们，  
献给许许多多陌生的朋友，你们感人的文字帮助我度过了  
了艰难的考验。



## 作者的话

两年多以来，数不清的记者、银行家、政客与律师相互纠集，往我身上泼脏水，使我名誉扫地；而我始终克制自己，保持沉默。这本书的出现，将打破这种沉默。

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最后的审判即将到来，这是对我未来命运的判决，更是对整个银行系统的判决。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将我一步步引向深渊？我将借此机会，如实一一道来。

我将重新回顾由普通职员到交易员的曲折历程。

2007年，我为兴业银行挣到了15亿欧元的巨额利润；短短一个月后，2008年初，形势却急转直下。本书将再现这段时间里发生的种种事情。

我将向读者揭示交易大厅光鲜外表之下的真相，展

现交易员世界的怪异景象，讲述一个无耻的行业如何从员工身上获取利润，又如何在危急时刻将他们撤下，弃之不顾。

2000年8月，我第一次走进拉德芳斯区那幢气派的大楼，我绝想不到，摆在我面前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8年后，我迈入预审法官的办公室，也绝想不到，在那儿，冤屈并不能得以昭雪。

我希望公众能从本书中看到银行界的真实场景，看到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自己的过错，但不愿为疯狂的金融系统埋单。

热罗姆·凯维埃尔

# 目 录

## 危机

- 1 风暴前夕 /3
- 2 15 亿欧元——福兮祸所伏 /22
- 3 大卫迎战歌利亚 /56

## 银行大楼

- 4 交易厅内幕 /87
- 5 正式交易员 /116
- 6 自由与放纵 /148

## 司法裁决

- 7 拘留 /171
- 8 监牢 /217
- 9 预审 /239

## 附录 /279



# 危 机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 风暴前夕

我从没想到，一切会来得这样快。2007年12月24日至2008年1月24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从圣诞节温馨的家庭氛围中惊醒，深深地陷入了一场荒诞的金融风暴中。眨眼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骤然置身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而另一方面，金融行业的种种内幕骤然在公众面前展露无遗，整个行业谎言弥漫、岌岌可危。

事情发生之前，我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我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对我的操作满怀信心，银行的利益是我唯一的准则。然而越是如此，当危机爆发时，由此产生的打击就越沉重。我不愿意为我的职业辩护，也暂时不想谈多年来我在兴业银行的工作情况。这场危机差点将我击垮，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对周遭世界的看法。现在的我已经理清了头绪，我要先讲讲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

2007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下班后，我和女友乘火车前往布列塔尼，同行的还有我的哥哥奥利维尔和他的妻子。我们要回老家探望母亲，一起过圣诞节和新年。这是我们多年来的老习惯，虽然房子很小，但是全家人终于得以团聚，所以家里的气氛总是非常热烈。我们兄弟二人都在金融行业工作，对我们俩来说这更是一个难得的假期。一年半以前，71 岁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想起父亲我们多少有些感伤。但总的来说，我们觉得幸福、安宁。

我们家在布列塔尼大区蓬拉贝镇，离坎佩尔不远。我记得那几天天气有些凉，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非常快乐。可以说 2007 年最后的这几天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为静谧、祥和的日子。我的身边都是我深爱着的亲友，我的嘴角挂着笑意。我怎么也想不到几天以后，一场惊天的风暴将会落在我的头上。我更想不到，如今两年多已经过去，我仍然不能从中脱身。现在想来，那几天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的好时光，与随后到来的灾难正好形成了天差地别的对比。

2007 年圣诞节，我的心境与往年有些不同。因为



节日休市的缘故，那几天没有同事和上司的来电（例如“我该在什么点位买进”、“我是不是该抛出”、“我是不是该持股观望”，等等），我终于享受了一个完整的假期。除了轻松之外，那几天我的心里还无比的得意。原因是离岗休假前，我为银行挣到了难以想象的巨额收益。据我统计，当年全年我获得的收益高达 15 亿欧元。可以说自从我 2000 年 8 月初进入这家银行以来，这栋位于巴黎拉德芳斯区的著名大楼的交易厅里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巨额的收益。最初我在这家银行从事的工作与股指交易无关，直到 3 年前我才意外地被选入神秘的交易员队伍。短短几年后，我在这一行已经干得相当不错，同事们常常向我打听消息，学习获利策略。

15 亿欧元的收益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它远远超出了老板此前给我设定的实际上已经相当高的业绩指标。其次，我所在的团队里交易员平均每年完成的收益最高为 800 万至 1 000 万欧元，也就是说我在 2007 年下半年拿下的这 15 亿欧元的收益已经超出人均收益 100 多倍。我的心情总的来说还是平静的，有了这 15 亿欧元，我将来的操作就多了一层缓冲垫，我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正因为如此，我当时非常希望从这项

异常丰厚的收益中挪出一大部分，放到下一年的收益数据里去。2007年，上司给我制定的业绩指标是1 000万欧元，合算下来，这15亿欧元相当于150年的业绩指标。算算另外一笔账，我更觉得目瞪口呆，照眼下的金融市场行情，这笔收益仅利息一项每年就高达7 000万欧元。简言之，摆在我面前的这笔资金，单凭它的利息收入，就足以保证我完成每年的任务，直到我退休。

当然，这些都只是梦想而已。上司制定的业绩指标在不停地飙升，2005年的指标为300万欧元，到2008年已经升至5 500万欧元——上涨了1 700%。也就是说，我为银行挣得越多，银行就会为我制定更高的指标。而与此同时，我的业务范围却被显著地削减。此外我明白任何预测都无法抵御市场行情的波动。我也知道我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不可能指望把手头的钱存起来应付将来的艰难时局。尽管未来无法逆料，但获得这么高额的收益，还是足以说明在同事与上司的帮助下，我的果敢作风结出了胜利的果实。而且，即便说作为交易员我可能还不成熟，但这项收益仍然像是我未来职业道路的一张安全网，让我觉得安心。

不过，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必须先把这笔收

益的大头挪到 2008 年。其实这种做法在金融行业早就司空见惯了。用交易厅里流行的话语来说，这叫“把钱藏在地毯下”，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常常只说一个英文单词：“carpet”（地毯）。操作方法就是把业绩“藏”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我的顶头上司从没有对这种操作提出过异议，我甚至有时就此和他做短暂的交流时，连“藏”起来的具体数额都不用汇报。交易员和上司对此均习以为常，只需简单的暗示即可。藏钱已经是金融行业的惯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没有人捅破这层纸。某位交易员曾经隐瞒了所在团队的业绩，当一位负责金融监管的上司问起的时候，团队中的同事纷纷回答说他们“贼喜欢”这种操作，他们说：“因为我们保守，喜欢存钱……”而这位上司还觉得这种回复相当有意思。“保守，喜欢存钱”，倒也确切，因为这种操作确实是把一部分业绩存起来，留到下一年，只不过是  
通过计算机系统，采用虚拟的方式而已。

上述有关我业绩的种种情况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因为这笔钱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入账的收益。不仅银行会计账目上有据可查，甚至已经进入银行的流动资金。在计算机系统中交割结算之后——稍后我将详细介绍整个

操作过程——这笔 15 亿欧元的巨款便已经真正进入了兴业银行的会计账目和账户中。整个 2007 年，类似的大额数目频繁出现，我早已习以为常。这次的金额虽然空前巨大，却也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在这种情境下，我怎么可能有任何的担心呢？各级上司没有就此给我任何的警示。提醒我这样操作可能会给银行带来风险？那就更不用提了。

在交易员中间，上级设定的授权资金权限早已形同虚设，我和同事们习惯于自由、灵活掌握，“眼不见、人不管”，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当然，账面盈余激增的时候，头儿们照例要给大家一些鼓励：“怎么样，取款机还行吧？”（潜台词：“挣钱了吧？”）每当此时，我也总是打趣地回复：“挣大发了。”（潜台词：“盈利丰厚。”）还有一种更为“风趣”的恭维话：“干得不错，你今天可真是个抓钱手啊。”每天结算时，如果利润让我的上司们欣喜若狂，这些轻浮的俏皮话便脱口而出，我曾经听过多少遍啊！挣钱总是让人雀跃，而潜伏在背后的风险呢？没有半点的告诫、没有丝毫的忧虑、更没有人提醒交易员注意规程。大家尊奉的操作策略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自己冒最大的险，为银行挣最多的



钱。有了这么一条原则，连最起码的谨慎小心也被抛诸脑后了。交易大厅里日日上演着金钱的盛宴，交易员们的地位却如底层妓女一般低微下贱：挣一天钱，得一天好脸色。“抓钱手”，久而久之，我对这种措辞渐渐麻木了，只要能替银行捞钱，我就是无比幸福的。

年末时，我的业绩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自然，我持有的头寸也较平常数额更高。但是，会有人去惩罚一位刚刚挣回 15 亿欧元的交易员吗？再者，有这么一位交易员，他的指标比我的高 5 倍，而截至 2007 年年终收盘前期，恕我冒昧透露，他的业绩仅为 5 500 万欧元，居然也能申请领取高额的奖金！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我都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我竭尽所能为兴业银行的利益努力工作，从未考虑过个人私利。无论那些数日后向我身上抹污泥的人如何腹诽揣度，一直以来，我全部的心力与激情都只倾注在了一件事情上，那就是我的工作。我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当然，这是后话了……

就这样，新年当天（星期二），我返回巴黎。假期休整之后，我精神饱满，心情放松，预备星期三早晨重新开始上班。我急于回到银行位于拉德芳斯区的总部大

楼，急于见到银行的同事。我尤其想早些见到瓦歇尔·梅斯金和塔乌非·齐齐，他们也是交易员。我们共用一张办公台，负责同类型的产品，慢慢地成了朋友。重新拾起工作中的一些习惯，我觉得非常开心。此后，工作便按照惯例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每天早上我总是7点钟前后就赶到兴业银行总部，先了解亚洲市场的走势，追踪前一天晚上收盘的美国市场上某些产品的情况。而后，我查阅报刊，上网搜索，查看我跟踪的公司有没有遇到重大事件。做完这些之后，我真正的工作才正式开始。

兴业银行使用的交易软件系统是内部自主开发的。它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若干参数全天自动发出买入或卖出指令，当然，这些参数的范围由交易主管来决定。可以说，这套系统不仅是交易员的基本工具，同时也是银行的第一级监控平台。我们交易员都叫它“自动处理机”。每天早上，我都要向“自动处理机”里输入各种各样的定价参数。这一步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接下来，我得赶在9点钟欧洲市场开盘前查看初始报价，以此分析市场走向。然后，我开始为我负责的产品做买入或卖出的定价，同时还要即时跟踪市场的波动状况。这项工作通常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要当好交易员，必须



头脑清醒、观察细致，并且反应敏捷。这是交易员必备的素质。

公司提供的工作环境非常便于工作。普通大众对交易厅的印象多来自于电影中的场景：人声嘈杂、沸反盈天，让人疑惑在那样的条件下怎么可能安心工作。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当然，刚进入这一行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那时候我在6楼的交易厅上班，大厅里摆着一排排的办公桌，桌上放满了电脑。交易员们眼睛紧盯着显示屏，嘴边总挂着麦克风，整日里一边发布买卖指令，一边不停和电话那头的人联系。人人歇斯底里，躁动不安，连邻座说了什么都听不清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交易员除了发布买卖指令之外，还要和很多人保持即时沟通。普通民众不知道，有的交易员只负责向大户出售银行发行的金融产品，例如权证（即“购买或卖出的选择权”，后文中我会详细说明）。业内称他们为“操盘手”，他们和普通的、直接运用银行资金进行投资的交易员在工作性质上有很大区别。操盘手的工作非常紧张，我就是操盘手中的一员。

2007年年初，我所在的金融衍生品部门飞速发展壮大，所以搬到了楼上一间新修的大厅里。新大厅容纳

了1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是散户型交易员，负责将银行资金用于各种投资。这一点和我所从事的操盘手工作完全不同。前面我已经讲过，我们操盘手的服务对象是机构投资者，而不是散户。和从前的交易厅一样，新交易厅也是开放式的，办公桌上同样满是电脑，连墙上也装满了显示屏。不同的是，新交易厅里几乎总是一片寂静。

我说一件小事，你应该就能明白了：由于我习惯了旧交易厅的嘈杂，新交易厅启用当天周围那么安静，我差点错过了开市。正因为新交易厅非常安静，此后我再也不用盯着墙上的挂钟等待开市，我只需要留意周围交易员用的报时钟就行了。久而久之，这也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我交代了这么多细节，并非是不着边际的闲谈。相反，这些细节对于了解我的案情来说非常重要。我所在的工作环境井然有序，非常安静，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响动都逃不过周围人的耳朵，任何举动也都逃不过邻座同事的眼睛。

事发后，兴业银行误导司法机关和公众，声称我违规进行秘密操作。这种说辞是多么荒唐可笑。首先，如上文所述，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我根本不可能“秘密操

作”。再者，部门的人员设置非常严密，所谓“秘密操作”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我所在的小组由 8 位交易员组成，大家共用一个工作台，彼此的电脑显示器相距不足一米。离我的座位大约两米远，就是我们顶头上司的位子。顶头上司名叫埃里克·科尔代勒，按照公司里的习惯，同事们都叫他“n+1”。埃里克 36 岁，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sup>①</sup>，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总是穿着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西服，表情严肃。

他有 13 年以上的金融市场从业经验。入行之初，他从事的方向是风险控制，负责评估交易员的暴露风险等级，而后他被调入我所在的部门，并在此工作了 8 年，其中 4 年他曾被派往东京，担任一个金融管理小组的领导。2007 年，他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每天制定一份交易报表，也就是说每天核准动用的金额和各人的业绩，如果涉及的金额超过一定界限，他还要作出批注。他的批注总是非常简明扼要，甚至有些不着边际，比如“交易正在进行之中”，这姑且还算是一句整话，但是显

---

<sup>①</sup> 法国四大名校之首，被誉为“法兰西的骄傲”，为法国培养出一大批社会精英。——译者注

然意思很模糊，又或者用德语署上“spiel”（意思是“赌博”，银行内部用这个词表示投机操作）。他的这些评注既不能说明业绩情况，也无法体现相关的交易策略。报表完成后，埃里克会呈交给他的各级领导，其中包括马夏尔·鲁耶尔——我们的“n+2”。

马夏尔 37 岁，和埃里克一样毕业于名校，同样有着多年金融市场从业经验，表情同样严肃，不过到了星期五，他也学英国人的样子穿牛仔裤，不系领带。马夏尔手下有 3 个交易员团队，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他本人的位子距离我们的工作台不过 4~5 米。马夏尔和埃里克一样，负责的是风险控制。不过，埃里克的监管是纯技术性的，而马夏尔的监管幅度更大，他要关注的是各种交易操作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两位上司的监管层次虽然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不曾提醒我注意我的越权操作，我向他们上报业绩时，他们都不曾提出任何疑义。相反，看到我的业绩时，他们两个总是非常高兴。万一出现临时的亏损，我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隐藏起来，等待之后盈利时两相冲抵。我是这么做的，我的很多同事也是这么做的，直到 2008 年 1 月。实际上，连续 3 年，我经手的头寸在交



割时没有一笔出现亏损。

我很少与埃里克和马夏尔交谈，仅有的几次要么是汇报工作，要么是请求批示。我的同事们和他们的沟通更频繁些。是他们不愿意深究我的工作状况和投资方法吗？我只知道埃里克有一次这样说到我：“热罗姆很能挣钱，来年应该把他的策略推广一下。”

就这样，2007 年全年，我犹如置身五里雾中，看不清真实情况且浑然不自知，没有人提醒我，业绩使然！待到日后回首这段岁月，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我是多么天真可笑。我拼尽全力，倾心工作。我以为这样就够了，但最终却将自己逼到了绝境。后来陆续发生的事情表明，我的行为应当更克制些，我的热情或许需要浇盆冷水。但是当时的我心里是多么快乐啊！周围所有人给我的只有鼓励。虽然从 2007 年 4 月起我的上司曾多次收到监管部门的警告，称我负责的业务存在虚假操作。然而他们都不曾督促我停止交易，也不曾对我提出任何质询。

并非我一人如此，所有的交易员都不辞辛劳，勤奋工作。每天我们只偶尔离开电脑去喝杯咖啡或下楼抽支烟，以此稍稍缓解疲劳。中午我们很少离开交易厅去认真地吃顿饭，总是匆匆地把一块三明治咽下肚，午饭就



算是打发了。时光就这样在工作中流逝，相伴一路的是随业绩状况一道起伏不定的心情。我和其他同事一样，盈利时难掩狂喜，亏损时急于发泄。鼠标飞速点动之中，我不止一次地体验过亏损的惨痛经历。

每天从上班时算起，10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下午5点30分是巴黎市场收市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天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负责的是衍生品交易，以纽约市场的开、收市时间为准，所以我们还要做次级市场上的报价。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交易所里工作最为繁重的人，一天工作13~14个小时，这对我们而言是家常便饭。其他交易员有的下午6点就可以关掉电脑回家，大部分晚上8点也就可以下班了。而我们呢，以我而言，我必须坚持工作到将近晚上10点，也就是华尔街市场将近收市时才能下班。下班后，我会和一两位同事到楼下我们常去的酒吧喝一杯啤酒稍稍放松一下，然后再找个地方应付一顿晚餐。

其实到酒吧喝那杯啤酒也算不上是放松，因为我们的谈话范围也无外乎就是工作，比如产品的市价行情和市场状况，谁亏了谁挣了。白天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交易，鼠标敲得山响，金额高得吓人，没有时间沟通。下

班后的放松说到底就是一起回顾一下白天的事情罢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仿佛是寄生在兴业银行身上的一个瘤子，我们靠它谋生，我们为它而活，结果是至高无上的兴业银行侵占了我们个人生活，而我们完全听之任之。即便是周末或者度假时，虽然空间上我们已经远离了拉德芳斯区的那栋大楼，但是总有一根无形的绳索将我们和兴业银行拴缚在一起。

凭着这条看不见的脐带，兴业银行把我们禁锢在它的怀抱之中，给我们滋养，给我们保护。我的住处是在纳伊<sup>①</sup>。通常零点甚至凌晨1点我才能到家，满身疲惫地瘫倒在床上，睡上5个小时的囫囵觉。早上6点钟，我一面洗漱一面通过LCI电视台了解新闻时事，随后乘地铁匆忙赶到拉德芳斯区。

我母亲住在布列塔尼，乘火车约5小时车程。我探望她的次数越来越少，一方面我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工作状态下我也实在没有勇气登上回家的列车。我的哥哥就住在巴黎，一直和我非常亲近，但是我

---

<sup>①</sup> 巴黎街区名，位于塞纳河畔，距离兴业银行总部所在的拉德芳斯区较远。——译者注

们如今也很少见面。家庭、家人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不知不觉中，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完全融为一体，混沌相连。兴业银行操纵着我的全部生活，主宰着我的整个生命。至于公司里的很多同事，一直以来我把他们当成朋友真心相待，倾注了很多心力，花费了很多时间。而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好心与热忱完全白费了，这些人算不得朋友。这一事实让我无比心酸，好几个月我都无法面对，无法接受。与此同时，我的亲人却因此被冷落在一旁，连我的女友也不例外。我们是在兴业银行认识的，彼此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们并不住在一起。原因之一是我们相识不久，还没有到同居的程度，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希望尽可能地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用在那些“朋友”身上。我渐渐迷失了自我，任由工作侵害我的感情生活。而这一切，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

很长时间以来，繁重而高压的工作让我疲于奔命，我甚至连回复答录机留言的时间都没有，儿时的伙伴、求学时的学友自然都渐渐疏远了。懵懵懂懂中，之前的朋友一个个离我远去，取代他们的是与我朝夕相伴、和我从事类似行业的新“朋友”。我们同时上下班，一起承担工作带来的喜悦和痛苦，我们像其他金融行业从业

人员一样，言谈之中总喜欢夹杂一些英语单词，比如“bull”（牛市）、“bear”（熊市）、“yours”（成交）、“mine”（我要买入）、“fat finger”（肥手指）<sup>①</sup>，等等。上班时，我们并肩在兴业银行的龙潭虎穴中鏖战，下了班或者周末的时候，我们还常常聚在一起整小时整小时地回顾工作时的情景，仿佛这样一来黑夜就不那么漫长，无趣的周末也骤然平添一点生机。我曾经练过多年柔道、常年坚持慢跑，而且感觉有无穷的热情，如今这些都被我放弃了。烟抽得越来越凶，觉睡得越来越少，吃饭只图对付。一周下来满身疲惫，只能指望周末的时候勉强放松放松。到了星期一，疯狂的节奏、炼狱般的工作轮回一样又将回到我的身旁。

等到深陷暴风骤雨之中时，我才幡然醒悟，往日里我所珍视的、我为之拼搏的那些东西统统都是虚幻的，我的种种努力也统统是徒劳的。我错看了人，在那些功利之徒的身上下了太多无用的工夫，对真正的亲友却关心太少。我的个性已经被剥夺，被扼杀，我变成了一个

---

<sup>①</sup> 金融界将证券操盘手因操作失误而导致重大损失的事故称为“肥手指”。——译者注



数字代号。我是如此，世上所有的交易员人人都是如此！兴业银行川流不息的过道里，拉德芳斯区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代号而已。这一番彻悟得来不易，这是几周后我身陷囹圄、周遭岑寂之时，从天而降的一记当头棒喝。银行总是向我们吹嘘自身如何强大，如何万能，仿佛规章、惩戒都已经成了多余。上司的职责仿佛就是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鼓劲，多么慈爱的上司啊，对我们无比信任！约束我们？那绝不是他们该做的事，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做主，由我们独自承担。交易时要不要有所限制呢？自己做主吧！工作氛围由此可知，如醉酒一般癫狂，如上瘾一般痴迷。有时工会人员发现某些现象违反了劳动法，会试图干涉，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倒不是各级领导从中作梗，恰恰相反，交易员和助理交易员们先就不干。他们觉得市场法则不光应该用在经济生活中，还应当借鉴到劳资关系里。

突破规章的束缚，不断突破规章的束缚！这就是我们的信条。经济世界里的规章要突破，其他一切规章都要突破！就让我们发疯般地工作吧，就让我们为银行挣越来越多的钱吧！接下来呢？管它呢！只要我们周而复



始不断地开价、卖出、买入，我们或许就可以创造更加惊人的天文数字。为了让银行这部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我们不得不付出这样的代价，而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之后，实际已沦为银行的奴隶却浑然不觉，梦想着以此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金融行业的运营公式：我们都成了“抓钱能手”，我们置身于地狱之中，并且我们热爱这个地狱。

## 2

### 15 亿欧元——福兮祸所伏

2008 年 1 月，各项业务重新正常启动。星期三我结束休假，返回工作岗位，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到了 1 月中旬，我开始感觉到隐隐的不安。上一年度，也就是 2007 年，我的操作策略一直稳定不变，但是即便如此有些时候我也曾吓得冷汗直冒，也曾抱着怀疑的态度重新推敲自己的策略。事实上上个年度我曾经连续 3 个多月账面存在大额的潜在亏损，我成功地用前台计算机系统将亏损隐藏了起来，并且成功地等到了市场转向，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冲抵了前期的损失。新年度伊始，我的分析表明市场将进入上升通道，所以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在我整个交易员生涯中，这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并制定这样的头寸，除了我自己的计算之外还有 3 个重要的外部原因。第一，我

认为由于金融危机即将到来，各国政府与央行将会很快作出回应并向经济体注入大规模的流动性资本，市场将因此重拾信心。之所以这么预测，我的依据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正是由于投入了巨额的资本，经济才最终重新腾飞。第二，众所周知，一般来说1月份都是多头行情，这与大型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有关。投资基金出于清理资产负债表的考虑一般都会在12月大规模抛售。然而新年到来时，奇怪的是投资基金的抛售策略却将市场拉高了。所以当时我一直期待着市场出现反弹。其后，市场的确如我所愿出现了反弹，但是出现的时机却晚于我的预计。第三个原因，年初时兴业银行的明星策略分析师曾作出过相对乐观的预测，他的原话是：“从理论上讲，目前还不能说我们处在金融危机的边缘。”

短期的实际情形却刚好与上面的种种预测相反，市场连续下跌。我账面上的潜在亏空一天天扩大，直至开始严重威胁到2007年底我已经斩获的收益。面对严峻的形式我别无选择：必须保持冷静，耐心等待市场的转机。

可是与此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无比忧虑，我无法保持冷静。就在这一段时间，也就是1月中旬，我渐渐感觉到财务监督员的从旁掣肘。我隐约听到一些流言，还时常听到有人躲躲闪闪地嘀咕什么，却又没有人

告诉我详情。不久，我从负责财务监管的领导口里得知，有人认为我上一年度的业绩有问题，上层的人正在设法解决。我一下子蒙了，完全摸不着头脑。挣了15亿欧元，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向我询问这样那样的情况。从他们的提问中我意识到，“有问题”的不是上年的收益本身，银行要调查的是我把收益“藏起来”了这件事。无论他们调查什么，我都觉得自己问心无愧。那一次的操作只是金额较往常高，其他方面和我平日的操作并无区别。

从2007年年初起，我一直是那么操作的，而且各位经理都是知情的。我记得当时我和同事们因超出资金权限，需要编造虚拟账目时，经理们发发邮件就解决了。他们总能找出办法，多数情况下甚至都不用和当事人的交易员联系。例如2007年7月，仅5笔交易获利就高达7.5亿欧元。如此不可思议的高额收益——仅仅5笔交易，我的收益就超过了全行3个月的获利总和——虽然由于动用的资金额度较大，银行有关部门有些吃惊<sup>①</sup>，但还是欣然受理了，没有丝毫疑义，没有任何质询。再举一例，在那两个月之前我用金融衍生品做了7笔虚拟

---

<sup>①</sup> 参见附录中的文件1。

交易，据财务监管部门核查，票面金额将近 80 亿欧元。提交给有关部门做会计结算时，面对这些天文数字的账目，他们略感不安之后也就大笔一挥，干净利落地注销了。还是一样，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分析其他邮件，不难发现每一笔操作背后往往都有这些部门的身影，交易员的举动他们一清二楚。

事件发生后，媒体把一切脏水都泼在我身上。事实上虚拟操作不是我注销的，我从来没有盗用他人的电子身份，我也根本不可能在财务系统和交易处理系统(后台)上进行任何操作。我唯一的罪过就是，我向银行系统里输入了虚假数据。但是请不要忘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么做，我的许多同事都是如此行事的，只是我的动作可能稍微大一些罢了。更何况这种行为是已经获得兴业银行许可的，这一点预审期间多位证人的证词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入侵财务系统或后台系统，更不用说在这些系统上删除或输入数据了。我所做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合法的，都是经银行批准的。我的过错在于，我在自己的电脑系统里和虚拟交易对手做反向交易，希望以此隐瞒风险。虚拟交易完成后会自动转入财务监管系统，等待其确认交易对手的身份。验证结束之前这些交



易都处于“未处理”状态。过一段时间(可能长达3个星期以上),这些交易信息将会由系统自动删除,无须监管部门过问(见下表)。

|                   |              |
|-------------------|--------------|
| 发件人: ×××          | 收件人: ×××     |
| 2007年5月30日 17: 57 | 抄送: ×××, ××× |
| 主题: 解决方法          |              |

你好:

这个月,我们又碰到了那些老问题,涉及以下这几笔交易。

这次的结账单中,我们已经把相关内容删除了,希望下个月你们能够想办法,避免这样的问题。

| 编号      | 账目         | 货币         | 金额               | 柜台号  |
|---------|------------|------------|------------------|------|
| 8390519 | 99949306   | 欧元         | 24 109 800.00    | 7003 |
| 8390523 | 99949306   | 欧元         | 2 648 149 679.09 | 7003 |
| 8429662 | 99949306   | 欧元         | 568 749 800.00   | 7003 |
| 8467432 | 99949306   | 欧元         | 914 336 656.50   | 7003 |
| 8471811 | 99949306   | 欧元         | 864 330 225.00   | 7003 |
| 8483621 | 99949306   | 欧元         | 819 172 469.75   | 7003 |
| 8487499 | 99949306   | 欧元         | 1 855 273 187.50 | 7003 |
| PTF 号   | 交易 ID 号    | 起始日期       | 结束日期             |      |
| WAR2A   | TOP1556433 | 2007-04-26 | 2007-05-18       |      |
| WAR2A   | TOP1556444 | 2007-04-26 | 2007-06-15       |      |
| WAR2A   | TOP1562111 | 2007-04-24 | 2007-06-15       |      |
| WAR2A   | TOP1480862 | 2007-04-03 | 2007-06-15       |      |
| WAR2A   | TOP1491460 | 2007-04-05 | 2007-06-15       |      |
| WAR2A   | TOP1531776 | 2007-04-20 | 2007-06-15       |      |
| WAR2A   | TOP1537673 | 2007-04-23 | 2007-06-15       |      |

另外,我们发现 TOP1205684 和 TOP1205936 两项交易存在误差,每项的误差额为 1 898 519.99 欧元。Clickoption 平台负责人员认为,

由数额来判断，这两项误差应当与他们没有关系。

我查验了海神应用系统，发现上述两项交易已经设置为“删除”，除此之外查不到任何信息。海神系统负责人员说，只有通过 Eliot 系统才能查到交易删除的日期。这类误差自年初起反复出现，希望贵处能够提供一些相关信息，或者告诉我该和哪个部门联系。

谢谢！

此致。

法国兴业银行投资银行部

（注：出于某种考虑，文中的某些人名会以×××代替。）

但是，这一次事情显得格外复杂。不久我听说会计部门想尽了办法仍然没能解决问题。可能正因为如此上司们日渐显得焦躁不安。我和几位顶头上司私下谈了一下，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银行的年度账目报表是在 12 月 31 日敲定的。我为了将上一年度的收益挪到下一年，在年末时做了违规交易，最终导致银行的库克比率失衡。所谓库克比率，是评价银行业健康状况的一个决定性指标，由库克委员会最先提出，并据此命名。该委员会要求银行应将其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价值的比率保持在 8% 或更高，其目的在于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防止出现流动性资本不足。银行的库克比率是需要对外公布并提交给稽核部门和国家监察部门的。也正因为如此，公司的会计监管部门才会那么惊慌失措。

老实说我对这种监管机制知之甚少，所以 2007 年年末也就是该财政年度结束时，我依然故我，沿用了以前惯用的处理方式。想不到的是到了 2008 年 1 月，已经来不及挽回局面了。银行的有关部门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在业绩报表中把这 15 亿的收益披露出来，就会带来纳税方面的麻烦；如果把这笔收入放到下一年度，当年的库克比率将会很难看，会和相关的规章相抵触。作为金融机构，银行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赢利，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保持谨慎，这笔钱就这样成了一个双重的难题，让人不知所措。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很快另一件麻烦事又接踵而至。市场上的坏消息一个紧跟着一个，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持有的头寸一天天恶化。我甚至开始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在紧急时刻把手里的头寸抛出去，我上一年的收益将全部被这一次的亏损给抵消。完全无法可想了！前期，为了挽回局势我一步步地加大风险，一步步地增加头寸，如今已经达到空前的 500 亿欧元。我的精心布局和谋划，如今全然白费。已经陷得这么深，即便算上我持有的准备金，亏损恐怕也是很难避免了。我仿佛一个走钢

丝的杂技演员，哪怕稍微迈错一步，哪怕一丁点风吹草动，我都可能瞬间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像往常一样，我顶着高压，双眼紧盯着显示屏，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够有所转机。但准备金很快就已全部用完，我已置身死地之中。

我一面努力克制内心的烦躁情绪，一面尽量冷静分析。我坚信 2008 年 2 月份将会出现技术反弹，而事实证明 2 月中下旬的市场走势正好印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可惜的是还没等到市场反弹我就被革职了，我持有的头寸也被我的继任者慌忙平仓抛售一空了。如果让我继续操作，结局会如此不堪吗？“事后诸葛亮”，像我这样对过去的事情“指手画脚”，人们可能会如此这般来堵我的嘴。于是，现在的我只好独自沉浸在往事中，做着种种推测。

就在我觉得周遭气氛持续紧张的当口，还有一件烦心事一直纠缠不休。在我疲于应付因去年隐瞒收益带来的问题和忙于处理目前的交易可能造成的潜在亏损的同时，我忍不住担忧这些事会让我的上司多么伤脑筋？我不知道确切的实情，但是对于每一个能读懂报表的人来说，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公司的规定，每天的虚



拟交易都必须提交给公司的一个部门进行风险和业绩的研判(交易员们一般把这个阶段叫做“缓冲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跟踪并核实当前的交易行为。所以说，我动用 500 亿欧元并且已经造成近 10 亿欧元的损失这一点，该部门应该已经查明。当时我本人并不清楚这些情况到底上报给了哪一级领导，而且又没有人和我说明，所以我只好在全然不知对方底细的状态下徒然地为自己辩解。情形非常微妙，我完全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如同置身层层迷雾之中，而且雾气越来越浓。

到了 1 月 17 日，星期四，情势陡然明朗起来。当天早上，我得知财务监管部门和会计部门的负责人碰头开会，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多的详情我就不清楚了。财务监督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我与他会面。晚上，我见到了他。这位负责人 40 多岁年纪，精明干练，专业知识非常深厚。我解释说，这 15 亿欧元其实是我从一个经纪人那里挪用的，所以不能算是收益，而应当算做外债。至于这位经纪人，我只说是交易过程中认识的，没有透露他的身份。眼下金融危机正在肆虐，我却借了 10 多亿欧元的巨债，而且债主身份他还不知道——这



些信息显然使他非常错愕，但他没有继续问下去。虽然面带难色，他还是安慰我说他“会想办法的”。从这一次的面谈中，我第一次听到“库克比率”这个术语，第一次明白了我上一年度的业绩给财务监管部门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当时我就在想，从2007年年初起，我就一直在和这个部门的员工打交道，一直以来是他们为我的交易提供担保的，而且从来没有说过二话。如今这些人抓住我上年度的业绩不放，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我觉得很费解。这位负责人还跟我提及了“清偿能力比率”、“账目会引发危机”诸如此类的话。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是照我看来这其实就是数据输入方面的一个极简单的问题而已。如果说这笔交易使银行系统的账目出现了异常，那只需要更改交易性质，确保库克比率不受影响，一切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上面这个疑问我实在想不通。我绞尽脑汁，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个为雇主挣了15亿欧元的员工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你说得对，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有一个财务监督员面带尴尬，摇着头这么对我说。我知道财务监管部门遇到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技术性的问题，可是其中原委我不太清楚。财务监管部门判断

风险等级的时候是不会将买进与卖出两项冲抵的，对他们来说交易中总共投入了多少资金，风险就是多大。照这种算法，银行潜在的风险自然就大得惊人。打个比方，别人欠了我 100 元，我又欠别人 80 元，一来一去风险不是 20 元而应当是 180 元。这种逻辑看上去有些荒谬，但是其实事情就是如此。对财务监督员们来说，交易涉及的绝对金额才是唯一重要的。至于说不同交易会带来补偿效应，会削减甚至消除风险，他们全然不予考虑。

通过和这位负责人的会谈，我了解到财务监管部门预备核查并修订账目。这倒是预料之中的。困难在于，其一，那几天银行正处于结账期；其二，由于交易涉及的金额巨大，监管部门的风险评判方式特殊(如上文所述)，事态又开始进一步恶化了。再者，银行内部对这笔 15 亿欧元的收益议论纷纷，流言甚嚣尘上，已经无法遏制。

好像嫌事态还不够严重一样，当天我又得知了一个坏消息：稽核人员将于下周一入驻兴业银行。财务监管部门不愿意将银行的问题呈报给稽核人员，因此急于赶在此前解决问题。这和 2007 年 4 月的事件如出一辙，

当时监管部门首次发现内部存在虚拟交易，他们就是采用的这种策略。然而，这一次问题太过严重，到此时已经为时太晚。这块烫手的山芋最终会扔到谁手里呢？我所在的交易厅是兴业银行响当当的一张王牌，如今却出现了账目异常、库克比率失衡。稽核人员一旦介入，那么交易厅光鲜外表下隐藏着的种种运营内幕就有可能被揭开。银行领导为此忧心忡忡——风险实在太大了。国王原来一丝不挂，周围的人目睹一切却谨小慎微地装糊涂！如果这些事情公之于众，媒体会如何宣传？银行家会作何反应？政府当局又会如何惩治？

第二天是星期五，紧张的气氛又上升了好几度。我刚刚走进交易厅，就有人通知我去和另一位领导做新一轮的面谈。这位领导来自业务部，负责税务方面的问题。我的回答和前一次一样。我解释说，我的收益账目被抵消了，因为我和一位经纪人签订了其他合约，至于这位经纪人的身份，“缓冲区”部门正在调查。领导沉默不语，面谈氛围非常尴尬。很显然，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话说回来，无论我怎么回答他都不会满意吧！账目是假的——我的上司们其实早就知情，后文我会再证明这一点。我想象得出大老板们得知真相时会如何吃

惊。当然，也有可能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把自己牵扯其中。

这之后再也没有人理我。于是我回到电脑前，像平常一样继续工作。看得出整整一天银行领导一轮一轮地开会。级别越来越高，先是我的  $n+2$ ，马夏尔·鲁耶尔先生，最后连  $n+6$ ，银行各营业厅的总头卢克·弗朗索瓦也出动了。要知道，卢克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过，会议一轮又一轮地召开，我这个当事人却完全被撇在一边，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强烈。中午一过，马夏尔·鲁耶尔把我找去，语气非常强硬。用他的原话来说，他要我告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般的要诈有什么作用呢？个中情形我的各级上司早在上一年4月份起不就已经知道了吗？当时，马夏尔和他本人的上级接连收到两封来自会计部门和财务监管部门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说，我通过虚拟交易获得了9400万欧元的虚拟收益。既然早已知情，如今又如此惺惺作态，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们俩的嗓门都越来越高：他心知肚明却不断质问；我不便针锋相对只好勉强婉言作答。此前一天，我已经跟马夏尔和埃里克·科尔代勒二人谈过。我向他们坦承，我的若干交易给财务



监管部门造成了麻烦，影响了银行的库克比率。然而实际上我的工作性质本身已经注定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主要从事的是“有组织的投机市场”而不是“自由市场”。大家担心的信贷风险主要是在“自由市场”产生的。

不久，早上见过的负责税务问题的领导又来找我。他要求我把我的交易对手，也就是巴德尔证券公司的名字删除，换上“待查”的字样。我立刻猜想到银行里一定有人联系到了巴德尔公司，要求其证明确实和我做过交易。巴德尔公司一定是拒绝了，所以现在才有人来要求我删去名字，用意在于避免走漏消息。一句话，改成匿名，把账目捂住，如此便万事大吉了。作伪的要诀是要浑然天成、不露痕迹，领导们作出这样的决议不正说明这一点吗？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轮番的会议，哪一场都没有我参加的份。我继续做我的本职工作，最近市场持续走软，交易越来越艰难——这方面还好，而交易厅无法捉摸的气氛才是让我难以忍受的。所以下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去找埃里克·科尔代勒，希望探听一下今天事情的进展。他的言辞亲切、缓和，他让我放心地去度周末，似乎事情已经渐渐缓和，有解决的希望。



埃里克陡然一变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古怪，想再了解一些详细情况。于是我去找另外两位上司，一位是马夏尔·鲁耶尔，一位是我的 n+3，菲利普·巴布兰。他们说我的某些交易确实给银行高层出了个难题，但也有好消息，交易厅的老板卢克·弗朗索瓦刚刚已经宣布后期的监察将并不扩大化，只准备做一个内部的审计，主要针对某些特定的交易——也就是 2007 年底我为了把 15 亿欧元收益挪至下一年度而进行的交易。

于是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如果能避开全面监察，这就好比一场大火得到了控制。剩下的任务就是根据审计员的指导对持有的头寸作出合理解释，而后删除或者修订账目。整个事件就可以在银行内部消化掉了。从交易厅的角度来说，此举可以避免外部人员介入，只要没有人在交易厅的信息录入系统和交易监管系统里东翻西找，交易厅的秘密也就保住了。

几位上司所讲的这一切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我心头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虽然我还不知道技术人员具体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但我坚信他们一定能成功地解决问题。就这样我无比轻松地走下楼去，准备到大楼下面的“文艺复兴”酒吧和几位同事聚一聚。

一周的工作已经结束，周末即将到来，大家都很放松。我们谈到白天工作的事，在场的同事中有人参加过白天轮番的会议，他们再三宽慰我，让我不必担心。接着又说到周末的计划，我告诉大家我和女友准备明天一早前往多维尔<sup>①</sup>，为我庆祝生日。同事们都很高兴，大家还为此干杯。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马夏尔·鲁耶尔打来的。他告诉我说，让-皮埃尔·穆斯蒂尔本人亲自出面，要求立刻联系交易对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巴德尔证券经纪公司确定我经手账目的真实性。我的脸都吓白了。我觉得事件顷刻之间又回到了原点，两个小时前那些信誓旦旦的许诺随着这通电话灰飞烟灭。让-皮埃尔·穆斯蒂尔不是别人，他是投资银行的主管，法国兴业银行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布东的左膀右臂，所有的交易员都受他管辖。此前我甚至根本没有机会与他接触。现在他亲自接管，说明这件事已经惊动了高层，银行的高管们也已经介入了。马夏尔问我：“你和巴德尔有联系吗？”我的声音苍白，都有些颤抖了：“你也知

---

① 法国西北部海港城市。——译者注

道的，我和他们没有联系。”电话那边的马夏尔显然也很局促不安，片刻的沉默之后他接着说：“我们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祝你周末愉快。”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默然挂断了电话。为什么我的顶头上司要任由事态扩大，甚至于惊动公司的大佬们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们这么手足无措、失去控制？何况时间这么短？疑问一个接一个蹦出来，没有答案！我们徒然地想控制局面，宝贵的时间一点点流逝，最后一切还是白费，可能最终某位高管——甚至就是让-皮埃尔·穆斯蒂尔本人——还是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便我仍然自我安慰，以为我的顶头上司会替我遮掩，恐怕也已经无济于事了。真希望多维尔清新的空气能帮助我摆脱愁云，理清头绪。

2007年年底的这15亿欧元已经让我焦头烂额，别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就在这一天，我发现市场急剧下跌。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开始传导至欧洲的金融机构。我持有的头寸状况本来已经相当恶劣，受这一轮下跌的波及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到周五晚上，情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新出现的亏损不仅耗尽了我此前积累的盈利，还落下了一些亏空。当然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所

以也就没有人对此担心。短短两周市场暴跌了 6~7 个百分点，简直可以算是一场小规模金融危机。这两天里各样的问题轮番轰炸使得公司内部气氛焦虑不安，而现在在外部环境又急转直下。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看不清前景如何。周末的生日庆祝是我和女友早早就定下来的，这是我此时唯一的宽慰，1 月 11 日时我满 31 岁了。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就在这个星期五又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兴业银行的领导们会因此更加不安，而我的案件也将因此变得更加棘手。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由于金融风暴爆发在即，同时业内对法国银行业投资风险的疑虑加剧，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瓦耶要求所有银行于下周一早晨提交资产负债表。恐慌、骚动顿时席卷整个法国银行业，市场随即持续下跌。业内人士担心披露银行账目可能暴露行业内潜在的丑闻。好多天以来各种流言甚嚣尘上，最为引人遐想的一条说的是兴业银行由于信贷衍生品投资失利，损失了 50 多亿欧元。此后我又了解到，就在克里斯蒂安作出上述命令的两天之后——也就是星期天，兴业银行董事会曾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策略，审核次日要提交给法兰西银



行的文件。

我那 15 亿欧元的收益，我意图掩藏收益编造的账目，自然也都在提交的文件之列。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一场飓风之中。风起云涌，一切才刚刚开始。如果我早些知道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让-皮埃尔·穆斯蒂尔会突然那么忧虑。鉴于次贷方面的投资出现了亏损，我们的这位主管先生不惜一切代价，希望确认我的这笔收益属实。或许他担心法兰西银行横插一腿，让局势更难收拾；又或者他打算用我的收益抵消一部分次贷方面的亏损。

冬日的多维尔，感觉不太惬意。气温虽然还算高，但是当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一整天都没有停。冰冷的雨水打在身上，寒意透骨。上午 11 点钟左右，我们刚刚住进多维尔郊外的一家小旅馆，就接到马夏尔·鲁耶尔打来的电话。他说让-皮埃尔·穆斯蒂尔需要确认交易对手的信息，要我把电脑的登录密码告诉他。这样的要求不仅突如其来，而且非常不同寻常。我提交了密码，心里非常担心巴黎那边的态势。

过了一个小时，马夏尔又打来电话。由于信号不好



没法正常通话，我匆匆说了一句：“告诉我一个号码，我一会儿给你打回去，我这就回旅馆。”回到旅馆后我立马打电话过去。马夏尔说为我转接银行领导的电话会议。与会的很多人以前甚至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话。会议的中心仍然是交易对手的身份问题——这些天来围绕这个问题我接受了多少质询呵！我仿佛一个踽踽独行的盲人，全然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谁，但是从他们的话语中我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满腔的疑惑：像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交易员，怎么可能签发了15亿欧元的外债，对手又到底是什么人？想必让他们费解的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吧：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交易，下面的那些中层领导竟然瞒天过海给遮掩过去了，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花招？我沿着这个思路说下去。我本人已经身处旋涡之中无法自拔，如果我说出全部实情，那么所有人也都会牵扯进来。我们面临这么一个悖论：要么我说出实情，这等于说我把一笔天文数字的资金借给了一家外部机构，而兴业银行竟然两个月都无法确认这家机构的身份；要么我隐瞒实情，这就等于说我成功获取了一笔可观的收益！

有两件事让我在参加电话会议的时候特别心神不宁、惶恐不安。一件事是近期我在期货市场上持续亏

损，虽然此刻一些高层领导还不知情，但是我自己清楚，再想把前期的收益通过账目公布出来已经是来不及了。有一位领导还这样暗示我，挣 15 亿欧元，过 20 天左右再拿出来。操纵巨额的资金，翻手成云、覆手为雨，却又举止轻灵，仿佛把玩一个忽上忽下的悠悠球！金融业之外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吧！另外一件事是与我对话的都是未曾谋面的顶级高管，其中有几位私下里被大家称为业内“杀手”。一旦事态难以收拾，他们是很有可能痛下狠手的。所以说，局势越扩大化，我就越不知道如何应付，直至举止失措、词不达意。平时在交易大厅的时候，同事之间非常友好，笑脸相迎自不必说，而且一般都用“tu”<sup>①</sup>来彼此称呼，如今这一切也都派不上用场了，毕竟高管和基层交易员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总之情形非常糟糕。如果说上面还只是我自己的估计，那么至少马夏尔·鲁耶尔的措辞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干巴巴地甩出一句“谢谢你的解释，一会儿再联系”就匆匆挂断了电话。这场电话会议，也是我和公司高层

---

① 法语中，彼此用“tu”称呼说明双方关系密切；用“vous”称呼则表示关系疏远。——译者注

的第二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高管们没有让我闲太久。我和女友正要去吃午饭，手机又响了，还是马夏尔·鲁耶尔。马夏尔说高层要再开一次电话会议。我的手机已经差不多没电了，所以我跟他说我马上回旅馆，再给他打回去。我刚刚挂了电话，手机又响了。这一次是交易厅主管本人打来的。这一通电话并没把电量耗尽，因为他的话很简单，就两句：“没法确认和对手交易的真实性，所以你说了谎。”“没错，为了隐瞒收益嘛。”我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那头已经下了命令，要我马上赶回巴黎：“主管们都在开会，你马上回来。”我回旅馆收拾东西，上了第一班回程的火车。这个周末本来是想放松一下的，现在就这样结束了。后面等着我的，将是一场噩梦。

回巴黎的途中，我不停地作着各种推断，我突然感到非常的恐惧。其实我只不过是通过虚假交易隐瞒了收益，但是银行的老总们显然不相信，他们唯一关注的是眼前的亏损。那些交易本身的性质比较微妙，难以界定，但我预感银行老总们还是会因此惩处我，因为纸包不住火，我毕竟多次打破过交易权限，而且幅度非常之

大。说起来奇怪，我压根就没想公司会不会炒我的鱿鱼。我尽量客观地分析事态，慢慢的我有了一点信心。我想关键还得看后面怎么和老总们谈。我又想到一个情况，心里又放松了几分。其实此前的几个月我的上司们曾多次收到警告，说我的账面上存在虚假交易，也就是说他们是知道个中情形的。为什么做虚假交易？为什么在虚假交易里动用大笔资金？这些问题，每一个了解金融市场业务的人心里都是清楚的，算不上是什么秘密。简单来说，我之所以能够做成这些事，是因为别人听之任之，他们是我的同谋。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和女友回到了巴黎，天已经快黑了。为了给我一个惊喜，这次出游女友此前精心策划了很久。不料几通电话之后我不得不匆匆返回，不仅糟蹋了她的一番心血，而且还累她为我的事担心。我的心里非常不好受。我给哥哥打了电话，想请他帮我照顾女友。可是女友情愿回自己的住处等我。我故作轻松，尽力安慰她，但没有用，她仍然很紧张，而我的心里也觉得前途未卜。

下午6点左右，我走进了兴业银行的大楼。此间马夏尔·鲁耶尔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可能是为了确认我



动身没有。他甚至还和交易厅主管卢克·弗朗索瓦一道到楼下接我。“欢迎”的队伍已经如此可观，可见楼上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阵容了。这之前老总们背着我说东道西，气氛想必比较沉闷吧。现在我来了，面对面辩论，甚至针锋相对的厮杀即将开场了。

走进交易大厅的时候，我看见大厅后面的黑影里坐着 10 来个人，看不太清楚。我想可能是我不认识的银行领导吧。他们带我进了一间小会议室，会议室四周装着玻璃的隔断墙，所以会议室里面的情况外面看得清清楚楚。漫长的讯问开始了。股票与衍生品交易主管皮埃尔-伊夫·莫尔拉、马夏尔·鲁耶尔、卢克·弗朗索瓦，3 人轮番上场，对我狂轰滥炸。问题的核心是我做了哪些交易、我是怎么隐瞒交易的、我的交易对手的身份，诸如此类。恍惚之间我仿佛觉得自己变成了刑侦故事中的某一个角色。我面前的 3 位虽说都是金融业人士，可他们的手段之高强，与电影《36 总局》<sup>①</sup>中的警察们好有

---

① 《36 总局》是 2004 年上映的一部法国电影。片中，两大警察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彼此间明争暗斗。警察们为侦破案件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打击犯罪的同时自己也常有意无意地触犯法律。——译者注



一比。他们一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唱白脸，同情与权威并用，殷勤和威胁交织，同一个问题可以变换方式问上许多次，为的是要看看我会不会说走了嘴，前后对不对得上。他们仨可真算得上是专业的警察了。后来我出席听证会时才知道，交易大厅后面的那堆人都戴着耳机，这次会议的内容他们一字一句听得分明，而且还录了音作为证据。当然，当时开会的时候是不会有人告诉我这些的。

我并没有太慌张，我把自己的投资策略和盘托出，一一道来。我以为马夏尔·鲁耶尔可以帮我澄清一些事实，可他却赌咒发誓说他一无所知。我觉得很愤怒：“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你嘴上是什么都没说，可心里一清二楚！”马夏尔无话可说，转身出去了。会议室里只剩下卢克·弗朗索瓦一个人。同样的问题卢克又接着问了好几个小时。其间陆续还有一些银行高层接替上场，展开车轮战，这里面有让-皮埃尔·穆斯蒂尔，还有斯拉沃米尔·克吕帕。

斯拉沃米尔·克吕帕是卢克的办公室主管。让-皮埃尔·穆斯蒂尔是投资银行部首席执行官，我和其他交易员的顶头上司。让-皮埃尔 48 岁，典型的金融业高管形象，从业经历非常辉煌。我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解释，

上年 12 月我其实为银行挣得了 15 亿欧元的收益，这笔钱早已汇入了银行的流动资金之内，所以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收益。我费尽了口舌，可是这些高管们坚持认为除了这笔收益之外，我的账目里还有亏损。他们似乎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所谓的“亏损”给挖出来。

争辩越来越激烈。起初卢克本人一直耍着拘留所里才有的那套把戏，一会儿威胁我，一会儿佯装亲近。后来他突然向我坦承“他自己做次贷交易的时候也做过一件大傻事”。他的意图再明白不过：这种事情谁都可能碰上，热罗姆，说出来吧，犯个错也没什么好丢脸的。我没有做过傻事，所以我依然没有改口。而且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声调也上来了：“他妈的，我什么错处都没有，我就是给你们挣了 15 个亿！”

讯问一直进行下去，一轮又一轮，越来越辛苦。我感觉累极了，我渐渐有些迷糊，不知道面前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直接问了出来：“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呀？事情都摆到了明面上，我早就交代清楚了，你们还要怎么样？”慢慢的，一个念头出现在我脑海中：他们想炒我的鱿鱼就大胆地炒好了，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这样假惺惺的做戏了。我跟他们说要去洗手间，让-皮埃尔

陡然间变得非常慈祥，说要和我一起去。他叫我“别做傻事”，又说“事情还得继续查下去，我离不开你啊”。这从天而降的关切真是让人记忆犹新，我都有些受宠若惊了。我请他放宽心——因为我是绝不会“做傻事”的。有位女士走了过来，自称是银行的保健医生——看来让-皮埃尔还是不放心的，专门找了人监督我。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挺好，谢谢关心。

几个月以前别的部门的一个同事因为类似的事情自杀了。想必高层现在担心我也会那样决然地撒手而去。他们想错了，我没有打算自杀，甚至等到事情渐渐明朗我有可能当场被解雇时，我也没有动过那样的念头。我真正受不了的是他们耍的那一套套把戏：一遍遍地重复同样的问题、毫无依据地泼脏水、白脸突然之间换成红脸……等我们两个人回到会议厅后，一堆堆的问题又劈头盖脸地向我甩了过来。

高层为什么态度这么激烈，这么急于在我身上找出问题呢？直到那天深夜我才弄明白。那还是让-皮埃尔本人给我透的底。他说星期一他得向外界宣布银行的次贷投资出现了巨额亏损，这个消息一抛出整个金融市场都将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对兴业银行市值的影响将难以

估计。他还告诉我星期天下午董事会曾召开会议研究此事。“你也知道的，这么个关口上要是你真的挣了15亿欧元，那可真是救了大家的命了。”

说完这些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我把亏损的账目藏到哪里去了。我竭力向他解释真的没有什么亏损，我确实隐瞒了账目，但是隐瞒的是15亿欧元的收益。只要查一查我的账目中保证金的实际收支记录，一眼就能看出这笔钱绝非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的。通过保证金记录其实可以很容易地追溯交易的整个过程。银行在期货市场进行投资时，保证金账户每天都要根据潜在的盈利或亏损进行入账或出账。由于保证金账户是记名的，因此只要调查这个账户就可以最终找到相关的交易员。

听了我的话，银行高层终于理清了头绪。一番调查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我名下的账目里确实没有亏损——这一点我一天之前就已经说明，而且此后又一遍一遍地向他们解释。当然，这一通调查还有另外一个发现。他们整理我全年的交易记录时，发现我持有巨额的头寸。不过他们没有说什么，更没有责问我——这一点和我的顶头上司们的态度不谋而合，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都知道我的头寸状况，一直只字未提。



谜底揭开了，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各种疑惑一时间无影无踪，一切仿佛都明朗起来，再也没有人围着我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接下来的一幕颇为荒诞：我们的银行股权与衍生品部共同主管卢克·弗朗索瓦，不久前还纠缠不休，认为我在说谎，眼下手舞足蹈地冲了过来，满腔喜悦难以抑制地说：“太离奇了，我从没有听过这么精彩的事情。好家伙，挣了15亿欧元，悄无声息地瞒着我们。前所未有啊，开眼了，开眼了！”那架势，好像再激动一点他就要开香槟庆祝了。

再往下同样的荒诞不经，如同梦幻一般：刚才还气势逼人的高层领导突然七嘴八舌地向我讨教交易策略，甚至要求我下周一当场展示一下。我一下子被弄懵了，心里还有一丝丝的满足，迷迷糊糊之间答应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片刻间摇身一变，担负起了给交易厅高管作培训的重任。总而言之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屋里挤得满满的，到处都是人。不知道是谁甚至建议在部门内部为我建立一个基金，为我的投资策略创立一个推广机制。不久之前我还独自承受着长达数小时的狂轰滥炸，如今又俨然成为了舞会上耀眼夺目的主角……

但是我本人却并不觉得如何高兴。甭说高兴了，这



会儿我连疲惫也感觉不出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马上赶回去睡觉。临走的时候让-皮埃尔·穆斯蒂尔又和我说了会儿话，把周围的欢乐气氛冲淡了不少。他说出了这种事不便留下我继续在交易厅干下去。他接着话锋一转，态度相当慈爱，一再地说：“如果说你真的挣了14亿多欧元，虽然说眼下你不能继续在兴业银行干下去，但凭着这份业绩你完全可以到别的地方找碗饭吃。比如说你可以找一家基金公司。因为如果你真的挣了这么多钱，那说明你干得非常棒，说明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交易员。好交易员可不多见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干的这个事情吧，是给公司添了些麻烦，但是完全不要紧。你自己得放宽心。”接着他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我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我说，2008年你手里没有握着那么多头寸吧？”我的回答有些含混不清：“嗯，有一点。”他当即警觉起来，第二个问题紧跟着当头劈下：“明天你能来一下吗？”我没有回答。短暂的欢乐时光过去了。兴业银行又一次对着我张开了血盆大口。

我按照女医生的要求签了一份免责声明，而后带着满身疲惫离开了银行大楼，准备到女友的住处去。已经差不多是早上3点钟了，直觉告诉我等到天放亮，等待

我的又将是异常难挨的时光。我回忆着这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所有的交易报表都是存底的，都有据可查，上司们即便想说毫不知情也是说不过去的吧？很显然，眼前的问题不是我的上司们知道什么，而是他们想把自己摘干净。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快 10 点的时候，我赶到了交易厅。几个小时前的欢乐气氛已经荡然无存。我立刻意识到前一天晚上无比荣耀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早晨乘地铁来拉德芳斯区的时候，我一再地安慰自己说，高管们关注的是 2007 年的交易状况，而 2008 年的不在考查范围之内。完全是不着边际的空想，其实内心深处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一步一步朝兴业银行走过来，一路上我虽然不能十分确定，却隐约预感到等待我的肯定是兜头一盆凉水。我所料不错。前一天夜里我回家之后，高管们继续在查账。他们很快就发现我在 2007 年取得的收益已经被后一年的潜在亏损抵消的一干二净，他们为之雀跃不已的 15 亿欧元已经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伙计，你挣的钱又被你全部赔出去了！”交易厅主管之一，克里斯托夫·米亚纳当头来了这么一句，语气很俏

皮——干我们这一行的，天塌下来都得用这种语气。于是乎，我又花了两个小时向他们解释我目前的头寸状况，解释我采取的策略，解释说我希望未来几天或几周市场出现回暖。但是，我突然感觉到对高管们来说一切辩论都已经结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再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权限，而且幅度比上一年还要大。一切都清清楚楚了。

高管们彼此心照不宣，已经达成了攻守同盟——我的顶头上司们对我的交易状况一无所知，因此也就完全不可能为我的行为提供掩护，不可能是我的同谋。这样一来，要想维护银行纯洁无比的光辉形象，就只有把我送上祭坛。卢克·弗朗索瓦三言两语对我做了一番交代：“星期一不用来了，不许和以前的同事联络，确保我们能够随时联系到你。”高管们默默地走出会议厅。马夏尔·鲁耶尔又转身回来，气冲冲地问我：“到了这个地步，你打算怎么办？”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沉默着，摇了摇头。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此前，他还可以抵赖推脱——“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情，所以说我根本没有打掩护”——眼下这一招再也不管用了。他低声说：“我也不知

道该怎么办了。”而后转身离去。好日子过到头了，马夏尔一定在这么想。

跟马夏尔一样，其他银行高管们的处境也会十分尴尬：要么承认自己无能，对我的交易状况预先没有察觉；要么承认自己也伙同参与其中。无论如何，从前的光辉形象都是保不住了，怎么才能脱身呢？出路只有一条：既然前面的事情不太光彩，那就来一场大清洗，把所有的痕迹通通洗掉。臭名昭著的黑社会组织是这么做的，其他冠冕堂皇的机构也是这么做的。

此后几个月，马夏尔和几位高管被辞退，为他们此前的缄默不言付出了代价。与我同组的3位交易员也遭解聘。至于其他的直接负责领导，他们仿佛从银行组织架构中消失了，有的被解雇，有的被调走，整个过程风平浪静，没有一丝的骚动。卢克·弗朗索瓦离职了，股票与衍生品交易主管也离职了。我想他们或许没有等别人把自己扫地出门，而是主动请辞的。这些人后来都找到了非常显赫的职位。兴业银行平时没有严格要求提高内部监管的效率，而等到出了问题要剪除病枝烂叶的时候却又表现得非常谨慎、非常高效，而且非常的大方。那股子慷慨劲儿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以上面说到的这些

人为例，他们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失误遭到解雇的，然而其中的某些人居然还领到了数目惊人的补偿金。

我想起很久以前兴业银行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布东的一番豪言壮语。2006年2月，丹尼尔·布东和银行职员做过一次网上聊天，他说：“财政稽核是银行的重要支柱，稽核不仅是纪律的体现，也是银行组织结构的保障，同时还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如果说此前财政稽核形同虚设，那么我会亲手把它创建起来。”无论是从提高银行机构的效率出发，还是从维护社会正义出发，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希望丹尼尔·布东先生从现在起真正投身其中，完成这项高尚的使命。



# 3

## 大卫迎战歌利亚<sup>①</sup>

一句话都没说，我离开了银行大楼。我急着去找女友，我知道她一定忧心忡忡，饱受折磨。时至今日，我试着回忆经历巨变之后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我感觉非常吃惊。说来奇怪，就在那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并没有如何的为我将来的命运担心。不错，对兴业银行而言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内心深处我仍然保有一份信心、一份镇定。当时我想，无论怎样，我都不可能碰到什么太大的麻烦。我确实是犯了一些错误：我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我往计算机系统里输入了虚假信息，我试图掩盖自己的收益和亏损——一句话，我玩火了，银行系统因此面临崩溃的危险。但是，请再看看周

---

① 大卫迎战歌利亚是西方文化中正义战胜邪恶、弱小者战胜强敌的典型形象。——译者注

围的情况吧，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同事们的所作所为和我完全一样，而这一切公司高层都一清二楚。各级主管，无论是  $n+1$ 、 $n+2$  还是  $n+3$ ，还有负责内部监管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十分了解我的头寸状况，但他们都不置一词，为我隐瞒。再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银行挣钱，绝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这一点他们也是无法否认的。

前后一想，我坚定了信念：真相最终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交易带来的后果或许还需要我来承担，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事情有变，承受风吹雨打的总是底层的员工，主管们一贯是缩在后面的。但是，承担后果之后呢？兴业银行和全球其他金融交易机构一样，只要能够赚钱，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谁敢把这张牌翻过来？谁敢把种种弄虚作假的把戏公之于众？谁敢一面承受公众的责难一面投身虎口之中，与一个个金融监管机构，与贝尔西<sup>①</sup>甚至与法兰西银行周旋？一套制度运行失常，不应该简单地归罪于某一节铰链的缺失，而应当到那长

---

① 贝尔西街区位于巴黎第十二区，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的办公大楼就位于该街区。——译者注

长的一串链条中去找原因。然而，银行界奉行的是更为简洁、更为片面的法则：挣到钱的就是有理的，会受到百般的呵护与照顾；亏损的就是有罪的，将会被无情地抛弃。

就这样，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女友的住处，头脑一片混乱。连日来冰火两重天的塌天巨变、一场又一场漫长却又毫无结果的辩解早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4个月之前，也就是2007年9月，一位同事曾经暗地告诉我，我的一位上司非常了解我的投资方式。这位同事接着又说，只要不出麻烦，这位上司会一直“了解我的投资方式”，可是一旦有了变故，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位同事其实是在委婉地警告我，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留意。话说回来，当时我怎么可能想到这些呢？那个时候我的交易一直都是盈利的，我甚至自认为是“战无不胜”的——当然那个阶段我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一直源源不断地为银行创造着利润。眼下，在这么一个黑色星期日再次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痛苦不堪，为我的天真轻浮后悔不已。渐渐地，我重新镇定下来。银行里应该还有许多书面证据，都足以证明我的上司们早就知

情。这些证据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有这些证据在手，无论如何他们也没办法抵赖。

克里斯托夫·米亚纳的一句话就颇值得玩味。周末的时候，他曾经对其他高管说：“这一年里我们支付了这么多保证金，可有些说不过去啊。”显然，这位银行高管感到非常恐惧。甚至于不久之后我的预审法官也没忘了指出这一点，数字就在那里摆着：短短一年时间，仅保证金一项，兴业银行在热罗姆·凯维埃尔的账户SF581上追加和提取的总金额就高达近300亿欧元。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预审期间很长时间内我一直不同意把其他人牵扯进来。这些书面材料本身不就是如山的铁证吗？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有些怪异荒诞，读者稍后就会看到。一方面，兴业银行多次自相矛盾，频繁变更证词，这一点本身就应当足够引起预审法官的关注；另一方面，那么多的材料都可以为我的供述提供有力的证明，而预审法官居然丝毫不予采纳。

上面这些事情还不是我最为担心的。那个黑色星期日，我一直惦念着我手里持有的头寸。当时我手上的头寸数额非常庞大，而且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潜在的亏损一天天在加大。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任由上司把

我的交易账户转交给别人来做，我和别的交易员一样，对自己负责的账户寄予了深厚的感情，账户仿佛就是我的孩子。再者，出于保密的需要我不能跟任何同事见面，我手中头寸的构成情况、我预先设计好的策略、我制定的交割日程安排，这一切也就没办法及时告诉他们。种种思绪不停地在我脑海中盘旋，我突然从云端直落下来，顿时清醒了。这一次我冒的险太大，手里的头寸金额太高，我被数字和工作的激情冲昏了头脑，却没有人提醒我让我刹一刹车。

我和女友说了一会儿话，尽可能地安慰她。然后我们和哥哥、嫂子碰头，一起到歌剧院街区喝酒。他们3个人都很为我的将来担心。我自己心里明白，除非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不然我在兴业银行的职业道路就算是走到了头，起码我的上司是一板一眼这么对我说的。接下来无非是等待后面的一些手续：银行先寄来一封挂号信，接着一次正式的面谈，最后就是最终的解雇程序。或许他们还记得先前的承诺，真会帮我在银行之外找一个工作？走着瞧吧。有个同事打来了电话打听我的消息，言谈之间显得挺着急。自从上周四起银行内部就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我的传闻。我说话非常谨慎，既没有



说那两天的经历，也没有说我被停职的情况。同事没有接着问下去，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眼下我和兴业银行里的人交往越多，将来就越不好向上司们交代。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事情还可以挽回呢？再说万一周一早上开市上行，我手里的头寸扭亏为盈呢？一切都有可能。

不久，我们回了家。经过了前面那些紧张时刻之后，这一场小酌无疑让我放松了些。疲惫、一次又一次的回忆、反复追问犯下的过错、绵里藏针的诘难，这一切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我终于沉沉睡去，感觉累极了。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合眼了。

星期一早上，又一个噩耗从天而降。巴黎股市当天开始暴跌，CAC40 指数<sup>①</sup>一路走低，到收盘时竟下跌 6 个百分点。下跌原因是亚洲市场上形成了一种恐慌情绪，并且已经蔓延到欧洲市场。后果非常严重，用交易员之间的行话来说就是股市“狂吐不止”。无边的恐惧

---

① 巴黎 CAC40 指数是法国重要的股价指数，由 40 家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构成。在法国，CAC40 被视为基准指数，反映法国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和整体情况。——译者注

再次席卷我的全身。我持有的头寸原本就有一定的亏损，这一轮的下跌无疑又将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很明显，兴业银行有可能会被套牢，而我最后的一点希望也随之完全破灭了。我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股市的这一轮下跌该不会是银行操纵的结果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真是自个儿挖坑自个儿埋了。如果此前银行已经开始卖出我持有的亚洲市场头寸，那么无疑会刺激下跌走势，银行自身遭受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我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如果银行把我的头寸全部抛出，那么亏损总额将高达近 45 亿，与上年 15 亿的收益相抵，亏损还将在 30 亿左右。起码来说，如果仓促卖出一定会出现这种惨剧。

金融市场上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古老法则：只有交割之后才谈得上亏损——因为只要头寸还压在手裡，那么所谓的亏损都还是潜在的、隐性的。但是万一银行为逃避新一轮的下跌仓促平仓止损呢？要知道，金融业业内还有另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过分小心谨慎可能招致更为惨痛的亏损，一轮下跌之后紧跟着可能是新一轮的下跌。眼下如果为了避免大额亏损而骤然在市场上抛出高达数百亿欧元的头寸的话，那么新一轮的下跌简直是不可避免的。我忧心忡忡，一会儿听听法兰西新闻

台，一会儿又看看 LCI 电视台，像困在笼中的狮子一样，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

有时，我的心里又会升起一丝希望，最后的一丝希望。因为周一的时候华尔街尚未开市，所以成交量应该相对微弱。这样来看估计兴业银行不会犯糊涂把我的头寸抛出，否则如果在那么小的市场上抛出巨额的头寸，市场肯定会瞬间崩溃的。除非银行慌了神，那可就难以预料了。可想而知，那天晚上我忧心如焚，彻夜难眠。

兴业银行当时到底如何操作的呢？我一直到此后预审期间才知道实情。根据负责平仓的交易员的证词，当时的原则是“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完成赎回操作。后来我曾经和这位老兄当面对质，他提到了一些细节，我才明白其实是兴业银行自己把亏损的口子撕得那么大。银行方面自然声称负责平仓的是银行的明星交易员，是业内的一流好手。这么说倒也算得上有道理。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问题，交易员自己也承认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经手的是什么样的交易。他甚至还以为自己是在执行某位大客户的交易指令呢。再说说这位交易员的操作方式，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曾经 3 天之内 5 次突破交易记录的限额。我听到这里简直惊呆了。像这样胡闹不等于

在市场那扇摇摇晃晃的破门上再踢上几脚吗？市场的信心本来已经不足，这么操作简直是存心想要市场崩溃。

此外我还了解到周四发布的公报上，兴业银行撒了谎。这又让我大吃一惊。兴业银行管理层和法兰西银行行长等均对外高调承诺，说平仓操作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其实并非如此。上面提到的那位明星交易员起初就和别的交易员坐在同一个交易厅里，抛售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移到了另外一个交易厅。稍微了解一点交易厅状况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交易是瞒不住别人的，只要一两分钟消息就会不胫而走。银行这么做的目的，出发点是为了使所有的交易员步调一致，避免抛售的同时有人下单。换言之，是为了防止别的同事也“沾上”。

让我吃惊的还有平仓操作持续的时间。星期四，也就是1月24日，兴业银行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布东曾对外宣布，说所有头寸都已完全平仓。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法庭对质时我了解到，整个平仓时间不是银行声称的3天，而是5天。也就是说当银行对外宣告亏损时，银行根本没办法给出确切的亏损数额，因为当时平仓还在进行。



星期二，市场仍然是开市就走跌。我浑身冒着冷汗，感到非常不安。我已经不敢再去估算亏损额。话说回来我也完全没办法估算。兴业银行那边在做些什么？已经平仓了吗？还在持仓观望吗？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只好胡乱猜想。当天晚些时候，由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宣布调低基准利率，市场随即小幅上扬。然而，好景不长，很快跌势再次重现。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下午，我收到我所在部门一位交易员发来的短信：“刚刚知道你的事情，勇敢些。”这是好多天以来第一次有同事和我联系。我判断我的遭遇已经公之于众了。此后，我得知银行高层在星期一早上已经向员工透露了些风声，他们说：“热罗姆这些天不会来了，得想法子把他手头的工作做下去。”大家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从字里行间之中也读懂了高层的意思，那就是：保持缄默，不准多嘴，不准走漏消息。计算机部门也介入了，我的上级让他们冻结了我所有的交易许可证。

星期三早晨，行情继续走低，跌势略有放缓。看来我期盼已久的反弹今天又没有指望了。这几天我一直不错眼地盯着电脑屏幕跟踪市场走势，偶尔站起身在屋子里转圈或翻看各种经济类报刊。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不久以前，我还和同事们朝夕相处，可以说他们就是我的全部的社交圈子。如今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听不到半点和银行有关的消息，我感到很孤独，同时也越来越为我的前途担忧。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女保健医生的电话。自从我离开银行之后，这个医生每天都要和我打一两个电话，有时候问问我的近况，有时候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没完没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断然拒绝，心里觉得极为不快。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领导之所以这么“关心”我，纯粹是为了避免银行出现新的变故。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交易员被公司停职之后试图自杀，势必将对社会舆论造成负面影响。于是乎银行领导委派专人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打个电话，一会儿问我好不好，一会儿说要和我见面聊一聊，一会儿又说要见面为我检查身体。但是星期三早上8点钟的这通电话和之前的截然不同。首先来说，医生的语气变了：急促，紧张，还透着点担心。“银行明天要发布一个与你有关的重要公告，”电话那头的医生显然非常局促不安，“你得赶紧走，离开巴黎，走得越远越好。手机要换掉，别让人找到你。我可以给你弄到火车票……”她又打听我在什么地方，说

想见我，有事情要交代，又跟我讲离开的时候行为举止上要注意什么。我当场拒绝，并且很快挂断了电话。我已经懵了：连珠炮一般来这么一通，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和兴业银行的人没有了任何来往，还有什么必要公开发布什么公报呢？情势诡谲难辨，我在心里做着种种猜测，觉得十分疲惫。

我立马给哥哥打去电话，说了刚刚发生的这件怪事。哥哥叫我尽快到伦敦去，去找他妻子的兄弟。听了哥哥的主意，我仿佛受了电击一般。老板让我逃走我就真的逃走吗？这简直一点道理都没有。我如果潜逃，只能称了某些人的心意，没有其他任何好处。我顿时清醒了。虽然我还不知道兴业银行第二天准备发布什么样的公告，但是他们的那点把戏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我如果一命呜呼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倘若我踪迹全无有可能就正中他们下怀。当事人潜逃，这本身就胜过所有的指控，这个人简直就可以认定为罪犯了。我镇静下来，跟哥哥说我不去伦敦，哪儿都不去。逃跑，这是兴业银行希望看到的，所以我绝不能这么做。当务之急不是逃跑，而是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应对。

我得找位律师。

我跟哥哥讲下午想到他家里去。我已经一个人独自过了两天。我非常需要和他谈一谈，我不能再一个人闷着了。我又打电话给母亲，请她第二天（星期四）到巴黎来找我们。母亲在老家只能从新闻节目中看到只言片语的报道，估计还不能完全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事实上当时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波及面会那么广，反响会那么强烈。

哥哥推荐了一位熟识的律师，让我跟她联系。这位律师叫伊丽莎白·梅耶尔，是劳动法方面的专家，擅长处理解雇纠纷。我打了电话，但是没有和她联系上。她的助手让我给她发邮件介绍一下情况。我当即照办。傍晚时分，梅耶尔律师回了电话。她分析了当前的情况，话语虽然简单但让我很安心。她说照我提供的信息来看，我很有可能被立即辞退。她叫我收到解聘书之后立即和她联系，好尽快组织反击。我再三致谢后挂断了电话，心情十分复杂。下午保健医生打来的那通电话是那么离奇、诡异，几个小时过后就变成了一场单纯的劳动纠纷吗？谁信哪？

晚上8点钟左右，哥哥嫂嫂为了让我散散心，约我和女友出去吃饭。饭馆就在他们的住处附近，里面挤得满满的，到处都是人。入座之后，我茫然地看着周围的

人，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当中。饭馆里人生嘈杂，奇怪的是我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我心里想，再想要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顿饭恐怕要等很久以后了，这最后的一顿晚餐我得好好享用。时至今日，那种感觉仍然记忆犹新。我竭力地控制着自己，可是头脑完全不受控制，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明天到底要发布什么样的神秘公告。在此之前我最担心的只是市场走势，而到了这个时候我又不得不想到即将发布的公告的内容，不得不考虑我将来的命运。三重作用之下，我心中的压力骤增。于是这一天晚上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9点钟左右，手机响了，是SFR公司<sup>①</sup>发来的新闻时事短信。一行行文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恍惚之间，我一时没有读懂短信的意思。消息是爆炸性的：兴业银行披露巨额诈骗案，涉案金额达到空前的49亿欧元。看来之前传闻的银行公告终于发布了。从短信的内容来看，兴业银行把我描述成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犯，他们说我为了一己私利使我的雇主蒙受了巨额损

---

① SFR 是法国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SFR 为用户提供时事、体育、股市、星座等各类短信定制服务。——译者注



失。我惊呆了，愣愣地看着手机屏幕回不过神来。亏损金额这么高，一定是在我离岗的这三天里形成的，而这几天我压根没有碰鼠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造成如此巨额的亏损。总的来说，截至1月18日我到多维尔度过那个糟糕的周末时止，与我2007年的盈利相抵，我账面上的头寸基本能做到盈亏持平。直到星期天，兴业银行的人自己也承认我的头寸只有轻微的亏损，至多不过2亿欧元——而这个数字比我自己的测算还要高一些，我当时就提出了异议。现在公布的这个数额简直无法想象，如果这个数字属实，那也就是说1月1日至24日，银行亏损了64亿欧元。64亿减去前期15亿的赢利，差额为49亿欧元。在当前恐慌情绪日渐泛滥的大环境下，这样大额的亏损一定会让公众目瞪口呆。

我立刻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便眼下市场出现了暴跌，银行也不可能亏损这么多钱啊，怎么可能呢？3天以来我不停地估算着，从来也没有想到数额会如此之大。唯一的解释是把所有可能的亏损情况都累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银行仓促之中全部平仓。而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这样的操作方式是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恐慌情绪的。而且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也就是说兴业银行甚



至没有尝试和某家基金公司合作共同卖出头寸——在市场暴跌时，这应该是银行机构的常规做法。总而言之，我无法理解兴业银行那批身经百战的老手怎么会如此举止失措，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事情弄得如此不堪。无论如何，最终结果摆在那里：将近 50 亿的亏损，一场真正的噩梦。3 天以来，我一刻不停地作着各种推算，到头来出现的却是最坏的结局。

我已经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我打开电视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我发现，不仅各个 24 小时新闻台上面都在滚动播出这条消息，连我的照片都开始满天乱飞。幸而他们公布的是我的出入证上的照片，照片是很久以前照的，看上去不怎么像。我又立刻上网查看相关报道。《费加罗报》<sup>①</sup>刊登了一篇文章，洋洋自得，自以为理清了金融行业的运行机制。我读完这篇文章，满腹狐疑，火冒三丈。因为文章里讲的与事实完全不沾边。各样的报道潮水般四处泛滥，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这些报道，银行除了公布亏损数额并把所谓的“诈骗”的脏水泼到我身上之外，同时还披露了银行在

---

① 法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国家级日报。——译者注

次贷市场上面的亏损情况。据报道亏损有 20 多亿欧元。然而就在两个月以前，兴业银行的高管们还大言不惭地宣布银行在抵押信贷市场上只受到了极轻微的影响，做最坏的打算亏损也只在 2 亿欧元上下。然而，最终的亏损额却比预计值高出了 10 倍。现在，舆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次贷亏损的事情自然就不声不响地翻过去了。对银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意外惊喜。我觉得我被他们当枪使了。

情势急转直下，外界舆论气势汹汹，我慌了神，于是打电话给梅耶尔律师。因为媒体的各种报道越演越烈，律师显然也感到措手不及。她甚至跟我说，她一时间简直没法把当前的局势和我对她讲的事情联系起来。她一定在想真倒霉，那个导演诈骗丑闻的交易员竟然就是我的客户！她叫我马上到她的事务所面谈。我当即赶去了。

我想和她讲讲事件的始末情况，但是感觉非常之难。一则梅耶尔律师完全不懂金融业务，二则外界流言四起，对我有一定干扰。短短几个小时，这个事件已经不能用“暴风雨”来形容，而完完全全演变成了一场舆论的“飓风”。报道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疯狂。有的说我潜逃了，有的说我可能自杀了。丹尼尔·

布东觉得“诈骗天才”这个字眼还不够确切，进而又说我是“恐怖分子”。银行的其他高管们无中生有，声称我聚敛了巨额财富。按照他们的说法，我在银行内部还有多个同谋，我们共同组成一个诈骗网络。他们说我凭借高超的手法绕过银行的层层内部监控，进而控制了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他们仿佛忘了兴业银行的内部监控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是业内最为完善、最为安全的。银行为此大受赞誉，领导层还专门为此组织过研讨会大肆宣传。

很快，梅耶尔律师和我决定暂时放下关于期货市场交易流程的探讨，转而应对外界的流言——去“救火”。她建议我先和银行内部我的联系人也就是那位女医生取得联系，就所谓“潜逃”一事出面辟谣。我拨通了她的电话，才说了几句我就意识到医生也受了外界狂热的舆论的影响。“简直是疯了，你自己想办法吧，我是不会给你辟谣的。”她甩出这么几句就挂了电话。梅耶尔律师又决定在事务所内召集记者会谈，一方面澄清谣言，一方面回应兴业银行的攻击并进行反攻。不一会儿事务所里就挤满了记者，到处都是摄像机、照相机。我在隔壁的办公室里，听着律师有条不紊地回应关于我潜逃的

流言：我仍然住在巴黎，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现在不能透露地址；兴业银行的攻击是恶毒的，是弥天大谎；她本人将负责为我辩护。她的话说完，照例是记者提问，律师一一回答，而后记者走出了办公室。但是很多记者并未离开，他们待在外面的过道里，指望再抓点什么新闻，比如说“热罗姆离开了事务所”之类。我和梅耶尔律师商定第二天再见面，然后我从侧门走出了大楼。哥哥和一位朋友开着车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等我，所以我得硬着头皮从记者的眼皮底下走过去。幸好记者掌握的照片和我现在的长相相差甚远，所以他们人数虽多却都没有认出我。我们开车前往蒙巴纳斯车站，母亲乘坐的火车就要到了。

汽车沿着香榭丽舍大街一直开下去。打开收音机，里面又是关于我的报道，这样那样的人依次接受采访。其中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瓦耶声称要拯救兴业银行，接着又声嘶力竭地抨击我这个“金融界流氓”。经济部长克里斯汀·拉加德处事一向审慎，这次也不加甄别，完全听信了兴业银行的一面之词。这些采访言辞犀利，胡乱攀扯，反正指手画脚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他们把我描述成一个精神脆



弱的人，说我在父亲去世之后精神失常，甚至还说我至今仍然穿着父亲留下的衣服。我感到惊诧、恶心。他们说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我。当然，还是有少数人没有被舆论的狂潮所裹挟，没有丧失判断力。这里面有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有记者，也有金融业的专家，他们表示了自己的怀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埃利·科昂<sup>①</sup>。他说，兴业银行实力雄厚、组织严密、监管严格，在这样一个机构之内，一个人怎么可能单枪匹马游离于所有规章之外，而且时间长达一年多之久？

各种媒体无中生有，对我恶意中伤。与他们比起来，上面这些言论虽然显得势单力薄，但一字一句都出自于冷静的分析，让我感受到片刻的平静。一周之后，向来很少参与论战的《回声报》<sup>②</sup>刊发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比较公允的看法。文章的署名人非同小可：马克西姆·勒格朗。他曾经担任兴业银行的监管员，是一个真

---

① 法国经济学家，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总理府下属经济分析委员会成员，其言论在法国民众中有较大影响力。——译者注

② 法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类日报之一，主要报道法国及国际经济金融资讯、股市行情分析、高科技发展趋势等。——译者注



正的知情人。文章的标题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兴业银行：虚伪的内部监控》。作者对兴业银行的架构了然于胸，条分缕析，介绍了兴业银行的各级监管部门——中台、后台、监管员，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位交易员的各项操作起码必须经过 100 多人的监视、核对、批准，方能生效。”

马克西姆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监管部门与交易员勾结串通呢，还是说这些部门无能呢？如果说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兴业银行久负盛名的多层监管系统就是丢丑丢到家了”。作者自己作出了回答，也可以说是对兴业银行的监管系统作出了最终的宣判：在像兴业银行这样庞大的银行机构里，“投机、赌博、冒险就是铁律，监管部门历来是被当做‘非赢利点’的，是被当做笑料的”。身处困苦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我每每觉得受到了鼓舞，它们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兴业银行的高管们可以尽情地施放烟雾弹，尽情地愚弄媒体和大众，总还是有些人能够洞察交易大厅里秘而不宣的把戏，读懂其中的潜规则。我并不孤独。

我们到了蒙巴纳斯车站，母亲的火车却还没有来。

哥哥建议到路边找一家小酒馆去喝杯酒。下车的时候我突然无端地觉得很恐惧，周围的人似乎都在盯着我看。我低着头，尽量不招人注意。最后的一缕夕阳正要落下，天就要黑了。我们进了一家酒馆。很不凑巧，酒馆柜台上方的电视正好在播放相关的报道，兴业银行的照片、丹尼尔·布东的照片、我的出入证上的照片……噩梦又开始了，比以前的更加骇人。媒体大加挞伐的这个人，就是我。电视里又说有关部门正在千方百计地找我，一面又登出了我的住处的照片——楼前满是人。接着，梅耶尔律师又出现了。接着，画面又回到拉德芳斯区的兴业银行大楼。接着，再播一下放了无数遍的采访。接着，我的律师再次重复：我没有潜逃，我随时等待司法部门调查。

一会儿是这批人的反应，一会儿是那批人的反应。喋喋不休，跟事实毫不沾边。我勉强地听着，脑子里却只有一个念头：万一有人认出了我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下去。我想到了母亲。母亲想必不能理解媒体的这番狂轰滥炸，那她会怎么想？早上我们通过电话，我叫她别信电台、电视上的鬼话。母亲语气很平静，话虽然简单，但一出口就让我宽心：“你绝不会做他们说的那些

事。我的儿子，我知道。”母亲已经68岁了，一辈子清苦，没有享过什么福。现在老伴儿过世，两个儿子是她的寄托，她为儿子们的学业和作出的成绩而自豪。母亲教给我们的道理仍然铭记在心，母子之间血肉相连的感情仍然无比坚实。母亲没有被媒体散布的弥天大谎所左右，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又有了勇气。

晚上全家人在哥哥的住处吃饭。就在一个月以前，在布列塔尼，我们也曾经像这样聚餐庆祝圣诞节。短短一个月，一切都变了。我的工作全弄砸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灾祸降临到我头上。电视里不停地滚动播出同样的报道，不断地还有新的报道出现。银行宣称要对我提出起诉，我竭力积极面对，但是备受打击。先是到警察局接受审讯，而后是拘留，打击一个接着一个。我曾经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曾经是兢兢业业并为此无比骄傲的好员工，如今这一切以光速一般离我而去，倏忽之间没了踪影。母亲什么都不说，但是此刻耳边听到的字字句句对她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我尽量缓和气氛，我变换着话题，甚至开一两句玩笑。但是内心深处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强忍着，坚持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努力

理清思路。

后来我才知道，兴业银行对外宣布“由我造成的巨额亏损”的时候，迫于压力还必须给市场上的专业人士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于是银行便说我在银行账目之外秘密建仓，盗用电子身份，自己核准自己的虚拟交易，过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再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内取消交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前面我已经说过，我所有的操作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都是在银行层层监管之下作出的。赢利也好亏损也好，所有的交易都记录在账，并且由银行专职人员审阅，核准。不管兴业银行怎么凭空捏造，我确实确实从来没有盗用他人的电子身份，也从来没有往计算机系统里输入什么数据——更别说虚假交易数据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力。

我的举动都受到银行的监管，这都是有迹可查的，要我拿出证据吗？2008年1月18日，银行负责账目的部门曾经应我的顶头上司马夏尔·鲁耶尔的要求，给他发过一封电子邮件。18日，也就是我动身去多维尔之前的那个星期五。读者想必还记得，我离开银行时马夏



尔还问过我，还跟我说“祝你周末愉快”。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按照他的要求”收到了这份报表，内容如下：

发件人：×××

收件人：马夏尔·鲁耶尔

2008 年 1 月 18 日 17：29

抄送：×××，×××

主题：2A、XE、WU、WV 四人年度股指 CPM 数据

马夏尔，

你好！现按你的要求，将我部门金融工具 Rubis Passerelle 上面记录的年度股指 CPM 数据发给你：

|    | 年度股指 CPM（单位：欧元）    |                    |                     |                     |
|----|--------------------|--------------------|---------------------|---------------------|
|    |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 截至 2007 年 7 月 31 日 |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 6 月 30 日至 12 月 31 日 |
| 2A | -2 127 305 024. 63 | -320 546 843. 85   | 1 554 419 019. 58   | 3 681 724 044. 11   |
| WU | 1 097 813. 85      | 1 124 400. 72      | 10 765 267. 37      | 9 667 453. 52       |
| WV | -109 388. 53       | -183 167. 85       | 818 416. 29         | 927 804. 82         |
| XE | 0. 00              | 0. 00              | 0. 00               | 0. 00               |
|    | -2 126 316 599. 21 | -319 605 610. 98   | 1 566 002 703. 24   |                     |

此致。

法国兴业银行投资银行部

这份报表的技术性可能太强了一点，但是很能说明我的情况。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我们可以看看报表中列举的我所在团队的业绩状况。我在团队中的代码是“2A”。

首先，团队中其他两名交易员（“WU”和“WV”）和我的业绩有天壤之别，让人大跌眼镜。单单看看年度

收益（“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栏吧。一目了然，我名下有 15 亿的收益，是其他两人的 150 倍，甚至 2 000 倍。如此天差地别，大家却仿佛视而不见，总该说是有点让人费解吧？

此外，报表中时间段的划分也大有名堂，和银行的常规做法大不一样。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核查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做一次，有时甚至每半年一次。而这份报表则不然。其时间段的划分正好和我手中头寸的几个重要阶段相契合：截至 7 月底，我的头寸持续亏损，而后转入赢利。真的是巧合吗？马夏尔怎么会奇迹般地知道这些重要日期呢？

这份表格是从银行账目中截取出来的。就其内容而言，选取得恰到好处。这一点正好说明整个 2007 年，我的收益也好亏损也好，银行的各级监管机构都看在眼里。同时还说明，此前我的头寸就有过巨额潜在亏损的风险（6 月 30 日时达到了 20 多亿），但是没有任何人对我作出警告。既然如此问题又来了：1 月 18 日那个星期五，既然马夏尔已经掌握了这些数据，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放我离开银行，还说他会“想办法”呢？

银行仿佛是一台由众多齿轮组成的复杂机器，能轻而易举地将人绞杀，后文中我会详细分解。眼下摆在我面前的是我有生以来最揪心的一段时光。那天晚上大家睡得都很晚。而我仍然睡不着，这起码已经是第三个不眠之夜了。我想着即将到来的种种磨难，竭力想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想着想着，我会突然觉得信心十足：我只要把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地告诉警察，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要说的一切都在我头脑之中，我只需要坦白交代就可以了。

不错，我是有过失，我犯了错，甚至可以说只是出现了一点儿疏忽，但是我对待工作一向是认真负责的，而且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上司对我的关爱就是证明，工作以来短时间内我多次获得升迁，这也是证明。再说我从来没有挪用过一分钱。既然如此银行能给我安插什么罪名呢？我什么罪也没有。兴业银行弄来一批人，摇头摆尾要把我搞臭，要判我的刑。梅耶尔律师也是这么看的，律师同时又说我的案子多半会免于起诉，至多不过由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出面仲裁，实在看不出能给我判一个什么罪名。

时间一点点流逝，各种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乱撞。挫

败、惊愕、自信，各种情绪同时涌上心头。感受最深的是恐惧。任何事情、任何细枝末节都会让此时的我觉得恐惧。我害怕明天一开门发现哥哥的屋门外围着一大群记者，我害怕银行的人接着往我身上泼脏水。未来会是怎样？我觉得恐惧。想想我没准会被拘留，以前在电视和电影里看到的画面浮现在眼前，使我不寒而栗。

1月24日，我想了一天一夜。我知道一切都已失控——我是如此，周围的一切也是如此。我个人自然已经完了，站在我对面对我大肆鞭挞的那些人呢？他们想必也不会好过。兴业银行的高管们一方面惊慌失措、退无可退，一方面还想挽回危局，于是他们只好把我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去。我很想止住思绪休息一会儿，却完全不能自己，只好凝视着沉沉的夜空。我渐渐意识到这次事件即将震动全国，而且受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运。一边是一个犯了过错的人，一边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与机巧之上的肮脏体制，中间横着一条若有若无的边界。整个事态就将循着这条边界演变下去。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银行大楼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4

## 交易厅内幕

兴业银行总部位于巴黎拉德芳斯区，共有两座大楼。这两座大楼可谓是大名鼎鼎，我第一次走进大楼内部还是在 2000 年 8 月初。当时，我正要去兴业银行就任“中台专员”一职，我对这个职位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知道交易员在“前台”工作，“前台”之后便是“中台”。交易员在前台达成交易之后，中台负责采集交易信息。

我被分到一个小组，我的任务是把对金融交易有用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数据库里去。此前我还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而且我的计算机知识也很一般。大学 5 年的学习主要都是与金融有关的，我的知识、能力也仅仅局限于此。也就是说这 5 年的学习对我这份工作没有多少帮助。不过这也不成问题，毕竟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

一个秘书：别人给我信息，我只需要把这些信息记录在计算机系统里就行了。

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对银行业尤其是金融市场非常感兴趣。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家的家庭氛围。打我小时候起，家人就特别关注时事。父亲常常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追踪各种新闻的进展。吃饭的时候大家也经常谈论经济和社会问题。父亲骨子里是戴高乐主义<sup>①</sup>，有着强烈的政治信念，对所处的时代非常敏感。随着我逐渐长大，我们交流的话题范围越来越广，还常常互相激烈地争辩。

我上初中时，长我7岁的哥哥念了大学，学的是法律。这样一来我们家又添了新的话题。我认真地聆听家人的见解，兴趣越来越高。上高中之后我选择了经济学科<sup>②</sup>，学习兴趣很高。再后来，我通过了会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与金融方向，因为只有这个方向才能够

---

① 戴高乐主义以谋求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和世界大国地位为政治目标。——译者注

② 法国高中二年级开始分科，分为“普通教育类”和“技术教育类”两个大的类别。普通教育类又包括文学、经济与社会学、自然科学等方向。——译者注



把我高中阶段的两大兴趣结合起来：经济和数学。我不打算投考高等商业学校，准备进综合性大学<sup>①</sup>。我先在坎佩尔大学读了一年经济学<sup>②</sup>，随后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选择。坎佩尔大学的课程过于理论化、抽象化，而我希望接受更加职业化、专门化和具体化的教育，还希望上学期间能够有机会进入企业实习。所以我参加了一次考试，考入了南特大学银行与金融高等职业学院，3年后获得金融专业硕士学位<sup>③</sup>。

这几年的学习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南特大

---

① 法国高等教育的组成体系较为复杂，主要有综合性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三大类。高等商业学校是高等专科学校的一种。高等专科学校办学规模很小，教学严谨，旨在培养精英人才，在社会上享有极好的声誉。要想进入此类学校，须在通过会考之后参加一年左右的预科学习并通过非常严格的选拔性考试。综合性大学院系设置齐全，采用“宽进严出”的办学模式，凡通过会考者均可申请注册。——译者注

② 作者在此修学一年，获得经济学专业大学普通学习文凭（“大学普通学习文凭”是法国大学第一阶段颁发的文凭，相当于在我国大学本科二年级颁发一个学历证书）。——译者注

③ 这里所谓的“硕士学位”是法国大学第二阶段颁发的文凭，一般在4年大学教育之后获得，实际上大致等同于我国的大学本科学历。——译者注

学的课程将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我非常喜欢，学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求学期间我还有幸在南特市兴业银行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习。那是我第一次和银行领域的企业签订工作合同。我被分配到证券部，担任行政专员。当时，兴业银行与美国著名的基金经理人猎头公司富兰·罗素公司合作，共同设立了一支多重经理人基金。我的任务就是追踪这支基金的运营情况。

多重经理人基金的架构比较独特，下设股票、债券、抵押贷款（后来臭名昭著的次贷就属于此类）等多个分支，每个分支都由该领域的明星经理人执掌。为了确保实现基金业绩的最大化，基金公司的管理层常常会从各银行挖走表现优异的经理人。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实习，金融业对我来说仿佛就是一部结构异常复杂的机器，一切都是陌生的，我觉得无比好奇，完全沉浸在其中，同时也觉得受益匪浅。我完全无法料想几年之后我会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次贷危机中和那些金融产品再次相遇。

实习期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特有的一组金融工具——资产担保证券（ABS）和各种按揭贷款。后来，我就此主题撰写了实习报告。这一个阶段对

我的影响非常之大，我甚至打算等实习一结束就马上就业。实习辅导老师向我施压，强令我继续完成学业，她说“要不然，论文答辩有你好看的”。老师并不是反对我进入银行业，而是希望我将来真正进去的时候路子能够宽一些。就这样，我最终决定申请攻读里昂大学金融学专业的第三阶段。等学成之后就能拿到 DESS 学位<sup>①</sup>，在就业市场上就能增加不少砝码。

事情的进展从来无法预料，过去与未来往往有着奇妙的联系。上学时我曾按照要求就社会上的焦点人物撰写了一篇小论文。我选择的是两位法官：雷诺·范·伦贝克和埃娃·若利。当时在我看来，他们就是社会道德的楷模和保护神。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政界与金融界纠缠不清，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并长期占据报纸头条，但没有人去深究，仅沦为媒体热炒的谈资。只有这两位法官能够顶住各种压力，最终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对这些问

---

① DESS（高等专业学习文凭）是法国大学第三阶段文凭的一种。DESS 学制一年，为学生提供专业化教育。DESS 重点强调校外专业人员的参与，强调团队合作和结业实习，和企业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DESS 一直有丰富的生源，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法律等专业。——译者注

题很感兴趣，所以围绕这个主题撰写了论文，论文题目是《挑战社会精英的法官们》。两位法官之中，我对雷诺·范·伦贝克尤其倾心不已。他办案努力，有主见，我觉得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独立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然而，后来正是这位法官将我推上了预审法庭的审判台。坦白地讲，如果再让我写那篇文章，我会有所保留。生活让我们逐渐看清自己，其代价是一个一个的幻想在我们面前无情地破灭。

我被里昂大学录取，从1999年9月起在那里待了一年。我按照在南特时实习辅导老师的建议选择攻读金融专业的DESS。选择这个方向确实是明智之举。课程生动有趣，教师团队非常专业，而且和企业界有很多接触，一切都让我十分满意。我之所以选择攻读这个专业的第三阶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按照要求要想读完这个阶段，除课堂学习之外还必须在某家银行做两次实习，每次实习时间为3个月。我去的实习单位是巴黎套利银行。在那儿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职位，项目管理。这个职位专门做中期，和我一年前在兴业银行的工作完全不同。银行高管层希望对一套证券信息收集系统进行测试。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信息对于交易厅的



正常运营有多么重要。哪怕仅仅是一条信息，如果出现遗漏或者处理失当，都有可能给银行造成常人难以想象的损失，有可能单笔就高达数百万欧元。正因为如此，信息处理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类工具一般由外部公司开发，内部集成一系列重要参数。有了它，人们可以更好地追踪各种影响证券交易操作的因素，控制行情的异常波动，交易员调整仓位时也可以有所参考。开发这样的工具，耗费了金融界人士相当多的心血。由于金融衍生产品数量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大有泛滥的趋势，做这种研究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开发好这种信息处理系统，就是把握住了未来，就不会因低级错误而导致亏损，甚至有可能扩大盈利。

实习期间，我不可避免地 and 银行的前台工作人员有过一些交往。遇到了问题，他们会一五一十地分析给我听。这种探讨非常有意思，我学到了很多，而且从中深切体会到金融项目内部固有的冒险意味。这些体验固然很有意思也很有用，但我觉得还是有些遗憾。在南特的实习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其实用的一面。然而这一次我完全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大家仿佛不是活在当下，而是要用一种中长期的眼光看待问题。上学期间，那种强调对



产品的全面了解、强调扎实的数学功底的实用主义理念曾经让我那么着迷，回想起来简直像智力游戏一般，现在则完全体会不到了。

和交易员们讨论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发现。要想在金融界立足，想在银行里谋得一个职位，良好的数学训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早就知道。没有想到的是学科也非常重要。实习以来，我在交易厅里见到过许多高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有综合理工大学的，有中央理工学院的，还有高等矿业学校的<sup>①</sup>。雇员的专业背景复杂，折射到银行身上，结果便是制定投资战略时起点非常高，即便是相对简单的金融产品也是如此。银行动用极尽精妙繁复的数学模型来分析股票的表现，区分哪些股票业绩优异，哪些表现糟糕，以期实现所谓的“量化交易”，或者叫“算法交易”。

这种运用数学模型设计出来的、异常复杂的金融产品，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美国次贷，只可惜这种产品的结局非常黯淡。起初只是传统的抵押贷款，随后抵押贷款被转化为证券（或者按照金融

---

<sup>①</sup> 这3所学校都是法国高等专科学校中的佼佼者。——译者注

界出现的新词来说，即“被证券化”），再后来就被分割，卖给各个基金或银行。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贷款和贷款机构承担的风险之间完全脱节，借贷方急于将债权从资产负债表中清除出去，于是将债权掺杂在各种金融产品之中转给别的金融机构。于是当美国房市暴跌，美国家庭无力偿还越来越高的房贷的时候，这些产品也就同时把全球金融业拖进了谷底。这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事前少数细心的聪明人已经有所预见，然而事到临头银行和投资者还是难以承担，无法遏制事态发展。

早在几年以前我在南特市兴业银行实习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实习报告方面的事情请教经理人，他当时正好负责这方面的金融产品，他无意中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这玩意儿就像个汽油桶，不知道哪天会爆炸。总有一天会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的。老实说，我们都搞不清楚买进来的是些什么东西！”这话当时我不太懂，过了几年才真正领会到其中的深意。

我在巴黎套利银行负责测试一款软件。测试结论是：这款软件可以提供很有用的分析结果，生成的数据信息也很可靠，只是使用上较繁琐。上司对我的工作应

该是相当满意的，因为我刚拿到文凭他们就主动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没有立刻答复。当时是 2000 年，正赶上各家银行大规模招收新人，我知道应该还有其他的机会。我希望谋到一个更具实战性、更贴近市场的职位，简单说就是希望和股票联系更为紧密。当时我只对金融和市场感兴趣，老实说到底什么样的职位适合我，我那时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判断。

有一天，巴黎兴业银行负责招聘的部门打来电话，说对我在里昂获得的 DESS 学位很感兴趣，愿意给我提供一个中台的职位。我连一丁点儿的犹豫都没有，立马就答应了。之前在巴黎套利银行确实过得很开心，与周围人也相处得极融洽，而且彼此间已经结下了 6 个月的深厚情谊。但是，兴业银行给我的职位更加靠近市场，我正是因为这个才下定了决心。就这样，我被兴业银行录用，毛收入将近每年 3 万欧元（关于收入的问题，后文中我还会讲到）。

2000 年夏天，我怀着满心的喜悦成为大名鼎鼎的兴业银行的一员，而且进的还是最让人艳羡的部门，股票与股指衍生品部门。这个部门是兴业银行的明星部

门，先后获得了很多荣誉。无论走进兴业银行的哪个交易厅，都可以看到表彰这个部门的海报，诸如“衍生品行业的世界领袖”、“第一名”之类，而且通常用红黑相间的颜色印刷，让人一看就想起兴业银行。入职之初，银行的一位高管向新人们介绍部门情况，他说兴业银行好比是一家印钞厂，股票与股指衍生品部门就是印钞厂的发动机。我终于成了这台发动机上的一个部件。

中台之下又包含若干个下属部门，我所在的中台参考部就是其中之一。中台参考部本身又分为两个小组，一个是权证小组——所谓权证，是银行定价并出售的各种期权，另一个是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小组，负责所有在“有组织的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如股票、期货、期权等）。具体来说，我的工作部门是中台参考部的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小组。我和同组的一位女同事共同负责证券投资基金，普通人一般简单地称做“基金”。这里面又包括好几种产品，值得说明的是，这些产品和4年之后我改任交易员时负责的产品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和这位女同事上面还有一位女上司，名叫克里斯汀·罗德里格，30多岁，是一个波兰人，待人热情而且活力十足。她负责的团队一共有5个人，团队的平均年龄很



低，成员普遍都在 30 岁上下。大家彼此真诚相待，工作气氛非常融洽。

走上新岗位，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边工作边学，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难度，因为我负责的工作很简单，而且日复一日老是那些事情。再者，像我这么一个刚刚毕业的人，能够进入兴业银行这样知名的企业，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下面是我日常的工作：交易员向我提供某一类型衍生产品的参数，我将参数输入到前台的 Eliot 系统之中，接着就会生成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既可以用来追踪新生金融工具的表现状况，也可以用做交易的参考数据。

除此之外，每天闭市的时候，我要查验计算机系统中各种产品的报价，确保价格即时更新。将别人给我的参数输入到计算机系统中，检查系统中的价格是否与各交易所反馈的最新价格相符，这就是兴业银行交派给我的活儿，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事发后，兴业银行声称我曾经在后台工作过——后台负责所有各类交易的监察与处理——这完全与事实不符，我从来没有做过交易监管。我对后台部门的内部监管运行机制确实略有了解，但绝不是从工作中得来，因为我在中台的工作和后



台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再说交易，那是前台负责的事情，也和我所在的中台无关，中台和前台其实仿佛就是完全分隔开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更何况我所在的部门与交易员们的工作场所根本就是在不同的楼层，工作中就算是偶有交流，也仅仅是在电话里三言两语说完了事。

由于我负责的金融产品性质特殊，而且同时在不同地点上市，所以我自入职时起就总是超长时间地工作。我8点钟不到就开始上班，通常总要到晚上8点才能下班，有时甚至要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像兴业银行这么大规模的机构通常同时经营许多种金融产品，从我这第一份工作起我一直在和这些产品打交道。它们的数量极其庞大，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增加。各家银行每天不停地向客户推出新产品。有的产品很简单，比如说“权证”，还有的非常复杂，比如所谓的“组合产品”。由于数量实在太多，连我这个在银行工作了多年的人都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数目。仅举一例，我和同组的女同事两个人就要负责处理500多个基金。要知道和兴业银行全部的金融产品相比，我们俩承担的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兴业银行到底有多少种金融产品呢？想想头都大了。

兴业银行的工作流程已经近于工业化。刚开始工作

时，这让我感到非常惊奇。早在 2000 年，银行使用的计算机系统效率已经非常之高，在整个金融界广受赞誉。大家都说兴业银行技术先进，引领潮流。比如说，如果两套系统的数据之间哪怕有一丁点儿的差距，监管部门的系统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能够自动地查出来，而且基本上不需要监管部门人工干预，系统还会自动生成报告并发送给相关人员。这个当然是非常方便，和我在巴黎套利银行见到的完全不同。那边无论是工作流程上还是监管流程上，自动化程度都要低得多。

起初，我对银行业的整体架构只有一个极粗浅的了解。投资战略是上游部门的事，我整日忙于数据输入，对此更是一无所知。好几年过去了，情形依然如此。交易员们对交易策略缄口不言，讳莫如深，而且交易厅内部还设立有严格的隔离制度。我渐渐觉得银行内层层的外部监控过于繁琐，不可理喻，所以很快感到有些厌倦。一年下来手头的活儿已经做了一遍，单调重复，毫无技巧性可言。倒是工作中的一点小创新让我体会到些许的趣味。我用 Excel 设计开发了一些小程序，可以帮助我和小组成员们自动完成某些工作，比如说数据录入、开具报表等。我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开发这种程

序，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起码有下面两个方面：首先，能够开发程序并调校成功，这给我一种成就感；其次，程序能代替我完成一些日常工作，所以节约了我的时间。

事发之初兴业银行大肆宣扬说我有超凡的电脑技能，或许正源于此。一个天才黑客把一家银行给耍了，要想使公众信服他们就找了这样一个说辞。然而实情并非如此。要说真有什么软件我用得比较好，那得算是 Excel，可是金融界业内 99.9%的人恐怕都会使用 Excel 吧。和他们比起来我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电脑技术，用 Excel 建一个宏指令，这也只是相当基础的操作，没有什么惊人的智慧与设计。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时间，我们小组连同主管在内共有 6 个人，我是少数几个甚至于说是唯一一个愿意花时间去开发这种小程序的。

久而久之，就有些交易员找上门来，说是自己没有时间，要我帮他们做一些可以自动生成报表的程序。那是我第一次和交易员打交道，此前我对这个职业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我也完全想象不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要用光年为单位来计算的。

可就在 2002 年机会降临到我头上。那时候有一位助理交易员辞掉了他在股票与股指衍生品部门的职位。我代替他成为助理交易员。这个部门是兴业银行最重要的交易厅之一，能够加入这个部门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意味着我距离“印钞厂”的核心又近了一步。此时我进入兴业银行已经有两年时间，两年里我对银行内无所不在的业绩意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银行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等级关系，秘而不宣同时又很耐人寻味。有些部门是“成本中心”，包括后台和中台在内的支持性部门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些是“利润中心”，这主要指前台的雇员，比如交易员、销售（销售员）等。

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我曾经多少次听别人这样讲过，简直已经记不清了。这种说法已经进入大家的词汇系统，甚至融入进所有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从中台到前台仿佛换了一个世界，其中有一个现象让我吃惊不已。别的部门的人，比如说计算机部门，他们从不对我们直呼姓名，而竟然总是叫我们“客户”，似乎我们并不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上学时每逢放假，我总是到母亲的理发馆帮忙，那儿的工作人员彼此亲密无间，他们组成的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团队。回想往事，眼前人



与人之间的隔膜是那么的怪异。

就这样，我成了股票与股指衍生品部门的一名助理交易员，开始接触到金融世界的另一面。简单来说就是做套利，同时介入多个市场，规避风险并且寻求利润。同一证券常常会在多个国家上市交易，交易地点的不同往往会导致证券的标价高低有别。套利者所要做就是在标价最低的地方买进，然后到标价最高的地方卖出。只要把买与卖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够使风险降到最低。因为单笔的收益微乎其微，所以利润的获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的规模，即取决于“量”。

新工作还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触动。我的日常工作变得异常繁重。每天我要把交易情况录入计算机系统，就是上文曾经提到过的兴业银行前台专用的 Eliot 系统；我要分析业绩；如果发现异常情况，我要查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我要发布交易员的风险指数，用术语来说要“出具风险分析报告”；我要把报告交给交易员；我还要和后台部门保持联系。总而言之，助理交易员要同时做好每日业绩的信息录入和数据分析，但是说到交易，助理交易员没有任何的决策权，大主意要由交易员来拿，完全由他来拿。交易员只需要每天晚上从助理手



中接过整理好的材料，稍微客气客气，而后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投资策略去交易。换句话说，助理交易员干的就是秘书的活儿，和监管毫不沾边（要知道银行业有一条基本的铁律，监管者必须是独立于前台之外的）。助理交易员为交易员的工作提供便利，并且协助追踪其操作——当然，以我个人而言我不只协助一位交易员，而是十几位。可想而知我简直快疯了，经常是从早上7点起一直忙到晚上10点，甚至直到凌晨。

助理的工作和交易员息息相关，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虽然说助理可能还无法理解交易员们为什么一个个那么斗志昂扬，但是他们的操作助理可是都看在眼里的。什么样的操作会被设定为“等待中”，怎样掩饰虚拟操作，哪些业绩被“藏起来了”，是用什么手段藏起来的，传统的套利操作是什么样的规模，“冒险”的纯投机操作规模又如何，很快所有的这一切我都一一领教过了。

好也罢，歹也罢，全部的交易记录都是记录在系统里的，随时可以复查；而且每个交易员都有独立的账目，只要认真分析一番就能轻而易举地查出利润的来源。就这样，半年下来林林总总的投资策略我已经全部见识到了。同时，我也很快认识到摆到明面上的事与上

不得台面的事之间、合法操作与不那么合法的操作之间界限其实很小，与之相映照，上司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度却是很大。业绩至上！替银行挣到钱最重要。交易员也好，经理也好，都要拿业绩去当换取奖金的筹码，当升迁的敲门砖。

交易厅里有一条单纯的法则：坐在这个位子上就得赚钱，车拉马驮般哗哗地赚钱。交易员们各自都有一个业绩指标。年景越好指标就越高。要是到了12月31号指标还没有完成，你准会被臭骂一顿，别的小组的人还会嚼舌头，这怪不得别人，谁叫你没能力呢？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部门主管在年会上的尴尬遭遇。大厅里满是人，各位高管也都在座，这位主管面带谦恭、一字一句地解释他怎么搞砸了，怎么弄出这么一个糟糕的结果，怎么因为他所在小组的亏损使得全部门的奖金都将受影响。散会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有人说：“这些傻蛋，自己搞砸了还害得我们背黑锅。”换言之就是：“就因为某些项目表现不好，又胡扯什么‘团队内部要保持团结’，搞得每个人的奖金都要打折扣。”说这些话的人想必已经忘记了上一年度站在台上作检讨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这个时候，我已经 27 岁了。大凡做交易员或助理交易员的，一般都是 30 往下的岁数，而且 90% 都是男性，所以交易厅里总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氛围，而且闹哄哄的，有点像中学的感觉。但是交易员与助理之间总是绝对的泾渭分明，交易员只和交易员开玩笑，绝对不和自己的助手们走得太近，生怕受到牵连。好在我已经抛弃了当学生时的那种思维方式，所以我并不在意他们疏远我。

相当多的交易员满口都是极其粗俗的玩笑话，简直对不住自己名牌大学的出身。我记得有一天，两位年轻的女实习生从我们面前经过，马上就有一个交易员这么问，口气非常自然：“这是谁召的妓女啊？”无论多么无聊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打赌，比如说拿 500 欧元甚至 1 000 欧元赌大厅里有多少台电脑；赌谁报错了业绩数字，罚两记耳光，等等。有一个叫拉菲尔的交易员是个中高手，什么坏事都离不开他。他们还会选出一个人来，莫名其妙地把他叫做“绿绿”，只要有机会，就把“绿绿”揪出来耍笑一番。“怎么样，绿绿，你觉得今天的美国就业指数该是牛市（看涨）呢，还是熊市（看跌）呢？”“我不知道，别烦我。”拉菲尔又问了许多问

题，然后抛出了自己的预测：“我看是熊市。赌点什么？一耳光，怎么样？”别的交易员跟着一起起哄：“好哦，就赌一耳光。”最后，屏幕上公布了就业指数，拉菲尔运气不好，是牛市。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有一个同事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就这样过了一年，工作上的各种技巧和奥秘我已经了然于胸，同时枯燥的数据输入又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厌烦了。今后的路要怎么走？我觉得茫然。我压根儿没有想过由助理转为真正的交易员。首先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没有往这方面想。再者，我对这个领域的认识还不明晰，所以本身加入的意愿就不强烈。有人建议我到国外的分公司工作，我的兴趣也不大。因为我和当时的女友刚刚在勒瓦卢瓦<sup>①</sup>买了一套公寓，不打算离开巴黎。好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机会降临了。2004年有一项业务发展非常迅速，叫“高压涡轮权证”，恰好我做助理时经手过这种业务。

“权证”这个术语，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简单地说，权证就是银行针对散户或专业投资者开发的一类金

---

① 巴黎西北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融衍生品，是买入或者卖出某种金融产品的期权，其涉及的金融产品范围非常之广，包括股票、股指、汇率、原材料，等等。权证的赢利机制很简单，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点类似于赌博：如果我预计某只股票的行情将会上涨，我就会以预先约定的价格买入该只股票的认购权证。权证到期时，如果股票行情确实上涨，那么股票的当前价格与行权价格（即双方预先约定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我的收益。然而如果行情下跌，我的损失只相当于权证本身的价值。

这种形态的权证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市之初就大受投资者追捧。权证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其原因非常简单——可以说道出了金融投资的基本原则：与传统的金融产品相比，权证的初期投入较小而获利机会却相同。也就是说同样花 1 块钱投资权证获得的收益更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权证的“杠杆效应”。

2004 年出现的“高压涡轮权证”引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新，在原有机制的基础上增设了“钝化阈值”，一旦标的资产的行情超过或触及这个阈值，权证即告失效。这样一来，权证的计算被大大简化的同时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使得总风险也因此降低，可以一定程



度上做到保本。这种产品的计算模式极大简化，可以说只需要做一个减法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法国银行不太愿意把这种产品投放市场。既然传统权证已经能够充分调动客户的热情，同时也给银行留下了最大的获利空间，何必还要推出高压涡轮权证呢？这必定会蚕食当前运行良好的市场，那岂不等于自断手足吗？

金融界业内普遍持此种观点，但是部分外国投资者不同意这种论调。首先发难的是德国人，毕竟他们的金融投资文化比法国深厚。德国人开始从权证市场撤走，他们说银行拿了大头，对投资者却很吝啬。这样说倒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我记得就任助理交易员初期，我曾经用银行内部的系统评估过权证的价值，又叫“公平值”。因为相隔几个座位的地方正好有交易员在向客户推荐权证，我将公平值和交易员的报价相比较，结果令人匪夷所思，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交易员给出的报价比公平值高出1倍。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好意地提醒他说给客户的报价会不会是弄错了。那个交易员放声大笑：“记住了，交易员第一课——利润空间。”我又小心翼翼地问：“但是，这样的价格卖得出去吗？”他的回答又让我大吃一惊：“当然卖得出去，既然客户

好心要给我这么大的利润空间，不要白不要啊。”我顿时有“换了人间”的感觉，终于领悟到为什么银行会被叫做“印钞厂”。

继德国人之后，芬兰人、瑞士人纷纷进入市场，寻求可以投资的高压涡轮权证。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各家银行决定在外国市场上推出该产品，但是不愿意开发法国的本土市场。这类产品真正在法国上市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即便上市了模式上仍然相当保守。我做这类产品时只能舍近求远在国外市场交易，我曾经多次就本土市场开发问题向管理部门提出建议，但是每每遭拒。既然传统权证有利可图，为避免挤占其市场份额，法国各银行之间达成了共识，决定不在本土推出高压涡轮权证。

高压涡轮权证业务飞速发展壮大，到了2004年下半年兴业银行原有的一个小组一分为二，新诞生的小组被命名为Delta One小组，负责开发面向客户的金融产品。不久，小组的交易员阿兰·德克莱克（在他之上还有一位高级交易员）提出，应当设立一个“专职助理交易员”的职位，专门承担本小组的助理工作。他建议由我担当这个职务，建议被采纳。这样一来，我虽然仍然是助理，但是别的助理们都远远地坐在大厅另一端，而

我则和交易员一起工作了。与此前的工作相比新岗位更有挑战性，我除了跟踪新产品之外还可以学到产品的运作模式，学到制定出售价格和回购价格的方法。我开始接触到一个全新的行业，不再是单纯的套利，而更像是一个“市场开拓”，即向客户提供特定产品的买入价和卖出价，或者说负责报价。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的来源。

套利、市场开拓，这样走一圈下来，我对金融行业确实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但是尽管换了岗位，我的实际工作性质仍然没变，我还是干着助理的活，一边做数据输入一边设计一些辅助性的报表程序。后来我还要负责追踪一款自动交易软件。这是一个面向德国市场的报价系统，它可以直接向市场发出指令，待指令执行之后再通过一个自动程序将相关数据输入 Eliot 系统，等待后台管理人员审查。

我挺喜欢这个新工作，虽然工资没有涨多少，我还是干得很开心，很卖力。阿兰·德克莱克和小组的其他交易员一再嘱咐我，说我这一步擢升来之不易，全仗了他们的赏脸与信任，我得对得起他们，要我千万不能马虎，用他们之中某个人的话来说，我最好把自己掰成两

半来使。我之前的那些当助理的同事们还在隔着好几张桌子的地方办公，跟核心的交易事务沾不上边，他们或许确实都很想得到我这个位置。小组的业务增长异常迅猛，简直是分秒必争，我一边努力完成本职工作一边学习交易机制，分析和挖掘交易背后的各种指导性战略。名义上我仍然是助理，但短短几周之后我差不多完全沉浸在交易技巧之中，如饥似渴，仿佛已经变成实习交易员了。

我壮着胆子向阿兰·德克莱克请教。有时候晚上 10 点、11 点下了班，我还和他一起去喝杯酒，借这个相对轻松的氛围向他请教白天想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为什么和那个瑞士卖家争执不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立头寸”。

阿兰比我大一岁，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而有激情，而且求学经历非常辉煌。他先后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sup>①</sup>和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大学<sup>②</sup>，毕业后成为实习交易

---

① 法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商业管理学院，曾连续 5 年被评为欧洲排名第一的商学院。——译者注

② 法国最负盛名的工程师院校之一，在法国工商企业界有很大的影响力。——译者注



员，随即和公司签下长期工作合同，成为公司在高压涡轮权证这个新兴领域的核心交易员。工作中，他时而激情四射，时而忧心忡忡。他常常把心中的忧虑和盘托出，用略带讥讽的口吻议论经理们。工作不顺时，他会火气上撞，变得十分紧张，这时他就会不停地嘟囔：“完蛋了，要完蛋了……”叨咕一番之后，照例又鼓足勇气，用更大的热情重新投入战斗。

我们俩关系很好。我的与交易有关的知识和技巧都是他教的，碰到有不懂的地方，他会耐心解答，帮我扫清疑云。但是一谈到我的将来，他的话总是很实际：“你是当不了交易员的，一来你受的教育还不够好，二来你的性格也不适合。要想吃这碗饭，得有饿狼一样的精神。”他说得有理，助理和交易员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我早就领教过了。但是金融投资战略确实让我着迷，所以职业规划那回事已经完全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了。

工作中我主要和阿兰打交道，在他之上自然还有层层的高官，但于我而言都是陌生的。股票与衍生品交易主管皮埃尔·伊夫·莫尔拉是我们的  $n+3$ ，我每天都能见到他，但他从不和我说话。连 2004 年年底我升职的消息也是由他手下的一个人转达给我的。那个人说：“恭



喜欢你，明年起你就是交易员了。”看到我一脸惊疑，他又说：“不开玩笑，任命的邮件都发出去了，我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尽管阿兰一直劝我不要抱不符合实际的幻想，但最后却还是他暗中向上司推荐了我。他欣赏我的工作业绩和钻研劲儿，或许我的理解能力强也是原因之一。上面提到的“邮件”是皮埃尔·伊夫·莫尔拉写给卢克·弗朗索瓦的，主旨就是要求提升我为交易员。诡异的是，这封为我铺就坦途的邮件，我一直到预审期间才读到。

得益于阿兰的举荐，2005年我成为初级交易员。这种擢升在整个金融界都极为罕见，更别说在兴业银行了。交易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圈子，由助理提拔为交易员而进入交易核心，这是难以想象的。就我在兴业银行多年的亲身经历而言，类似的事情除我之外仅有一例。然而，从助理到初级交易员这个过程中，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专门培训。这一行最为看重的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实地的“传、帮、带”。初级交易员要和高级交易员两人结成一对，学习高级交易员的工作方式，吸取经验，待能力完备之后才能独立做事。市场规律绝不是光凭一些空洞的理论就能掌握与领会的，唯有借助实践才能获

得真知，才能有效率。

一段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它将带我去经历一段起伏跌宕的心路历程，其中虽有欢欣，但又时常夹杂着辛酸苦涩。最终，它会把我拉进无底的深渊。

# 5

## 正式交易员

从助理到交易员，在精神上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认识陌生的人、学习新的操作、发现大银行日常行为背后或光鲜或阴暗的真相。

我的工作在此之前原本已经极其繁重，现在更是忙得手脚朝天，每天我要做好几百笔交易，多得我渐渐对那些数字都麻木了。我对交易员之间使用的切口也越来越熟练。把英语单词做法语化的改造，乍听起来挺奇怪，但慢慢地就成了我的词汇的一部分。

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用词发生了变化。要是在以前，我会说“卖”了一辆车，现在我说“转手”了一辆车；以前我说“买一台 DVD”，现在我会说“认购一台 DVD”。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从 2005 年 1 月的一天早晨开始，我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个“国家”有它独特的语言，有特殊的法律和传

统，有它崇拜的英雄和放逐的罪犯，有作威作福的主子和吃苦受累的仆人，当然这里也有钱，只不过这儿的钱都变身为一串串数字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以光速在地球上穿梭。在这个国度里，只要几毫秒的时间就可能天翻地覆。如今我算是退后一步从这个国家走了出来，虽然还来不及去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驱逐了出来，无论如何不再做这个国家的公民很让我高兴。

我在电脑前度过的时间比同事们都多，我希望更多地了解我的工作，做好我的工作，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这样我的个人时间就很少了。可又有人说我应该和同事们多亲近，应该经常和他们一起出去交际，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团队。于是我完全没有了个人生活。我全部的时间都献给了兴业银行，我和它绑在了一起。这一切仿佛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为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欣喜不已，也就想不到要去抱怨什么。我近乎疯狂地工作，恶果首先体现在我的个人生活上。因为这份工作我和女友日渐疏远，而后默默地、平静地分了手。那个曾经爱过我的人，那个我曾经深爱过的人，她觉得我变了，我也觉得她渐渐变得陌生，如此而已。在工作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东西吸引着我，拉着我一直向下滑去。

我重新打理一切，开始新的生活。我在纳伊租了一套小公寓并马上住了进去。一张床、一个沙发、一台电视机和几件简单的家具。我只是稍微布置了一下，反正我很少待在家里。我从不在家里起火做饭，连早餐都是在外面解决。每天我披着星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又迎着曙光去上班。我周末不出门，只看看电视缓解一周的疲劳。家务问题呢？我请了一位女工，每周来一次，整理一下屋子，做做清洁。工作吞噬了一切，使我的个人生活就这样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切我只是默默地、被动地承受。将来会怎么样？我不去规划。职业生涯要怎么走？我不去设计。我也从不去想会不会有什么祸事降临到我头上。

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又陷入爱河，但我从没想过要为此改变一下我的生活。一切照旧：和同事出去交际，晚上短暂的休息，白天无休止的工作。啊，无所不在的工作！我的案子事发之后，女友表现得很坚强，时时地陪着我，为我的命运揪心。我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动。她微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和你一起熬了两年，现在怎么可能放手扔下你不管。”她的话既是最好的爱的证明，又同时让我想起我带给她的半是甜蜜半是



酸苦的生活。

2005 年的头几个星期，我一直用着阿兰·德克莱克的许可证，以他的名义在市场上交易。直到后来我得到了各地金融机构授予的许可证，才开始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工作。获得许可证并不怎么难，申请人除了要证明自己已经掌握了金融证券业的基本规章外，剩下的就是要承诺遵守这些规章。这其实更多地是在道德层面上作出了一种规定。当然，其意义仍然是重大的，它确保了交易操作的可追溯性，必要时可以追查到相关责任人。我首先获得了在德国市场交易的许可证，德国市场是我们小组的主要交易市场。随后我又获得了在北方各国交易的许可证，再后来我得到了其他一系列类似的许可证，可以在全球大多数市场上交易。我的法律地位最终确立，正式获得了交易员资质。

但是在银行系统中，往往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许可证制度好比是一架屏风，背后藏着些不太正派的惯例和陈规。首先来说，有些人会用别人的许可证做一些交易，这经常发生在初级交易员和实习生身上，上文已经说到，我自己就曾经这么做过。再者，还

有些交易员会趁同事离岗度假的机会用他们的账目做交易。这样一来，他们的账目乍一看永远都处于活动状态，像是一个永远彻夜不眠的小王国。这些事情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公然上演，显然需要征得上级的同意，不仅有经理一级的，连制定这种“道德约束”的稽核部门必定也牵涉其中。

我还知道一个颇为离奇的事情，有人借用他人的许可证交易，而许可证的所有者实际早在三四个月前就已经辞职了。大多数时候这样做不会惹出什么乱子。但是有时候一些交易所发觉异常的话会打电话来询问。接电话的人会非常坦然而迅速地编出一套说辞来搪塞：“许可证的主人上厕所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么一说，交易所那边通常也就不再深究了。

偶尔也会由此引出一系列的调查，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这方面要数瑞士的交易所最较真。2008年5月，兴业银行就曾经因为有人以“幽灵交易员”的名义交易而被处以24 664欧元罚金。我的案子出来之后，公司对许可证使用方面的各种可疑操作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其原因正是担心各家交易所就此展

开调查。我想如果真的查起来，兴业银行还会为此吃大亏。晚些时候，在我接受预审期间媒体就这个话题做了很多报道。我读到那些文章时不禁哑然失笑。兴业银行控告我，说我曾非法向计算机系统输入虚假交易数据，但他们却忘了他们自己也曾经因为“幽灵交易员”的事情屡遭瑞士交易所非难。

我获得自己的许可证之后就开始自己独立做交易。阿兰·德克莱克的指导越来越少。我仍然主动坚持承担一部分助理性质的工作，也许是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很快，我心中隐隐地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虑情绪。倒并不是说我经手的产品过于复杂，恰好相反，甚至可以说我负责的产品是市场上最为简单的品种。因为结构简单所以理解起来很容易，既没有复杂的公式也没有很多参数，我只需要会做“交叉相乘”就足够了。

不过，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突然清醒过来，思想上有过一次巨大的触动。那是在就任新岗位之后不久，有一次我要下一个总额将近 20 万欧元的单，那是我第一次做这么大额的交易。这是一个重大的抉择，我犹豫着，握着鼠标的手不住地颤抖。我想到我和女友刚刚在勒瓦

卢瓦买的小公寓总价也不过 20 万欧元多一点，而现在我只要轻轻点一下鼠标，20 万欧元的交易就达成了。我生怕出错，再三地检查所谓的“交易三要素”：产品价格、交易方向（到底是买入还是卖出）、产品数量。阿兰·德克莱克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很不客气地说：“你得快点，再快点！喏，这就行了。”我又迟疑了片刻，点击鼠标，交易指令发了出去。此后的两年中，我每天都要做好几百单交易，有时一笔就是好几亿欧元，单日经手的总金额往往高达几十亿欧元，但是心理上的震动再也没有像第一次下大单时那样强烈过。

几天之后，我经历了第二次巨大的触动，那是我的第一次亏损。当时我甚至以为我的交易员生涯将要就此终结。情况是这样的，因为 Excel 报表上面有一个漏洞，所以自动交易软件在计算价格时出了错。短短几秒钟之后我就发现了问题，但是为时已晚，仅一个头寸就亏掉了 4.5 万欧元。我一年的薪水都补不上这个缺口，而且放在平时就算做得再顺手也要两三天才能挣到这么多钱。眼前的失误让我绝望，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想呕吐。阿兰十分生气，百般斥责我，甚至断言我这碗饭



快吃到头了。我默默承受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天晚上他又把话收回去，说这种事情大家都碰到过。尽管如此，有那么几个小时我一直缓不过神来，一直在想或许像我这么敏感的人不适合当交易员。

工作环境不同，周遭的气氛便不同，这一点也需要我慢慢去适应。在交易厅里做事是没有任何秘密性可言的。如果有人做成一笔好买卖，他会举起双臂作出胜利的姿势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大厅里各处的人都会鼓掌庆祝，主管一定第一时间跑过去了解情况，而后再去给上司报喜。要是有人倒霉亏了钱呢？那也是一样，满屋的人登时就都知道了。接着便是熊熊的怒火、各式各样的谩骂、手臂四处乱舞。厄运落到我头上的时候，我总是默默地继续工作，一刻不停地点击着鼠标。一个人倒霉，别的人个个感同身受，大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但往往简单地说一两句话便各自走开。比如“这种事大家都碰到过”、“别担心，肯定能挣回来的”。

感同身受也是要有界限的。别替同事的遭遇操心，这也是交易厅里的一条黄金法则。如果是好消息自然可以和别人分享；如果是坏消息还是各扫门前雪的好。因为那与自己无关，活该那个人倒霉。谁闯的祸谁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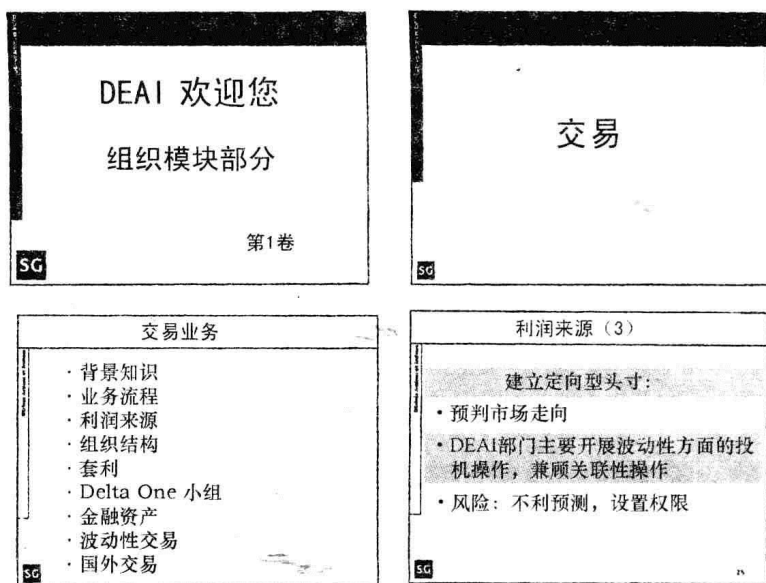


既然事不关己，在心中祷告上苍不要降祸于我，同时言语上略表同情，这也就很说得过去了。说到底别人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到底遥远，自己的业绩才是第一位的。要是哪位得到些有利的消息，他必定会把它烂在肚子里。除了第一时间赶来掬一把同情的泪之外，交易员之间是各自为战，绝不共享任何信息的。大家客客气气地坐在同一间屋子里，表面上看也真讲朋友义气，一旦到了交易市场上个个刺刀见红，绝不手软。如果某位同事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而且能利用我的错误提高自己的业绩的话，那么这位同事一定会立刻动手，绝不迟疑。皇后乐队曾经唱道“演出还要继续”，那么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交易还要继续。

我逐渐习惯了新工作，一切走上正轨。几个月过后我差不多能完全独立操作了，阿兰·德克莱克手下有500个产品，我经手的就有100多个，而且我做的交易通常都是赢利的。偶尔搞砸了亏了钱的时候，阿兰总是安慰我：“去弄杯咖啡喝，抽支烟，回头赌一局把口子补上。”于是我按他说的，在没有相应准备金的情况下建一个完全投机性的头寸，只持有极短的时间就出手抛售。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预先得知某公司 10 点钟即将公布业绩，如果根据坊间流传的内部消息和我自己的分析预计公司业绩较好，我就会买进一大手该公司的股票，等到稍后行情上涨的时候马上卖出。这样操作一定可以赚到钱。然而假如我的分析不正确，亏损也是可能的。最初做这种“赌博”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小心。久而久之，我一方面被利润所吸引，一方面受到顶头上司的怂恿，感觉越做越得心应手，投机性的头寸也越建越多。后来，投资银行高管们高调宣称要遵守业内规章，还提出口号“兴业银行，不投机的银行”，所以从 2005 年到 2006 年，我的头寸基本上都是有保证金的。

在我所在的部门，每个新人入职时都会收到一份介绍部门情况的资料，这里我选取其中的几页。体会其中蕴含的精神，不难发现其实银行不仅要求职员们投机，甚至还把投机看做是“利润来源”。从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允许“建立定向型头寸”，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变通说法，其实就是指单一方向且没有保证金的交易操作，或者说就是要建立一个以追求纯投机性收益为目的的高风险头寸。



约摸 2 月中旬，阿兰·德克莱克来找我谈话，说是有件事情让他很不放心。他说我不该不参加部门的周末活动，要我更好地融入到团队之中，又说各种聚会——常规的也好，庆祝性的也好——不该不参与。总而言之，要我表现出更多的“合作精神”。我同意了，尽管心里对那些活动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公司的交易员和销售员经常在周末聚会，聚会的情形我们也有所耳闻。之前我在中台工作的时候也曾经接到过一两次邀请，但都谢绝了。既然平时同事之间只有虚伪和假情假意，又何必花上 48 个小时假装亲密无间呢？我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再者，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已经为兴业银行投入了

太多时间，不希望再赔上周末两天到那种气氛中受煎熬。可是既然阿兰一再坚持，我只好照办。

星期五晚上，我们租车前往多维尔，总共有五六百人，都是衍生品部门的员工。其中大约有四五百名法国人，两百名外国人，绝大多数和我一样都是交易员。出发前我们已经包下了皇家酒店，只要能让属下的交易员有面子，兴业银行从来都是不惜血本的。抵达之后先吃饭，而后开了一个晚会，一切平静。接下来是散步，在多维尔的街上闲逛，到酒店的吧台喝酒。第一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但重头戏还在后面。我一向讨厌集体活动，更何况我原本就是被迫参加的，果然第二天的安排让我大吃苦头。我们先被拉去赌了好几把，接着是一个抢答接力，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没多久我设法逃了出来，回了酒店。晚上先吃饭，然后是著名歌手雅尼克·诺阿的私人音乐会。

音乐会之后真正的狂欢开始了，众人近乎癫狂，尽情发泄。搞笑短剧、歌曲演唱、小品，节目一个接着一个，表演者和观众都很兴奋，在酒精的推动下亢奋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别人一样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参加了几个节目。尽管节目很傻，表演很笨拙，笑话的品



位很低俗，我却还是在那儿傻兮兮地笑。

后来我看到了那天晚上的节目视频，吃惊不小。真是要从当时的情境中抽身出来做个旁观者，才能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小品把所有和银行有关的人都编排了进去：客户、同行，甚至包括我们银行的各位经理。把一些人的缺点和口头禅放大并反复渲染，以达到搞笑的效果。同时也没忘了强调说兴业银行是世界上最好的银行，兴业银行的交易员是世界上最好的交易员。短剧和歌曲反复阐释着功利而低俗的主题：性、业绩、奖金。克里斯托夫·米亚纳的名字也出现在了节目里。克里斯托夫和卢克·弗朗索瓦的职务相同，都担任银行股权与衍生品部共同主管。小品的主要情节是克里斯托夫应聘，参加面试。招聘人员问：“您对金融业的哪一部分最感兴趣？”扮演他的演员毫不犹豫、极平静地说：“票子呗。”整个大厅顿时沸腾了，叫好声此起彼伏。

风险控制部门的女主管献唱一曲，曲调颓废且不说，歌词也和她的职务极不相称：“我们冒险挣大钱，无法又无天……”销售部门的主管在一个小品中表演猜牌，他说：“女士们、先生们，诸位的工作任务和我们客户的理财需求是一样的，无非是找到利润。利润跑哪



儿去了呢？这儿没有……这儿也没有……啊！利润稳稳地装在我的口袋里啦！”

现场的人们简直乐疯了。与这些小品相互映衬的还有好多歌曲，例如：“想扮大款去买车，品牌得是法拉利，鲜红颜色真美丽。”阀门一个接一个打开，堡垒一座接一座崩塌。大主管卢克·弗朗索瓦本人也非常兴奋，笑得简直看得见嗓子眼。

另一次周末聚会的场面更加疯狂。那次我没有参加，但有人把节目录下来当做纪念品给各位与会者，我有幸见识了那怪异的一幕。那次演了一个恶搞《咖啡间的摄影机》<sup>①</sup>的短剧。开场出来一个人，脑袋装扮成一个大纽扣的样子——这个玩笑开得可有点猛<sup>②</sup>。另外一个短剧中，由一位销售员扮做丹尼尔·布东，和一位主管商谈后者升职的事情。开场，丹尼尔正在办公室里练习高尔夫，主管上来敲门。接下来双方展开了一段对

---

① 一部法国办公室轻喜剧，该剧把场景设定在一部咖啡机前，不同人物借喝咖啡的时间谈论工作和私生活，短剧通过这些对话反映了一家法国大型公司总部的工作场景。——译者注

② 兴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名叫丹尼尔·布东，他的姓氏作为普通名词时有“纽扣”的意思。——译者注

话，言语间的意思非常微妙。主管指着“丹尼尔”的右臂问：“这是啥？”“人都有左膀右臂，这是我的右臂啊。”“这么说，也是您的保险丝<sup>①</sup>了？”“哦？你说的是哪个保险丝？是市场部那边的还是工会那边的？”这一回答引起全场一阵爆笑。

包袱之所以能响，诚然部分程度上归功于词语的表层意思。但是在场的同事们之所以爆笑，除了剧中对日常词汇的曲解和对老板们的小毛病的夸大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短剧直白地揭示了深藏不露的真相。市场残酷的法则、工会的纠缠不休、顾客的愚蠢、同行的怨气……全银行上至总裁、主管，下至员工，全员共同努力扫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障碍，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才成就了兴业银行世界领先的美名。参与节目的有些是银行最高层的管理者，为了营造某种演出效果他们居然花了好多个小时排练节目，挑选古里古怪的道具服装。这都让我目瞪口呆。

在杰尔巴岛<sup>②</sup>的时候，银行的一位高层领导曾经说

---

① 法语中，“保险丝”（fusible）也可引申指公司或团体内部可以随时牺牲自己、维护上司权位的人。——译者注

② 北非国家突尼斯的一个度假岛屿。——译者注

过这么一句话，让台下的听众为之癫狂：“我们就是要做点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次我们租了5架飞机，为的就是要让在场的700人度过一个梦幻般的周末。”阿兰要我“表现出合作精神”，大概也就是这种意思吧。

那天在酒精的躁动下我们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房间睡觉。第二天是星期天，大家放下了前一天的疯狂平静地度过了。下午我们又乘租来的汽车返回巴黎。我在心里发誓，今后公司如果举办这种周末聚会我绝不再参加；后来我也就真的再也没去过。

2005年7月7日，我决定试水做一笔大交易，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但我为银行赢得了50万欧元的收益。当然这次交易的风险性也很高，虽然事前我已经做了缜密的演算。那次交易的时间恰好和伦敦爆炸案发生的时间相同。当日，伦敦地铁在1小时内连续遭受4枚炸弹的袭击，造成56人死亡近千人受伤。那天早晨，我一方面因赢利而欣喜，一方面又为无辜死伤的英国民众而悲伤。我觉得坐立不安，正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我才能够有机会为银行挣到这笔钱。这次痛苦的经历恰好说明，虚

拟的金融世界与我们生活的实体世界之间有着一种奇怪的联系。

每个交易员都有一大堆图表、参数、曲线图和统计数据，交易员凭借这些东西体察市场走向、制定交易策略。我也不例外。我专门做德国市场，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关注保险公司的行情，尤其注意安联保险集团。2005年6月底至7月初这段时间，安联公司出现了巨额资金流动，随即公司股票出现波动。与此同时，我发现整个金融市场都有走低趋势。两个现象结合在一起，我想起了以前经历过的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接下来我就先讲讲这件事。

2001年我还在中台工作，经历了当年的纽约世贸大楼袭击事件，也见证了此后美国市场的暴跌。当时，一位在伦敦当交易员的朋友告诉我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在袭击发生几天前，华尔街资本市场上一些与美国航空公司有关的金融衍生品出现剧烈资金波动。巧合吗？预先有关于恐怖袭击的传闻吗？是某些与中东有联系的人员透出的口风吗？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白纸黑字的数据就摆在那儿。这些现象之间的奇怪联系，从此被我牢牢地刻在脑子里。到了2005年，我把

“911”事件前美国航空公司股票的曲线图和波动情况与眼下安联公司的图表相比对，我发现某些地方非常相似。以什么样的姿态和策略应对市场，这往往是在对数据的细心比对中形成的。这一次就是如此。我决定做空安联的股票，准备赌一把大的，因为没有保证金，所以风险很大。

7月4日，我卖空了面值1500万欧元的安联股票。我原想当日清空头寸，免得在当日的报表中暴露出我突破了限额，但是市场走势和我期待的不一样，我只好再等等。3天以后，刚开盘不久伦敦市场开始猛烈下跌——用行话说开始“狂吐不止”。很快有传言说伦敦地铁因电力故障而瘫痪。阿兰·德克莱克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当即决定做DAX指数<sup>①</sup>，但是他准备做多，期待行情反弹。很快坏消息传来，多枚炸弹在伦敦地铁内爆炸。股市没有恢复升势，反而一路暴跌，并且迅速从英国传导到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地区。

---

<sup>①</sup> 德国DAX指数是由德意志交易所集团推出的一个蓝筹股指数。该指数中包含有3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DAX指数是世界证券市场中的重要指数之一。——译者注



我清空头寸，而后补仓，赢利 50 万欧元。阿兰因为采取了反向的策略赔进去很多钱，正心急如焚，一遍遍地重复他的口头禅：“完蛋了。”我安慰他说：“别着急。我挣了些钱，可以弥补你的损失。”他问我：“你是怎么操作的？”我跟阿兰讲了我的策略，他随即把这些情况向主管汇报。结果是我们两个都把主管给得罪了。

我的错处是事前没有告诉阿兰，阿兰的错处是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因为事情比较敏感，主管并没有声张，半是夸奖半是斥责地说了我们一顿。主管一面说我们不该闹出这么多乱子，一面又恭喜我挣到了钱。他又说，希望详细了解一下我的交易策略，同时还嘱咐我今后不能再这么做。几天之后阿兰提醒我，要我写一份报告，详细阐述建仓策略。我赶在外出度假之前写了封邮件，只是简单地谈了谈。哪个交易员乐意把自己的法宝一五一十地告诉别人呢？不管怎么说，这次的教训我是记在心里了，虽然说最后赢利了，但我决定今后还是要谨慎一点。

随后，我去比亚里茨度假，心情平静、坦然。阿兰·德克莱克打来电话：“伙计，你那点算盘我一清二楚。但你要知道你现在只是初级交易员，还没资格独当

一面。等你回来我们聊聊。”原来他查了我的电脑记录，从交易的细枝末节中发现我早在3天前就瞒着他建了仓，而且后来我的邮件中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天我整夜都没合眼，想着事情要遭了，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我一回去就和他一起吃了顿饭，我还记得那天是星期一。不出我所料，阿兰果然批评了我的做法，不过他又说愿意替我打掩护。说到这儿，他的言辞居然和几天前主管的说法不谋而合，他先恭维我，然后要我详细讲讲我的交易策略。末了，他告诉我说，我的资金权限已经提升了：“要是建定向型头寸，你可以用个两三百万欧元。”他只是口头说说，没有给书面的授权。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做法实在太怪异。这等于说他一方面限制了我的行动，一方面又提升了我的权限。或者说今后太过冒险的交易得避免，但同时还有随时做好冒险的准备（见下表）。从这时起我算是知道了，如果有什么大举动，我的上司是一定会给我打掩护的。

发件人：×××

收件人：×××

2007年12月17日22:59

主题：回复：工作评定

.....

7.（该员工）忠诚、刻苦，作风扎实可靠，努力提高效率，业务能力精湛。

8. 好士兵应当学会违背命令，要突破常规，过度审慎会引起疑虑情绪，导致裹足不前（这一点确实很难处理好），学会协调各种矛盾。

×××是部门的得力干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前台与后台支持部门之间强有力的、可靠的纽带，所以，应该放手让他大干。

法国兴业银行投资银行部

安联的事情让我开了眼。这次经历说明，金融界就是建立在上级这种自相矛盾的指令之上的。表面上，交易员个个都有一定的资金上限，无权突破；而实际上呢，又有一股力量鼓动交易员去突破自己的权限。冒险就冒险吧，上级唯一关心的问题似乎是冒险之后挣到钱了吗？上级主管跟交易员说不能冒险，但如果真有人冒险挣到了钱，又会反过来为他庆祝。交易策略太过危险吗？却又有人要求把这种策略上报，标准化后再推而广之。亏损的人会有麻烦、会有人追究吗？实际情况是亏损越多，上级主管和监管人员越是设法遮掩，同时装做不知情把自己撇干净。前台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在同一部门工作，有一次她和部门高管做例行的年度职评会谈，高管暗示说这位同事确实是个“好兵”，但是要她“学会

违背命令，突破常规”。简化成一句话就是：命令、规章一定要遵守遵从，但也要学会违背。

之所以有这样的种种乱象，其原因是金融界是层层联动的，因此个人主义和“风险自担”意识被奉为主臬，而且金融界内部还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家公司好比是一支军队，人人都为自己的部属打掩护，因为人人都害怕自己的上级抓住把柄。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那么多相互矛盾而又并行不悖的命令。这些命令既混乱又共存，恰恰揭示了金融界充满悖论、内部矛盾丛生的本质。其结果不言而喻：既然金融界非但不约束交易员，反而含蓄地鼓励他们去冒险，甚至在失败之后还为他们打掩护，那么那些被银行寄予挣钱厚望的交易员们怎么可能不冒险，他们的行为怎么可能不失控呢？3年的交易员生涯让我看清了这一点。我记得2007年的一天，埃里克·科尔代勒来向我打听：“你怎么就挣了那么多票子呢？”当时我不愿意向他详细阐述我的交易策略。随后，他跟一位同事说应当“把热罗姆的投资策略进行工业化的推广”。那个时候他确实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因为那一天我赌了5把，总共赢利1500万欧元，而整个交易操作前后不过一个小时。



关于银行内部自相矛盾的指令，我还可以举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银行高层明知交易员的某些业绩是通过非常规途径获得的，却全然不理睬，而且经他们的手之后这些违章的收益就从而打上了合法的印章，并且转而成为这些交易员今后必须完成的业绩指标。以我个人为例：2005 年我和阿兰两个人的总指标是 300 万欧元，结果我们赢利 500 万欧元；第二年指标跟着就变成了 500 万欧元，我打破指标挣到了 1 000 万欧元；2007 年我的指标立刻上升到 1 000 万欧元，而这一年我赢利 5 500 万欧元，要不是后来出了变故，相信 2008 年我的新指标一定会是 5 500 万欧元。

做空安联保险的股票，这是我第一次大额的投机交易。几个月过后我重新研究了 my 的投资方法，尽量使其多样化。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尽管最初可能非常有效，但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会渐渐失效，并最终完全消失。以做空为例，如果反复大额交易，结果会把市场给抽空。因此做了几次看空交易之后，我预计行情会上涨，决定转而做多。当时我对太阳能公司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个行业在德国正迅猛发展。这次建立的是多头头寸，所以交割期限会更长一些，因为股市从来都是“暴跌慢涨”，



绝无例外。我的新策略也一样，等到 2006 年才有了成果。那时我的收益将近 1 000 万欧元，差不多都是做投机交易挣来的。

下面再谈谈交易员和上级主管之间的关系。每年 12 月，公司高管照例要与每位员工单独面谈，主要任务是评估员工上年度的工作表现。对员工来说这次面谈非常之重要。无论你是何等职务，无论分属中台还是后台，所有员工都有权与主管面谈。但是，会谈的形式与内容却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交易员队伍之外的其他员工来说，面谈往往只涉及定性的内容，无非看看上年度取得了什么成绩，有没有犯过什么过失，听听员工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说能不能调动，要不要要求升迁之类。当然，面谈的时候主管还要给员工下达下年度的业绩指标。至于说加薪问题和奖金的数目，对于这种员工主管只会轻描淡写地略说一说，具体要到下年 2 月份或 3 月份才最后公布。以我为例，我当专职助理时拿过的最高奖金是税前 1.5 万欧元。

交易员则通常和自己的直接上级主管面谈，比如说  $n+1$ 、 $n+2$ 。这种面谈除了上面提到的定性的内容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的定量的内容，而且后者往往才是重头部

分。安排面谈之前，公司会要求交易员向上级主管提交一份材料，包括该年度的业绩、遇到的问题和下一年度的个人目标等。这份材料就是面谈时双方讨价还价的依据。无论这一年度发生了什么事情，材料里都必须老老实实交代清楚。

我记得 2006 年我有一笔交易出了问题，这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我刚刚接手一个新产品，该产品的一个参数的正常数值应当为 1%，但是产品上市当天有位销售员出了错，在发行条例里把该参数写成了 10%。因为银行内部都是通过自动软件交易的，所以我就以正常数值 1%下了些单子。有些客户发现如果以发行条例中公布的数值买入该产品，转手卖出时市值可以翻 10 倍，因此纷纷买入。我察觉异常，这才发现公布的数据有误，但此时距离产品上市已经过去两天了。那是个星期五，晚上我们一清点发现两天内损失了 200 多万欧元，用行话说这次是“定错了价”。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就算是银行自己出了问题也好，银行永远是只赚不赔的。交易所立即取消了那两天成交的一些单子，又组织销售员修订发行条例，将数值恢复为 1%并重新定价。银行中止了该产品的销售报价，同时自己以 1%不断买

入。这么一来客户就被套牢了，而且既得的收益也无法兑现。

有些客户对此颇有微词并要求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毫无结果。利用银行的疏忽牟利，这种好事只有在“大富翁”游戏里才能遇到，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既然银行本身所向披靡、无所畏惧，所以连交易所也站在银行一边。交易所作为整合资源的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绝不敢得罪像兴业银行这样的大型合作机构。交易所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只能竭力左右逢迎，所以它不敢得罪银行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件事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以大客户放弃潜在收益以正常行情卖出宣告收场。说是“以正常行情卖出”，其实是亏损，因为事件长时间悬而未决导致客户长期持仓，其间股市波动带来的损失不容小视。这场风波过程曲折，当年和主管面谈的时候我费了很多口舌才说清楚。

面谈进行到最后，主管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觉得奖金给多少合适？”我一时语塞，因为到底该得多少奖金我心里没谱。原因很简单：公司不允许交易员相互打听奖金数额，我想说就按惯例来给，可是我连惯例是多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新人，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

事。私底下闲聊的时候大家也谈过奖金的问题，但都只是猜想，更没有具体到某个人。如果说考虑一下业绩、级别和工龄，算出一个大致的数目，短时间内又不可能完成。所以主管这么问我时我想不出别的答案，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主管的话很俏皮，让我再次大吃一惊：“作为交易员，你得知道自己的价码嘛。”那么怎么定价？根据什么标准定价？我完全搞不清楚。这一点说明我很天真，起码是有点软弱。

报不出心理价位，我只好等2月份看他们赏给我多少。最后，2005年我的奖金是3万欧元，与我当年的业绩相比应该说定得相当低。当然了，面谈的时候主管就跟我说过，因为做空安联保险那一次我未获批准私自建仓，所以那次50万欧元的赢利不计入我的年度收益——不过这好像并没有妨碍兴业银行把这笔钱收入囊中。不管奖金怎么定，我没有丝毫的不快，因为我热爱交易员这个职业。

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的面谈，主管又问：“你觉得多少钱合适？”我说8万欧元。那一年我为银行挣了1000万欧元，报这个数目并不过分。银行最终给了我6万欧元。这已经不仅仅是指令层面的相互矛盾，完



全已经是在行动上公然自己打自己嘴巴。2007 年的奖金分配更加没有道理。我总共赢利 5 500 万欧元，当时负责同样业务的共有 8 位交易员，我一人的收益占到 8 个人总收益的一半还多。

交易厅里流传着种种传闻，说我所在的小组的奖金将要突破历史记录，而我本人将分得大头。年底的时候，在另一个楼层工作的一位交易员跟我说：“今年你可是赚大了，马上就要尝尝百万奖金的滋味了吧？”越是临近面谈，传言越是发酵。面谈时，我说希望获得 60 万欧元的奖金——我想这么说也可以证明我已经学会“给自己定价了”——主管们马上变了脸色，我明白他们不同意。马夏尔·鲁耶尔本人脸都白了：“嚯，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给你 30 万欧元吧。”商谈就此结束，我什么也没说，起身走了出去。身后的玻璃隔断办公室里，主管们又接着和别的交易员面谈。别人具体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看看周围一些人奢侈的生活方式——某某人买了房子，某某人换了新车——我可以猜出个大概。

2007 年的奖金就这样敲定了。因为后来发生了变故，到真正发奖金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公司一个半月了。



我那“狮子大开口”的报价和公司赏下来的奖金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我永远不得而知。

后来在预审期间，我知道了2007年一些同事和主管申请了多少奖金。老实说我真是被惊呆了。我的顶头上司埃里克·科尔代勒斩获70万欧元，马夏尔·鲁耶尔将近200万欧元……n+2以上的其他公司高管分得了怎样天文数额的奖金，引人遐思。但是这些人在预审的时候居然装出天真的嘴脸。他们居然声称之所以没有能够对我的建仓行为实施监管，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情，或者因为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甚至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推卸责任就能够逃脱法律罪名，就能够逃避良心的谴责吗？多维尔的那个周末，那些乌烟瘴气的小品已经说明了一切：首席交易员也好，主管也好，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从工作中能够获得多少个人利益。

奖金分配方式如云山雾罩，混沌一片。交易员间对此缄默不言，奖金的秘密似乎可以就这么一直保持下去，直到2009年9月《解放报》公布了一份清单，披露了部分交易员2007、2008两年领取的奖金数额。尽管报社在公布清单时隐去了相关人员的姓名，但是从

清单中可以看到两点：其一，某些人员的奖金数额高得惊人；其二，不同人员的奖金数额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与我同岗的交易员获得了100万欧元到200万欧元不等的奖金。在2008年1月24日负责清空我的仓位并直接导致亏损的交易员获得了855万欧元。套利部的一位主管获得了1070万欧元。

报社给相关人员打电话联系，希望确认一下清单上的奖金，他们口径一致，都矢口否认。还有一人这样反驳道：“你说的金额简直无法想象，全部是胡说八道。”报社请他提供真实金额，他又不肯说出来辟谣了。有位主管的回答比较坦率：“先生，对于这件事我无权和您探讨，也不愿意探讨。请您把我的名字从文章里删去。我要挂电话了。”兴业银行也立刻介入此事。清单披露的第二天，兴业银行给《解放报》发去一封邮件，威胁说如果报社胆敢公开清单上的姓名，银行就将提起上诉。兴业银行说：“这些姓名属于个人信息、机密信息……一旦公开，可能影响员工的个人生活。”银行为什么这么紧张？其实很好理解：交易厅员工获得的奖金数额高低不同，最低值与最高值的比率达到了1：12500，这个情况万一被员工和公众知道了，银行一定会受到

猛烈抨击。银行给报社发了邮件，但是在随后的公告中没有对此事作出解释。

还有一个情况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这件事也是《解放报》披露的。据称，兴业银行人力资源部曾经向经理们提交过一份面谈实用指南，题目是《薪金洽谈之原则》。这份文件的目的是细化向员工宣布不利消息时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所谓的“原则”也很简单：首先向员工公布奖金数额，而后说明确定这一数额的依据。比如说，当前市场状况、经济危机等，总之一定要遵循“公平的原则”。文件中还提到，无论面谈时发生什么情况，参与面谈的主管不得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并且必须“与公司保持绝对一致，确保公司的决定得到顺利执行”。换言之，就是要宣布决定，不讲情面，同时密切关注员工的反应。文件中还说，应当“将会谈中您说的话上报人力资源部，如果会谈期间遇到任何麻烦，应当一并上报”。可见这份文件的作用确实不小，听话的员工如何打发，叛逆的员工如何处理，办法已经都想好了。

年终时要有商定奖金数额的会谈，3个月以后还要搞一次宣布奖金数额的会谈。每到这样的关口，交易厅里的氛围总有些异样。一有人从那个“玻璃瓶子”里走

出来，所有的人都往他脸上瞅，心里揣度着他刚才跟主管说了些什么。时间似乎凝固了，大家都像在牌局上那样观察着对手的神情，想方设法要搞清楚对方到底拿了一手什么牌。

这种关头，会使诈的就是赢家。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谈得怎么样啊？”“一般般吧。”这句“一般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他已经得偿所愿，将来收到的大信封会比别人的鼓吗？或者说他的希望破灭了，大家该换上一副同情的面孔在心里偷着乐呢？谁也说不清。偶尔有些人控制不住，会发泄一下不满，攻击一下上司，甚至声称准备辞职。当然，从来都是嘴上说说而已。辞职能有什么好处呢？即便在猎头们看来，一个交易员要是拿不到高额奖金，那就说明他不入流，要不就是他表现平庸，起码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定价码。

不管怎么说，拿不到高额奖金的就是弱者，而银行业是只要成功者的。因为如果没有了“成功者”，银行系统本身也就要崩溃了。

## 6

### 自由与放纵

2007 年年初，衍生品交易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因此银行又组建了一个交易厅。新交易厅仍然位于双子楼的“夏萨尼”座<sup>①</sup>，但是搬到了另一层。

新交易厅成立不久，也就是 2007 年 1 月的时候，阿兰·德克莱克辞职并加入了法国汇丰银行。阿兰辞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汇丰提供了他心仪已久的经理职位，二是他和马夏尔·鲁耶尔交恶，无法继续共事。阿兰本想让我跟他一起去汇丰，我没有同意。我已经适应了兴业的环境，而且业绩一直还不错，所以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不愿离开。再者，我认为兴业银行对我有

---

<sup>①</sup> 兴业银行总部位于巴黎拉德芳斯区，为双子楼结构，“夏萨尼”是双子楼中的一座。——译者注



知遇之恩，有一种力量将我和它紧紧连在一起。

离职前阿兰没有按照规定提前通知公司，这之后他时常到拉德芳斯区来看我们。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说：“交易员工作好比是一台掌上游戏机，我想念它。”这句话朴实无华，却胜过了千言万语，它真正出自阿兰的心里，饱含他对昔日工作的迷恋与热切关注。

这个比喻又让我想到一位当交易员的女同事。一次年终薪金面谈，主管问她为什么这么热爱她的工作。这位同事列举了下面的四点：有趣味性；薪酬丰厚；有风险性，像是一场有趣的赌博；成功之后的喜悦。这位女同事毕业于名校，获数学硕士学位，当时整天只忙于输入繁琐的数字，虽然如此，看到她这样精练的回答，让人不禁担心她会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渐渐把工作混淆成一场豪赌。

阿兰奔向了他的新前程，公司需要重新任命一位新主管。埃里克·科尔代勒上任了，成为我的  $n+1$ 。此前埃里克在东京工作了几年，负责领导一个小组做高端的金融产品。我的一位同事分析得有道理，埃里克骨子里并不像个交易员。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上任后和阿兰的做法不一样，不怎么介入日常的交易活动。我还发

现他对风险过分敏感。交易员之间常常讥讽这类领导，说他们是“风险风暴”，埃里克就属于这种类型。他更愿意指挥团队成员工作，不太喜欢亲自坐到电脑前上阵交易。我和他关系还算不错，但还达不到我和阿兰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程度。怎么说呢，埃里克和我还没有过共同的经历，所以我们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过深的友谊。

我跟别的交易员不同，我觉得彼此间不应该超出同事的范畴，所以总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真正算得上朋友的只有两位。第一位和我有相同的工作经历，我们俩都做过中台的助理，但是他在金融界工作不久就辞职开办了一家餐饮公司。第二位是一个女同事，年纪很轻，当时在中台的“权证参考部”工作，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我的案子事发之后，她离开总部调到一家下属子公司去了。需要说明的是，兴业银行的员工在一个职位上一般只工作两年左右，随后就会被调任其他岗位。也就是说内部人员流动性很强。与此同时对于高端人才，来自外部的猎头竞争也很激烈。大部分的交易员如同雇佣兵一般，谁出的价钱高就为谁卖命。2007 年底，一家大型国际银行有意把我挖走，但我拒绝了。在此之前，年初的时候我也拒绝过阿兰的邀请。原因只有一

个：眼下的工作很适合我。

告别了阿兰·德克莱克时代，大家齐聚在埃里克的旗帜之下，工作仍旧照常进行，工作节奏仍旧快得吓人。和阿兰在任时一样，我从不在现任主管面前掩饰我的交易行为。相反，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2007年夏天，上级给我委派了一个助理。从名义上说我仍然是初级交易员，但是从配备专门助理这一点看，我差不多已经成了高级交易员了。而且我外出度假的时候，埃里克本人会接管我的账目，继续交易。

主管们对下属交易员的仓位状况是了如指掌的，单单下面这件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是年中的时候，我们的  $n+2$ ，马夏尔·鲁耶尔来到我所在的小组，他说：“在座的小松鼠们，有的往地毯下藏了榛子，现在该拿出来了……”言下之意是：“有人挣了钱又藏了起来，现在该拿出来摆到明面上了。‘耍小心眼’是玩不转的。”还要怎么说呢？马夏尔的这番话毫无疑问地说明他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交易厅里，无论做什么事都逃不过大伙的眼睛；无论发生什么事上级最后都会点头批准。

我的工作也不例外。2005年，我的第一次大手笔交易就动用了1 500万欧元，交易进行得很顺利，其间

唯一的一点波折是安联保险的股票，上级说这类交易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2006年，我仍然在做同样类型的交易，而且规模扩大了3倍，这次上级却什么都没有说，结果我的收益翻了一番，从500万欧元上升到了1000万欧元。这一年年末，我还曾第一次重仓位做空德国DAX指数，动用的资金达几亿欧元。我一直持仓到次年2月中旬，利用当时市场的短暂恐慌期迅速清空仓位，仅此一次就斩获2000万欧元。我高兴极了。2007年我的指标是1000万，也就是说我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超额一倍完成了任务，我的心情非常轻松。

此后不久，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投机机会。那是3月份的时候，次贷危机的问题开始显现，银行界渐渐躁动不安。我认为应该立刻重仓做空与次贷有关的期货。我想起在南特实习时经理对我说过的话，7年过去了，它终于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我判定，市场行情即将有下挫动作，我的预言即将实现。时不我待，必须马上行动。我一步步加大投入，最后总共动用了300亿欧元。然而行情并没有骤然逆转，我别无他法，只得继续重仓持有。这种状况一直从3月份延续到了7月份。这段时间里，我的潜在亏损额不断攀升，终于增加到了惊人的



20 亿欧元。看来我最初的预测有问题。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坚信次贷危机会拖累行情暴跌，所以一直笃定看空。没有想到真实情况却与我的预测相反，行情一直非常坚挺。我开始睡不好觉，不断地问自己：像这样不清仓，继续重仓观望，我还能坚持多久？

到了 7 月份，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巴黎国民银行宣布，无法正常评估其名下若干资产的清算价值，市场随机出现恐慌。我抓住时机清空仓位，斩获 5 亿欧元。我并没有就此收手。很快，我判定市场的下行走势还没有终结，于是又建立了 300 亿欧元的卖空仓位。没想到，市场继上次暴跌之后开始逐渐反弹！好在一个月之后，我寻机成功清仓，这次入账近 10 亿欧元。我不断地研究新投资策略，每天从早上 8 点直到晚上 8 点，两眼紧盯电脑屏幕，一刻不停地做投机交易，有时甚至一直工作到晚上 10 点。那段时间，行情一路下行，我清仓，重新建仓，等待新一轮下跌……我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一系列操作，仿佛成了一个喝醉了的醉汉。我的每一笔投机交易都能赢利，而且数额越来越大。有时候我每天能挣到几百万欧元，至少一天也有几十万欧元进账。到了这一年年底，我的业绩仍然在不停攀升。我不



仅补上了该年前半部分的亏损，年末时账面上还有 15 亿欧元的收益。上文中我已经讲到，我原本打算把这笔钱挪到下一年度再公布。到了 2008 年 1 月份，因为一些变故，我把这笔收益摆到了明面上，没想到兴业银行的一些高管竟然无法相信。

2007 年全年，我每天要做几百起交易，此外还要通过电话委托经纪人穆萨·巴基尔<sup>①</sup>做一些交易。老实说，我原本没有必要这样自找苦吃，而且按照公司制度，所有的交易都要通过自动程序完成。但是，像这样委托经纪人做部分交易，可以为我赢得时间。总的说来，我一共开辟了三条战线：第一条是公司制度规定的，即通过自动程序做开拓市场性的交易；第二条是纯粹以牟利为目的的投机交易，这类交易占据了我当年 9% 的时间；第三条是通过穆萨·巴基尔做的交易，目的是扩大赢利空间。

穆萨和我每天打几通电话，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们每季度见一次面，共同处理一下某些比较棘手的操作问

---

① 当时供职于法国兴业银行旗下的 Newedge 期货经纪公司，任经纪人。事发后，有人怀疑穆萨是本书作者的同伙。——译者注

题。我们的合作其实很有限，常常只能大清早时——有时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赶到银行——在手机里聊聊，彼此交流一下对行情走势的看法，说说各自发现了什么投资机会。

我的顶头上司们经常审核我的交易业绩，每天晚上还要问一句“怎么样，挣钱了吗”，可见他们对我的交易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位上司对我和穆萨的合作提出过意见，更没有划定什么界限。

不错，我确实在和经纪人合作；我确实在做投机交易，而且金额比同事们的大；我确实超越了公司给我划定的业务范围，也打破了一些所谓的限额；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虚幻的，和现实情况扯不上关系，而现实的情况就是每当我用这些虚幻的手段取得漂亮业绩时，周围的人们会向我祝贺。

上级只会给包括我在内的交易员们发布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指令，而我却在这当中左支右绌，艰难支撑，力争把工作做到最好。再说说我用到的那些方法，首先它们并不是我自己独立发明的，其次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我周围的交易员们和我一样都在用这些方法，只不过我的交易规模或许比他们大一些而已。既然如此，为什么我的上级在收到监管部门的反复警告之后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我收手呢？

按理说，我的上级和监管部门早就应该对我发出警告，因为他们曾经多次发现疑点，或者收到警告。有些警告很露骨，直接说我已经从市场开拓者变成了纯粹的投机者。首先，早在交易员超出其交易限额的时候，作为其上级的部门经理就会收到第一次警示。经理的电脑屏幕会实时显示团队成员的交易情况，而且因为系统设置了个人密码，所以只有经理一人有权修改下属交易员的资金上限。一旦某位交易员投入的资金达到了这个限额，屏幕上的示警灯就会点亮，这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功能没有事先被经理关闭，系统就会锁死，任何后续操作都将无法进行。

我的很多交易常常是明目张胆地突破了限额，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一层警示没有起作用呢？原因是经理自己乐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要么关闭了系统的这一级监管功能，要么一开始就主动调高了下属交易员的资金限额，调到了一个无法企及的额度。超资金限额交易的绝不止我一人，有位同事甚至有这么一句口头禅：“填鸭子当然越快越好。”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投资操作的本质。还是这位同事，主管与他做年度薪金面谈的时

候，居然还夸奖他“有良好的风险意识”。

第二层资金限额监管的技术性更强，因此也更有效。可以用个术语来表达：检查“方法误差”，解释起来可能比较枯燥，但是每一个在交易厅工作的人——即便是普通的助理——都能理解其背后的意思。像我这样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的人都知道，经手的每一种产品都有两个价格，需要将两者进行比对。首先有一个由官方牌价确定的“市场价格”，其次还有一个“理论价格”。理论价格由银行参考产品的现货价格逐日计算得出，所以其中包含了平摊保证金产生的成本。假设报价工作做得很好的话，这两个价格应该重合。如果两个价格之间存在0.1~0.2个点的微弱差距，通常是因为某银行机构签了大单从而拉低了保证金平摊费用，使其略低于市场预期价格。

之所以把这种差距叫做“方法误差”，是因为产生这种误差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同一数值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种是从市场角度考虑的，另一种是从银行的角度考虑的，后者的技术性更强一些。交易员为了和银行内部的计算方式相匹配，采用的是“技术型的方法”；而负责监管和账目审核的后台部门只采用市场价



格。当交易员的交易数据送到后台监管人员手中的时候，审核账目的人会发现两个价格之间常常存在极小的差距，通常在 0.001 左右。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进行账目微调，目的是把这种误差调节到零，同时消除因为这种价格差距导致的业绩上的误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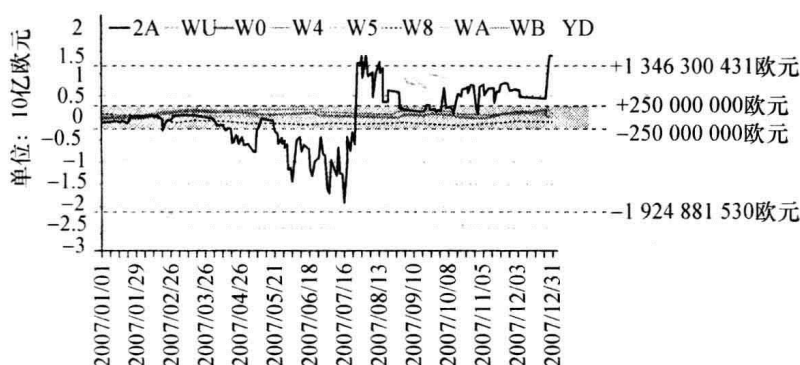
就我的交易而言，整个 2007 年间，中台、监管人员和我的经理们都曾多次发现其中有方法误差。其实，我的同事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唯一的区别是我的误差非常少见。第一次出现在 2007 年 3 月份，业绩误差达到了 800 万欧元；另一次突破了 1 500 万欧元。业绩误差已经这么大，说明背后涉及的票面金额肯定高得惊人，应该在 150 亿欧元上下。我的顶头上司说他不知道此事。我的  $n+2$  马夏尔·鲁耶尔、 $n+3$  菲利普·巴布兰也说不知道。其实，财务监管员们每个月都发出过警示，说误差数额持续上升，很不正常。

2007 年 7 月，又出现过数次方法误差，而且一次比一次金额高，甚至超出了正常值 60 倍。监管部门和我们逐个谈话，因为事态严重，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再纠缠相关交易的性质和规模，而是想和我们商量一个办法降低误差，免得稽核人员查起来数字太难看。反



复研究之后，经理们拍板，决定在后台部门也使用通过内部方式计算出来的“理论价格”。这种方法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一般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征得稽核部门同意之后才能采用。但是，既然我的顶头上司没有意见，稽核部门最终也认可了。于是，后台的会计们也很坦然地跟我的上级反馈，说误差已经搞定。

按理说，经理们应该还注意到了下面这类警示信息：流动资金余额。实际上他们每天早上都会收到各位交易员的余额状况。下面的走势图是根据预审期间汇总的数据绘制的，反映的就是我和其他负责同类交易的同事们的历史余额状况，既有余额净值也有波动情况。粗体的线条是我的余额，可以看到，最低的时候是负 20 亿，最高的时候突破了正 15 亿。虚线是同事们的余额，波动情况和我的完全不同。



流动资金余额曲线图

从2007年7月起，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步显现，各家银行均受到重创，资金流动性日益下降。要知道，经理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根据账目余额曲线图监督交易情况，那么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他们怎么可能对我账目上这么高的资金流动毫无察觉呢？预审的时候，埃里克·科尔代勒说，他确实曾经发现我的账目中有14亿欧元的余额，但是没有想到那是我挣得的收益。他辩解说，他当时以为那笔钱是我借的。当然了，向别人借15亿欧元，然后放在账户上任由它发霉，这完全是很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事情嘛！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还是2007年7月，因为做了几次虚拟交易，结果我向经理提交的业绩与会计部门实际查明的业绩之间又出现了误差，少了520万欧元。于是，我向上级申请调整账目，把缺少的这部分钱计入我的业绩之中。经理以其中存在技术性问题为由把皮球踢给了股权与衍生品部共同主管，之后没有什么波折，申请被批准了。经理找出的借口让我吃惊。只要是稍有金融知识的人就能知道，这种解释完全没有道理，简直是一种侮辱，更别说对主管这样推脱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情况需要在此做一些介绍。要想建立投机性仓位，首先必须通过自动交易系统发出申请。申请受理之后，交易所会给兴业银行发一份确认回执。只有银行确认之后交易指令才能执行。这份确认回执将同时自动并入银行的各个计算机系统，第二天一早监管部门的人将对其进行审查。如果某项交易当天没有平仓，那么我常常在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直接在Eliot系统做一笔反向交易。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会佯装和一位陌生经纪人做这笔反向交易，交易对手是虚拟的，这么做的目的是在前台的系统中隐藏我的投机交易。

为了应付监管方面的要求，我还会假造一个针对交易对手的保证金操作。具体来讲：我投机买入了股指期货 $y$ ，共计 $x$ 手；同时我又卖出了股指期货 $y$ ，共计 $x$ 手，后面的这个操作是手动完成的虚拟操作，对手是对银行来说完全陌生的经纪人。两项交易相抵消，在前台系统上就显示为零，我的仓位就被隐藏起来了。

这两个交易中，第一个是真实的，交易信息将直接送达后台部门，和交易对手之间的资金交付通常在第二天完成；另一个交易是虚假的，其信息只局限在缓冲区之内。暂存在缓冲区中的交易，如果缺少某些必需信

息——比如对手经纪人的身份、资金动向等——就必须暂停并且每天接受检查，等待信息完备且得到负责审核与付款的部门联合批准之后才能继续进行。

再者，如果想做期货交易，就必须在买入的次日缴付保证金，而且每天须根据行情波动补足保证金，否则交易所会强行平仓。因此，如果某项期货交易只停留在缓冲区层面，那就说明还没有发生实际的支付行为。因此，监管者看到这里就应当明白这次交易是虚假的，或者说起码应该认真分析一下这次交易的实情。而我的一些交易可以在缓冲区放上 20 天，总金额可以高达 300 亿欧元，但是从来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异常。既然没有人关心，自然也就没有人向我索要过什么额外的信息，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有提供过额外的信息。对手的身份？不知道。对手付款没有？还是不知道。而且，银行也从来没有给这种交易对手付过钱，有时候可能到期日都过去二十几天了，也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银行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是欠了什么大笔钱。

2007 年，我曾两度用这样的方法建立了很大规模的投机头寸，但是包括经理、负责检查缓冲区的监管人员、后台人员在内，没有一人曾对此表现出格外的担



心。而且，直到我自己平仓时止，每次的头寸信息都一直局限在缓冲区这个阶段。

2007 年 3 月，监管人员第一次发现会计部门查明的业绩与部门经理审核上报的业绩之间存在误差，总计达 9 400 万欧元（从下文的邮件<sup>①</sup>中，读者可以看到邮件里先后提到了“8 800 万欧元、600 万欧元”两个数据）。他们立即通知了我的上级，大家可以看到这封邮件里已经直接用了“虚拟交易”这样的字眼。可能正因为这一点，邮件主题才特别注明“重大”二字。

|                       |                      |
|-----------------------|----------------------|
| 发件人：×××               | 收件人：菲利普·巴布兰          |
| 2007 年 4 月 16 日 13：13 | 马夏尔·鲁耶尔              |
|                       | 抄送：×××，×××，×××       |
|                       | 主题：2A 团队股指期货交易出现重大误差 |

你好：

特此通知，我部门发现 2A 团队 6 月份的 DAX 股指期货交易出现 8 800 万欧元的误差，2007 年 3 月 30 日一笔远期交易出现 600 万欧元的误差。

误差的有关信息如下：

上面提到的期货交易信息不完全，所以还没有入账；

---

① 邮件中“2A”指的就是我所在的团队，所谓“不完全”是指交易对手的身份尚待查证。



远期交易未获得 Clickoption 部门认可，所以我部门只好在账面上将其删去。

上述交易均为虚拟交易，虽然目前已经发现问题，但仍然无法准确评估其赎回价值。

今天下午早些时候，相关的交易员曾经传来受影响权证的名录，但是其中没有包含上述交易。风险部门目前尚不能确定其确切价值，因此我部门对上述期货与远期合同进行增值操作。

感谢您的关注！

马夏尔·鲁耶尔对此没有做太多表示。菲利普·巴布兰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这个误差是怎么回事啊？你惹的乱子，你自己解决。”我给负责业绩审核的中台部门发了封邮件，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我说我的账目管理出了点问题，所以有几笔期货交易暂时没有支付保险金，再过 5 天我会重新计算价格，问题就能解决。然后我利用那几天时间，在系统中随便假造了一个身份，补上了那一部分差额。

按说我的解释有点牵强，解决办法也不太妥当，但是中台的监管人员也认可了。风险控制部门的主管核准了这次交易，而且作了必要的调整，最终把它归在了“其他交易”的账目里。我发邮件解释之后，菲利普·巴

布兰还曾对我说：“干得不错。不过以后的交易要多加小心啊。”当然，我没有按他说的办，没有“多加小心”。恰好相反，我进一步扩大了虚假交易的规模，只是尽量不引起周围人的担心。但是各级的主管其实都知道我名下有虚拟交易。

案件事发之后，会计部门的主管曾经被叫到经侦大队接受询问，他的证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警察问他：“我们再说2007年3月会计结算中涉及的交易，这几笔交易是虚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此有多少了解？”主管回答说：“实际上，负责业绩审查的中台部门、金融监管员、热罗姆·凯维尔的上级经理们都知道这些交易是虚拟的。”简单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谁都不采取行动。事情说起来离奇，但确实就是如此。

这之后一个月，负责业绩审核的人员又发出了一封邮件。这次接到邮件的是我的3位顶头上司：埃里克·科尔代勒、马夏尔·鲁耶尔、菲利普·巴布兰。这回不再是9400万欧元的误差，而是1.42亿欧元。上司给我看了邮件的复印件，我正在读邮件的当口，埃里克·科尔代勒从他的座位上站起身和马夏尔·鲁耶尔谈了点什么。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两个人突然都转过脸

来看着我。目光交错之中，我想接下来他们之中肯定有个人要过来和我谈谈了。结果他们俩什么都没有说。会计部门问他们：“我们可不可以像上个月那样处理呢？”我的上司同意了，这样一来，2007年3月份的做法就成了惯例。

时过境迁，如今我追想那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他们肯定会找我谈话的。搞不好会骂我一顿，再不济也要谈谈我闯下的祸。我仿佛就要跌进疯狂的深渊，来个人和我谈谈或许可以让我止住脚步。当时我自己也隐约觉得我突破了理性的界线，就像是一部机器，一旦启动就不知道怎样才能停下来。我又想，如果硬向上级要求终止这些交易，那不正好证明这些人完全清楚其中的内情吗？倘若把这些交易比做一部齿轮传动系统，那么他们本人就是这个系统上的部件，把这一切抖搂出来，他们能乐意吗？从4月到5月，以及接下来的6月、7月，监管部门和我的上级主管不断发现新的虚假交易，数额越来越大。他们一律照3月份那样处理，业绩账目上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一律通知会计部门相机解决。他们这么做一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如果统计一下，2007年全年我差不多做了1000笔

纯投机性的交易。各笔交易涉及金额不等，但是曾经两度高达 300 亿欧元——上文我已经说到过。每做一笔投机交易，我就要在系统中编造一个虚拟的交易对手。据我的回忆，后台部门全年曾先后 3 次过问对手经纪人的身份问题，3 次都是给我发的电子邮件。但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这个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

预审期间，我的上级主管百般抵赖，找出的借口五花八门，这正好说明他们的失职。有位主管说自己出差去纽约了，所以第一批 300 亿欧元的交易他完全不知情。他又说第二批巨额交易——同样也是 300 亿——发生的时候，他倒确实是在巴黎，但是因为此前的第一批交易已经由他本人的上级核准了，所以第二批的他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另一位主管借口说监管员发来的材料，有关交易金额的那一段他没有读到。

主管们的说辞虽然荒唐，但他们的心迹却显露无遗：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虚拟交易，而是如何使这些交易永远藏在暗处不为人所知，或者说如何才能使自己置身事外，免得将来授人口实。

我的交易员生涯是在极度不安中开始的，这种不安源自于每天经手的巨款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久而久之，我慢慢习惯了，对此视而不见。日复一日的赢利让我失去了清醒的认识。我陷入一种麻痹状态，我竭尽心力，怎么对银行有利就怎么做。2008年1月陆续发生的事情把我从梦境里惊醒，将我重新拉回到现实之中。银行系统的脆弱、我自身的脆弱、工作权利被剥夺、媒体的喧嚣、毫无依据的攻击、法律的审判，这一切一股脑向我袭来。交易员的生活让我经历了情感的高潮与低谷，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人或许会问：不管怎么说，你好歹发财了吧？不错，当时我日子过得还算富足，但也仅仅只是富足而已。截至2008年事发时为止，我的税前年薪还只是在5万欧元上下徘徊。



## 司法裁决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7

## 拘 留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我从床上爬起来，其实这一夜我根本没能睡着。此前一天兴业银行发布了公告，而后各种传言四起，对我横加指责，大肆挞伐，整整一天都没有停歇。我得出面辟谣证明我没有出逃，我得找律师为将来的辩护做好准备。

晚上，母亲、哥哥和我很晚才休息，我们一个台接一个台地看各种新闻节目和访谈，听着各种各样的无礼的评论。有些金融界业内的专家用很俏皮的口吻挖苦我。我之前和他们多少打过一些交道，他们多数在一些和兴业银行有往来的咨询机构工作，从这一点看，他们的立场已经有点可疑。再者，虽说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在交易厅工作的经验，但言语之间没有表现出一点点应有的审慎精神。按他们的说法，我在一个强调透明

和监管的行业里做下了一桩惊天的丑事，我寡廉鲜耻，使银行亏了巨额的钱，我就是个流氓无赖。我是混迹于洁白如雪的羊群之中的一头特立独行的黑绵羊。这些话让我痛苦，更让我恶心。兴业银行自己发布公告，点起了一把火，现在又摆弄这些所谓的专家，妄图控制住局势。

前途未卜，这一点更让我揪心。既然我已经辟谣说根本没有出逃这回事，那就意味着我还在巴黎，成群的记者已经开始搜寻我的下落，我怎样才能逃过他们的围追堵截？我还要遭受什么样的打击？警察传讯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母亲会怎么想？媒体汹涌的宣传浪潮她能受得住吗？这样一想，我不再恐慌了，我只觉得愤怒，对媒体上连篇累牍的谎言的愤怒。仿佛是有两股势力正在悬赏捉拿我，首先是那帮无所不能的记者，他们千方百计想拿到我的照片，其次是兴业银行，处心积虑要把我打倒。

媒体的报道五花八门，有些记者拿我的家事含沙射影地攻击我，这让我大为震怒。记者说，我先是因父亲去世而深受打击，随后哥哥又和他的老板发生龃龉，这些负面因素累加在一起，让我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加脆

弱。他们实际上就是编造一个混乱的家庭场景，然后把  
我安插在里面。我无法忍受这种胡编乱造。我的案子归  
根到底只和我的职场生活有关；而我的过去、我的成长  
经历与案子毫无关系——更别说记者们捕风捉影，随意  
捏造了。

我的父亲于 2006 年以 70 多岁高龄辞世，虽然去世  
前饱受病痛折磨，但是此前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平静  
安详的。我像普通人一样，为父亲服丧。父亲患病期间  
我没能多多地陪在他身边，我觉得格外自责，格外痛  
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我没能抽出时间去看他，没  
能和他最后说说话，而这都是因为我全部的精力投到  
了工作中。噩耗传来的时候，我无法正视，唯有更加拼  
命地工作才能稍稍平抑满心的悲伤。兴业银行成了我的  
避难所，躲在里面就可以暂时把个人生活中的痛苦抛在  
脑后。直到几天以后我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时我才真正  
明白过来。站在父亲的遗体前，我不禁放声痛哭。父亲  
是永远离我远去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把现实生活压在  
心底，一天 12 小时在兴业银行卖力工作，这一点将永  
远铭刻在我脑海中，绝不会忘记。但是，一回到巴黎，  
疯狂的生活旋风般又启动了，我又像往常一样低下头努



力工作。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媒体对我个人的经历含沙射影的报道会刺激我的母亲，会让她想起丧夫的痛苦、晚年寡居的艰难，想起她孤身一人在空旷的旧居里的孤独生活。母亲是个性格谨慎、内向的人，很少对外人吐露自己的情感与感受。这一点上，我和母亲很相像。她怎样才能渡过眼前的难关呢？再过几天母亲就要返回布列塔尼了，家乡肯定也会有许多风言风语，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揪心。我希望母亲能够生活得平静、祥和，不要受我的连累。

母亲不大读书看报，也不喜欢看电视，不知道也不关心互联网。这么看来她或许还不完全清楚眼下的事情闹得有多么大。但又或许她所知道的那一点点已经是常人难以承担的了。无论如何，我希望她能摆脱这件事情的影响，不要卷入其中，成为这场由兴业银行挑起的战争的牺牲者。我是这么希望的，但现实往往不如人意。那些天，我明显感觉到外界的蜚短流长在我的家庭内部留下了伤痕。我记得当时因为一时没压住心里的怒气，我还给女友发过这样的短信：谁敢动我的家人一下，我一定要他好看。

这天上午，我得去见梅耶尔律师。考虑到事务所门口已经有记者蹲守，梅耶尔律师说她有位计算机行业的朋友在勒瓦卢瓦有几间办公室，建议我到那儿去和她会面。地铁里人很多，绝对不能坐，打电话叫出租车也不行，因为叫车就必须提供地址，提供地址又必定要提到哥哥的名字——“凯维埃尔”这个姓氏已经太敏感了。我和哥哥只好徒步走出圣-拉扎尔街区，沿路寻找出租车。我们飞快地走着，我心里怕极了，低着头，感觉周围的人都在盯着自己，仿佛随便哪个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有可能认出我来。终于拦下了一辆车，一路上我尽量往后仰，脊背紧紧抵住座椅，小心翼翼的，生怕在后视镜里和司机来个四目相对。

我按照约定找到了梅耶尔律师和她那位计算机行业的朋友，开始向他们详细讲述我的工作。这花了好半天时间，因为要讲的东西很多，而且比较复杂。我向他们介绍各种交易技术，说明哪些交易是我经手的，哪些交易不应当由我承担责任，最后还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说兴业银行自始至终完全了解我的一举一动。此前一天我已经收到消息，银行已经对我提起诉讼，但是起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梅耶尔律师和我还都不清楚。梅耶尔本人

并不是刑事律师，而案件涉及的内容非常专业，一上手她就觉得很吃力。这个时候，那位计算机专家说他跟法律界的人很熟，而且经常和律师们合作。他推荐了一位律师，说一定可以帮上我们的忙。这位律师名叫克里斯蒂安·沙里埃·布纳泽尔，时任律师公会会长，据说有“律师公会男高音”的美誉。我们和克里斯蒂安商量好第二天（星期六）上午到他的事务所面谈，事务所位于福煦路。

然而，就在这天晚些时候，拘留通知书下达了，要我第二天也就是1月26日去经侦大队报到，时间是下午3点。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梅耶尔律师安慰我说银行起诉之后经侦警察按理就会组织听证，这完全是常规流程。这天夜里我听从律师的安排到那位计算机专家家里借宿，这样我一来可以理清一下头绪，二来第二天可以早些去见沙里埃·布纳泽尔律师。

晚上，我和计算机专家一家三口正在吃饭，女友发来短信告诉我电视新闻里刚刚报道说警察正在搜查我的住所。我顿时火冒三丈。警察完全可以和我联系向我要钥匙啊！我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完全可以很痛

快地给他们。警察一定是撬锁进屋的，等他们搜查完房子就没有丝毫防护，完全暴露在众人面前。这样一来别人想进就进，而我身为房屋的主人却再也沒辦法回去。连请家人去一趟都不行，因为这时候我的住处外一定里三层外三层都是记者。

几天后媒体公布了我住所内物品陈设的细节，报道中又加入了记者的一些主观臆想。警方在我家里找到了一本《古兰经》，以此为题在记者面前大做文章。这是赤裸裸地侵犯我的个人生活隐私，警察的这种行径使我愤慨。此前银行的某些领导发表过一些言论，污蔑我是恐怖分子，如今媒体借机再次援引这些话，竭力想要证明我与基地组织有所联系。

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胡编乱造。某些记者的编排令人错愕，他们说我对伊斯兰教怀有浓厚的兴趣一直在认真研读，努力探求其中的真义，还说我把《古兰经》奉为圣书，在研读中感受到极大的教益。我问了自己很多问题，始终不得其解。家里有本《古兰经》，这有什么可疑的？退一步说，即便真对伊斯兰教感兴趣甚至于亲近这个教派，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再者，这个案子完完全全是一个金融事件，那伙人怎么能把宗教问题搅和



到里面去呢？说实话，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对所有穆斯林的蔑视与侮辱。

我躺在床上，感觉非常累。想睡一会，却怎么也睡不着。眼下即将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焦虑，这些问题轮流在我脑海里翻腾。我觉得自己被吊在了一口深井的上方，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底的虚空。第二天清晨，那位计算机专家陪我步行去沙里埃·布纳泽尔律师的事务所。时间很早，太阳刚刚升起，大概是7点半左右。巴黎的街道静悄悄的，我们走过几个街区，远离了大都市平日的喧嚣骚动，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雅致。一股强烈的情感涌上我的心头。连日来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从天而降，好几个夜晚我都无法入睡，而这天下午我就要被拘留了，我的心情却异常平和起来，仿佛一切事情已经离我远去了。

我们停下来抽了会儿烟，计算机专家进了卖烟的店铺，我站在人行道上等着。街道上车辆很少，行人也不多，几只鸟儿在树叶间喳喳叫着，衬得周围更加寂静。有那么几秒钟，我闭上了双眼，想要好好品味一下风暴暂停之后这转瞬即逝的宁静。我在想，生活真是个怪东西，一面是那么温婉美好，一面又那么反复无情。



梅耶尔律师也到了，正在沙里埃·布纳泽尔律师的事务所等我们。这是我和这位律师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感觉很好。他先就我的材料提了些问题，我一一回答，而后跟两天前对梅耶尔律师讲的那样，把各种情况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介绍。接着，这位律师公会会长向我讲了拘留的情况。他说拘留的流程没有什么变化，但这次经侦警察可能会从精神上、心理上寻找突破口。我将被搜身、填写身份调查表、被关进牢房……律师一五一十说得很详细，我听得也很认真。但是我恍惚觉得他说的这一切仿佛全然与我无关，都将由另一个人去承担。

这种感觉很奇怪。一周以来，我一会儿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整个事件的中心，一会儿又觉得似乎已经跳出了圈外，变身为一个旁观者，从远处看着这一切。沙里埃·布纳泽尔律师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就是如此。我只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律师所讲的这一切确实与我息息相关。

律师建议我不要空着肚子到经侦大队去，于是我匆匆吃完一个三明治。动身的时间到了。记者们一贯消息灵通，这会儿恐怕早已经在经侦大队门口守候多时了，为了避开他们，梅耶尔律师已经和警察们谈妥，先和他

们秘密见个面，然后再去经侦大队。

下午1点，梅耶尔律师和我一起上了出租车，目的地是第十三区的一个小广场，距离经侦大队不远。一路上我仍然竭力躲避着周围人的目光，但又想到梅耶尔的相貌现在已经为公众所熟知，恐怕我再怎么谨慎都是枉然。到了见面地点，司机将车停下。从另一辆汽车里下来两个人朝我们的出租车走过来，边走边向四处张望。出租车司机觉得非常诧异，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我们就下了车，上了人行道。

两位警察带着我们朝一辆深色玻璃的小卡车走去，替我们拉开车门。刚刚一上去，车子就立刻启动了。一旁的警察说，他们之所以装备这种挂普通号牌的民用车辆，是专为执行秘密任务用的，他们管这种车叫“潜艇”。警察又对梅耶尔说：“您现在坐的这个座位，我们叫它‘厕所’。”警察的话打破了车内沉闷的气氛，平添一丝幽默。整个过程中，警察没有表现出蔑视或者傲慢的意思，就是老老实实在地完成差事而已。而我呢？刚刚经历的这一切都是陌生的，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秘密会面、坐“潜艇”车、开玩笑的警察……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演电影。

我看不出车子走的是什么路线，没过多久突然听见一阵汽车喇叭声，车外一片沸腾。警察说：“是那帮记者。”接着车子减速，下了一段斜坡，好像正要开进一个停车场。车门打开，我们已经到了经侦大队。梅耶尔律师对我说了一两句打气的话后离开了。我独自一人和一群警察待在一起。这会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成了事件的主角。

沙里埃·布纳泽尔律师说得不错，要办的手续很多：填写调查表、脱掉衣服、搜身、提取DNA，等等。鞋带、腰带全要抽出来，随身带着的证件和几件个人用品全部上交，连我带的一包香烟也一并上交了。非得这么做吗？没错，非得这么做。有位警察安慰我说审讯中间休息的时候可能会允许我抽一两支烟。我一面对他表示感谢，一面想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要依靠这些陌生人了，不管有什么事情我都得耐心等他们批准，让他们拿主意，听他们的话。

警察只是办差，没有什么立场，而且其中有一两位看上去还特别随和。于是我大着胆子问：“照您看得审讯多久呢？”

“24个小时吧，必要的话也可能延长一点。估计你

这个情况就要延长，可能要 48 个小时。”这对我是个打击，我没想到还要在拘留所里过夜。既然是个单纯的听证会，我原以为当天应该就能结束。

接着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体检。医生个子不高，乐呵呵的。量了血压，检查了呼吸，医生问我是不是在接受什么治疗，得没得什么病，我都回答“没有”。结论是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可以拘留。体检结论是下午 3 点半下达给我的，当时我已经在接受第一轮审讯。

审讯室相当狭小，布置成冷清清的灰色——后面几次审讯的地方也大抵如此。我的座位正对着窗户，结果对面大楼里的一户居民从自己家里拍到了我的照片。参加审讯的总共有 3 个警察，其中有位女警察，她是个中尉。审讯过程中，主要由她负责提问，一面问一面把我的话输入电脑里。这个警察将近 40 岁年纪，金发，面容姣好。她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又会微微地笑。另两位都是男警察，他们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没说什么话，但是听得很认真。

这一次审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跟后面的审问一样，警察和我之间彼此很礼貌，一直相互用“vous”称呼。我先被问了些简单的问题，包括我的各种个人信



息、求学情况、工作经历、我的职位情况、上司的姓名及那几天我的日常安排等。短暂的休息之后，他们又接着问我的薪酬、奖金和资产状况。我一一回答，又特别补充说明我没有股票，也没有海外账户。

接着又休息了一会儿，其间我和警察们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对我的案子很感兴趣。这些警察对银行业都没什么了解，所以十分好奇。他们大多没有受过金融方面的教育，其中只有一位学过经济与企业管理，另一位曾经在检察院干过。他们细细地打听，认真地听我讲。等我说完之后，大家都明白银行并不像其自我标榜的那么清白，而我也不像媒体和银行描述得那么黑。我跟警察们说的话与兴业银行的官方公告相比，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听了我的话后，警察们对兴业银行的一面之词不再像先前那么笃信。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我尽可能地一一回答。

从我的回答中，他们应该能够体会到，他们心目中对交易员这一行的印象与我的真实生活可谓天差地别。我没有挣到几百万欧元，没有开上保时捷。我和众所周知的经侦大队的常客——塔皮、梅西耶、弗洛克·普利让、戈蒂埃·索瓦尼亚克之流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有人



问我是不是挪用了银行的钱，这让我有些生气，我回答说：“你们搜查的时候也该看到我的屋子了吧？才 45 平方米，也没有挂什么大师的油画，用的还是宜家的家具。有些亲友经济上有困难，我的奖金全拿来资助他们了，你们可以去查。”

我希望他们起码能从我的话中看清我对待金钱的态度，钱并不是我最为看重的东西。最后，有位警察可能出于好玩心理拿出张 500 欧元的钞票要我给他签名，我一口回绝。场面顿时冷了下来，但我想他们应该能体会到我和美国电影塑造的贪得无厌的交易员形象有本质的区别，倒是和他们这样的普通人更加相似。

后来吃完饭，第三场听证会开始了。这一次花了 5 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 1 点多才结束。听证会一开始，很快就涉及到了案件的核心问题。那位女中尉似乎已经掌握了金融技术方面的确切资料，对案卷也相当熟悉。她提的问题非常精准，总能够切中要害，这让我有些吃惊。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就在这个当口，兴业银行选派了多名职员赶赴“火线”，一方面好言拉拢警方，一方面又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综合资料。兴业银行这种越俎代庖的行径不仅干扰了警方的调查工作，同时还把警方的思

路引到了他们设计好的路线上。

就这样，那位中尉警官先大量援引兴业银行对我的指控，而后问我对此有无异议。我承认自己确实曾经先后假造并删除虚假交易，但否认其他所有指控，尤其是其中的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挪用资金、违反规定超越职务权限等条款。什么权限？什么规定？我何曾盗用他人的电子身份？我一向只用我自己的。案发以来，兴业银行所说的一切完全都是无稽之谈。我向警察解释我担任的职务——市场开拓者的职责是什么，一再向他们说明任职以来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多为银行挣钱。接着我以2005年安联保险那笔交易为例，阐述工作中我采用的各种交易策略。我提醒警察说，安联保险交易之后我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上级还大幅度提升了我的资金权限，公司甚至还以这次交易的收益为依据为我制定了下一年度的业绩指标。

就在我回答警察提问的时候，时常有一位警察走进审讯室给那位中尉递纸条。我当即想到经侦大队肯定已经召集银行方面的人做了听证，与会的可能是我以前的同事或上级，具体是哪几位我不清楚。也就是说兴业银行已经赶在我前面给出了他们自己的说法，眼下警察的

提问其实只是想澄清其中的一些疑问而已。

漫长的审讯终于结束了，我被关到牢房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那3天里我面对不同的听众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相同的问题，我感到极度疲惫和烦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让这一切赶紧结束。这个时候有个人走过来，可能是要看看我状态如何。他说：“要我们说，你就是在代人受过，你替别人背了黑锅。”这句话真是说到了我心坎里。

关押我的牢房挺干净，面积也不小，这让我稍稍安心了一些。但这种放松的心态没有持续太久。那天晚上我怎么都无法安睡，总是睡了一会儿就马上醒过来。我干脆开始回想当天几场审讯的全过程。回答警察提问的时候我有没有把话说清楚？警察把我的话记录下来写成了书面报告，那报告上的内容和我的回答是否一致？我想到如果那份报告上面的内容和我说的有差距，将来可能会对我不利。审讯进行到最后警察让我在报告上签字，当时我实在是太累了，精力无法集中，再加上报告又特别长，我可能没有认真全部读完。想到这一点我非常担心。不出所料，又过了几个星期我重新读到了那份报告，怎么也想不通当初我怎么会在这种东西上签了

字。我早就听说过警察的能力，要你签什么你就得签什么，想要谁签谁就得签，现在我算是知道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了。

我和衣而睡，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因为警察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换洗用品。我没有换洗的内衣，连牙刷都没有。第二天早上我只好从洗脸台上撩了点水，勉强擦了擦脸。彻夜未眠，没有洗漱，精神紧张，我就这样接受了新一轮的审讯——时间是早上8点。

一上来，中尉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念了一大通案情，中间不时问些问题。中尉说想看看对我昨天的辩词理解上有没有什么谬误之处。我并不傻，我知道她真正的意图是要看我回答的时候会不会前后矛盾，露出破绽。于是仅安联保险事件一点就纠缠了老半天，显然这是中尉最关注的问题。

安联保险的交易是整个案件的起点，如果我原来的上级不能就这一点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所谓“没有人知道热罗姆做了些什么”这种说法就无法让人信服。我向警察解释，银行有逐日上报的制度，所以交易员动用资金的情况完全是透明的。

接着中尉问我在工作中是不是对自己缺乏信心。我



说完全没有这回事。没错，交易厅里名校毕业生一抓一大把，综合性大学出身的相对较少，但我并没有因此觉得有什么不自在。恰恰相反，我不是靠炫目的文凭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走上了交易员的岗位，我很自豪。

我觉得这么回答意思已经很清楚了。没想到检察院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竟然还是曲解了我的意思。检察院说据查实我“认知方面有问题”，又说我处心积虑想要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交易员”。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首先，我虽然在学业上略有不足，但是凭借勤恳的工作逐步被提升为交易员，这段工作经历我很满意，完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再者，即便我真要在人前夸耀业绩，那么我挣到的 15 亿欧元已经足够吸引眼球的了，何必再去做别的交易？检察官的这番言论完全站不住脚，但是却正中媒体和公众的下怀。在此之前，一些人竭力在我的案子里寻找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而最终一无所获，恰好这时候有人似乎挖出了心理层面的动机，所谓聊胜于无，这岂不正合了他们的心意？

接下来，中尉又转而开拓另一条新的思路。她问我那么热心地追求利润，是不是受了奖金的诱惑？这种没有根据的揣测简直用不着我开口反击，这些年来我获得



的奖金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我觉得警方并不是在分析案情，而是想方设法要在我身上挖掘动机。其实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个人利益完全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我一遍又一遍地向警察们证明解释，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们就是不听。他们一门心思地要探究我的内心，了解我的想法，捕捉我的弱点，寻找深层动机，他们甚至推测我的行为是不是出于对银行的报复。只可惜他们要找的这些东西我一点也没有。除了有点太过谨慎，不愿意流露个人情感之外，我自认为心理上非常平衡。工作上我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标：既然公司给开了薪水，我就要把工作做到最好，或者说就是要给银行“挣到钱”。

随着案件调查逐步向前推进，我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我很难向别人证明一个人可以抛开其他一切因素，真正满怀激情地热爱他的本职工作。大家都不相信，不管涉及的职业是什么——当然，交易员这一行也不例外。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就我而言，我之所以干交易员这一行，不是因为我骨子里是一个赌徒，不是因为我唯利是图，更不是因为我心理上有毛病。我干这一行并且

为此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时间，只是因为我从中体会到了极大的乐趣。

我喜欢那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快速的交易操作和从中感受到的激情，我喜欢交易大厅的氛围，以及那满墙的电脑显示屏和屏幕上不断刷新的图表、曲线和一排排的数字。我更喜欢快速交易之后从容的回顾与思索，比如为什么这次交易成功了？为什么这次被套牢了？我喜欢成功带来的喜悦，也能欣然接受举棋不定的犹疑和失败后的战栗与反思。我喜欢工作中那种高度警觉的精神状态，时刻期待着捕捉获利机会，与时代的脉搏保持同步。

不错，工作之后我确实中止了体育锻炼，然而交易员这个行业其实和体育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追求成功，追求超越，不仅体育是如此，金融交易也是如此，连随之而来的疲惫都是那么相似。奖金当然也是我喜欢的，但是远远排在上面这些因素之后。这些是我的真实想法，审讯中我也曾经这样原原本本地讲给中尉听。

这场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短暂的休息后我吃了个午饭。审讯结束前，中尉告诉我拘留期限将延长 24 小时。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梅耶尔律师来看望我，时间

很短。她问了问我的状态，要我耐心些。她说警察现阶段的目的尽可能地从我口中套话，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所以我一定要挺住，要显得平静、顽强。但是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一想到还要在那儿过一晚上，我心里就发憊。再说了，警察已经审了我一整天，再加上一天又能有什么结果呢？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问了那么多问题我也一一回答了，要我解释这解释那的我也全部照办了，他们还要怎么样呢？而且，我发现梅耶尔律师有些忧虑不安。她告诉我，媒体最近反响很大并且对外披露说 2007 年欧洲期货交易所曾经多次致函兴业银行，信件中提到了法兰克福市场上多宗可疑巨额交易的问题。梅耶尔律师要求我给她讲讲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其实之前几天我已经跟她提到过这件事，但这一次她想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全部的细节。

我详细地讲了一番。当时，欧洲期货交易所下设在德国的交易监察机构连续给兴业银行的合规人员发去两封信件（银行机构内部的合规岗位专门负责监管银行交易，确保各种交易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信件里说，兴业银行的一位交易员做成了多宗巨额交易，经查证这位交易员的姓名是 JK。合规人员和我的上级都

看到了这些信件，并且作了回复，这充分说明他们对我的那几笔交易是完全知情的。

下午4点，马拉松式的审讯又开始了，这次进行了6个半小时。我从审讯室走出来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这已经是第五次审讯，提出的问题稍有变化，但是围绕的还是之前的那些主题：我的年薪、奖金、日常交易操作，那些同事们司空见惯而上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操作、银行各级监管机构的运行机制，诸如此类。连续好几个小时，我一遍遍地回答相同的问题。突然，趁我毫无防备的时候，警察的话锋一转，绕到了一个新问题上：

“你赌博吗，凯维埃尔先生？”

“从没赌过。我不玩牌，也不赌马。凡是沾钱的我都不感兴趣。”

这时候，两位男警官中走出来一位，径直来到桌子前面，递给我一张塑封的扑克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你怎么解释在你钱包里找到的这张牌呢？”

其实那只是一家俱乐部给会员发的会员卡，我常常到那儿打台球。我把实情告诉面前的警察，一时间他们非常吃惊。他们出其不意地抛出这个问题，原本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的。他们算盘打得很精：既然是赌徒，那



毫无疑问对钱就非常痴迷了。只可惜他们想错了，我并不是赌徒。后来我听说调查期间上级主管也证实了我说的话，我只打台球，从不赌钱。

这次交锋以我的胜利收场，我有点高兴，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我怎么也没办法让那位中尉警官相信。我已经说了许多遍，虽然兴业银行眼下声称我的交易策略与态度太过激进，但在此之前历年年度薪金面谈的时候，上级对此作出的都是正面评价。警官不相信我的话，坚持问我交易是从什么时候起失控的。我回答说我也很难说清楚，因为银行的那些规定一直都是摆设，突破限制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从来没有人把这种事放在心上。我再一次跟警官说，我曾经多次接到有关部门的警告，并先后多次收到邮件，这说明上级对我的交易情况非常了解。兴业银行内部有许多“灰色地带”。或者说银行的各级主管虽然非常清楚下级的交易情况，却既不表示许可也不明令禁止，反而以放任的态度默许他们违规操作。

至于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这项指控，根本就站不住脚。我完全不可能进入后台和前台系统去核准自己的交易操作。这两处系统都设置有极其复杂的多层监控措



施，除非是超人，否则谁都无法在里面来去自由。再者，其实我根本也没有必要入侵计算机系统，因为每次交易出现什么问题，总是监管人员自己出马修改交易中的某些异常信息。兴业银行之所以对我提出这项指控，其目的就是要掩盖真相，骗取市场和公众的信任。在这个问题上是非曲直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但那位中尉警官似乎还是不相信。

我渐渐失去了耐性，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傻子似的任人摆弄，我受够了。局势很明显，兴业银行选派员工，内外夹击，对银行案卷资料进行了精心处理，情况对我很不利，光自卫是不够的，必须反击。站在我对立面的是银行极尽复杂的系统，我没办法像马基雅维利主义分子<sup>①</sup>那样不择手段地去反攻。银行的罪过绝不仅限于玩忽职守和过度信任员工。只要能替它赚钱，银行就放任员工肆意妄为，这才是它最大的罪过所在。审讯期间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罗列相关证据。听完我的话，警察们的立场动摇了，审讯快要结束时中尉警官对我会心地微微

---

① 主张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译者注

一笑，她说：“你还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简短的一句话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我发现警察先是被我坚定的决心打动，再后来他们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了。

经侦大队里总有一种明显的骚动不安的气氛。每次进出审讯室都是警察替我开门，但是中途休息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我略等一会儿再出去。中尉办公桌上的小纸片也越积越多。很显然他们审问我的同时还在调查别的人。正因为如此审讯的时候不时会出现新的问题，有时也会旧话重提。我不知道别的办公室里坐着的是什么人，虽然他可能离我只有几米远。我发现参与案件的警察们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证件、证词、邮件、清单，应有尽有。我仿佛是一个盲人，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只能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审讯越是深入，我越感到绝望。身心日渐疲惫不说，我是独自一人，孤立无援，而我面对的却是两部无比庞大的机器——一部是警方，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一部是兴业银行，我深深地了解它有多么巨大的能量。

这天的后半夜过得非常艰难。审讯直到 10 点多才结束。我下楼，回到牢房，匆匆吃完饭。我觉得孤独、疲惫。我像前一天晚上一样，开始回忆审讯的全过程。

渐渐的，我失去了信心，感觉非常痛苦。我发现刚刚的判断出了问题，审讯中我的某些措辞不太妥帖，辩解的方式又太过笨拙。结果这天晚上我还是没有休息好。

第二天早上8点半，审讯继续进行。警察又找到了新的焦点。他们先问我到底有多少资产。相关的问题此前我都已经回答过：我在国内外均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证券。警察又说，鉴于我当交易员以前曾经在兴业银行担任过其他职务，我应该有能力绕过监管环节。我像之前一天那样又回答了一遍，也不知道警察是否会采信。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浑身肮脏，极度疲惫，打不起精神。警官接着又说，我是在阿兰·德克莱克辞职之后开始做违规交易的，说我利用阿兰离职而继任者的经验又相对不足的机会开始进行违规操作。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交易的实际过程也好，相关人员的真实情况也好，都能够推翻这种说法。首先，安联保险的交易是在阿兰的任期之内完成的；其次，埃里克·科尔代勒的管理经验比阿兰——我的前任 n+1——要深厚得多。

审讯中，我从话里话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警察对各场审讯均进行了录音。难怪那两天我老觉得审讯室和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信息往来。估计外面有金融方

面的专家，他们监听审讯过程，从中发现问题，而后立即把这些问题传递给了负责提问的中尉。我在心里做着这样的推想，进入经侦大队以来就弥漫在我周围的孤独感此时变得更加浓郁。惊人的消息还不止这一条。后来我又得知，此前的周六、周日，我曾经在兴业银行总部和上级当面谈过几次，而我当时说的话也被录了音。我问中尉：“这么做是违法的吧？”她点头说是。有那么一会儿，审讯室里大家谁都不说话，气氛十分尴尬。我被出卖了！一周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感觉，现在这种感觉更是腾腾地往上撞。原来所谓的面谈，其实只是想从我口中套取口实，好用做将来的证据。表面的和善——甚至和我用“tu”称呼——其实只是面具，为的是要骗取我的信任，最终将我逼上绝路。

中午刚过，中尉告诉我拘留期已经结束，即将把我送往经济法庭<sup>①</sup>应诉。我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吗？也许吧。其实当时我已经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拘留终于结束了，我很高兴，仅此而已。虽然说拘留期间熬过了那么多场漫长的审讯，而且拘押环境也不是太好，但总算也

---

① 巴黎终审法院下设的分庭。——译者注



是我面对若干听众一吐心中块垒的一个机会。从警察们的调查行为和举动来看，我以为我还有机会继续为自己辩护。但是，当我几天后读到警察出具的书面报告时，我明白自己想错了。有些话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我甚至都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话。警察确实也曾经要求我通读报告并且签名，但是当时我极度疲惫而且精神压力很大，竟然没有注意到那些细节。虽然他们自始至终对我都很客套，但总的看来拘留审讯最后的结果对我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警察开始为移交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给各种证物贴封条，这里面包括各种银行账单、从我家里搜查出来的各种资料，还有从我哥哥那里拿来的我的电脑。我在一旁茫然地看着。连续的审讯，连续两个晚上几乎彻夜不眠，我实在打不起一点精神，更谈不上去想接下来会有什么遭遇。既然要把我移送经济法庭，那就说明检察院审阅警方的调查结果后判定对我的控诉已经成立。接下来就要走司法程序。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些。老实说，当时我已经晕头转向，完全不知道怎样做才好。那4天里我先后经受了兴业银行公告的污蔑、媒体的攻击、记者的堵截和拘留期间的折磨。我像是被人塞进了洗衣



机里，还按下了脱水键。我不知道还将会发生什么，还会有什么样的灾祸降临到我头上。

警察们簇拥着我下楼走到停车场，有辆茶色玻璃的面包车正等在那儿。有位警察说：“给你这个，出大门的时候把自己的脸遮住。”汽车上了坡，我遮住脸，停车场的大门打开后我听见一阵喧哗，接着警笛声响了起来。过了几分钟车里的人叫我揭掉了头套。面包车风驰电掣地开着，前面有两辆摩托车开道，其他车辆纷纷停车躲让。那是我一生中最深切的感受。闯红灯，逆向行驶，走公交车道，面包车一路飞驰，势不可当。我们仿佛是在拍摄《的士速递》的续集。我扭头向后面望，记者们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车后，而我们继续向前奔驰，奔向那个躲也躲不过的灾祸。我觉得头晕，于是闭上了双眼，一半由于疲惫一半由于恐惧。

远远地又看见一大群记者，看来已经到经济法庭了。我刚刚套上头套车就停稳了。外面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摄影师、摄像师全都一齐往上扑，冲撞得车子直摇晃。“这些人都疯了，得弄死一个才好。”车里有警察这么说。汽车终于再次启动，开进法庭的院子里停下。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周围终于恢复了平静。我

走下车，正好和一位负责警卫的中尉法警四目相对。48小时了，我终于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友善。我至今还记得刹那间我们彼此交换的眼神，仿佛他知晓并同情我的遭遇，而我也在用眼睛对他说：“是的，我吃了大苦头了。”他的仁爱让我感动，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不再孤独。

接着便是那一大套手续，我已经开始习惯了：填表、搜身、下楼进牢房。牢房很新，很干净，墙面是有机玻璃的，五六间并排，对面是一件很大的办公室。两个法警坐在办公室里，一边看报纸一边监视牢房内的情形。时间大概是2点半，整整一个下午的漫长等待开始了。其间只有我的两名律师来过一趟。他们说只要一经任命，马上就去和预审法官交涉，一方面要打听指控我的理由，一方面要求法庭释放我。律师走后一个法警对我说，如果预审法官是雷诺·范·伦贝克的话，我就撞大运了，搞不好晚上就能释放。据说这位法官不喜欢拘押嫌疑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都感到极度困乏，觉得出去这件事不靠谱。

律师走了，我独自呆坐着，心中备受煎熬，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事情联系起来。我作着种种推测，不知道

事情将会怎么发展，也想不出眼下该做些什么。我在头脑中把周末拘留的全过程又过了一遍。独自一人，萦绕我的只有重重的疑云。我也没法从整体上作出判断，眼下即将发生的事情占据着我全部的心神。已经拘留过了，那些人还要怎样对付我呢？再过几个小时我真的能够出去吗？会把我一直关起来吗？我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两位律师在外面能够帮上忙吗？律师现在应该正在和法官会谈，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这之类的问题数也数不清，在我脑袋里乱撞。不知过了多久，屋外的法警可能看出我神情异样，打开了牢门让我到外面跟他们一起坐了会儿。回想起来，当时的我想必非常感动吧。

3个小时之后，一位法警向我传达了最新的消息。经济法庭从属下的十几名法官中选出了雷诺·范·伦贝克和弗朗索瓦丝·德塞两位，由他们负责审理我的案子。这个时候，我的两位律师就正在雷诺的办公室里商谈。雷诺·范·伦贝克是司法界的风云人物，我对他一向非常敬重，想到要和他见面我有些胆怯。下午6点半，有人把我从牢房带出来领着我去见法官。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屋子很大，摆着两张办公桌，临街的窗户正对着马路，从屋里望去街道上满满登登全是记

者。我坐在了雷诺·范·伦贝克面前，那一幕一直刻在我脑海中。从少年时起他就是我的偶像，我见到他就好比小孩儿见到了齐达内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四下环视了一番，希望能看到那张传说中的《幸运卢克》<sup>①</sup>的电影海报。据说从他在雷恩<sup>②</sup>工作时起，他就挂着那幅海报，而且还在上面题了字：我是一个孤独的执法者。我看了一圈，并没有找到卢克的海报。几个月以后，我才敢鼓足勇气问：“法官先生，您那幅《幸运卢克》的海报现在不在了吗？”“不在了，雷恩市议会发了场大火，海报也烧掉了。”法官的语气非常平静。

这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的情绪非常激动，根本想不到要问海报的事。那天我非常邋遢，胡子没刮头发没理，鞋子没有鞋带，腰间没有腰带，衣服也皱巴巴的，而且几天没有洗漱，估计全身都是汗臭味。想到自己就以这副尊容站在这位大法官面前，我心里羞愧难当，激动的心情更加难以自己。雷

---

① 法国电影。影片中，卢克是一名纵横西部草原的枪手，是一个典型的捍卫正义的孤胆英雄形象。——译者注

② 位于法国西北部。——译者注



诺·范·伦贝克先说了几句客套话，问我身体如何，是不是还受得住，口气亲切简洁，显示出他良好的修养。我结结巴巴地答应着，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他鼻梁上架着眼镜，目光从镜片后直射出来，专注而深邃，和他身上的深色西服形成完美的映照。他措辞庄重，但细细品味起来又不乏怜悯同情的意思。

接着，法官向我宣布了兴业银行对我提出的指控：伪造及使用虚假文书、滥用信任、盗用他人身份、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他问我对于这些指控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回答说现在没有，有话要到预审的时候再讲。对答之中，我发现检察院的指控中原先有“滥用信用且情节严重”一条，现在已经删除了。后来，伊丽莎白·梅耶尔律师告诉我，之所以删去这一条是因为调查中发现我的案子并没有把银行的外围客户牵扯进去。删去这一条指控，梅耶尔律师的功劳不小，从刑罚的角度看这条指控被删除作用非常重要，大大降低了后来的量刑。

雷诺法官接着说我将接受司法管控，但暂时可以恢复自由。在此期间除管理我私人账户的储蓄所之外，我不得与任何其他兴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见面，不得离开法国，而且必须向法院通报住址。将来如有必要，他会传



唤我参加听证会。那么眼下我是自由了，我松了口气，难道噩梦马上就要结束了吗？

我起身向在场的法官们致谢，心里飘过一丝侥幸的想法：他们不关押我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案卷中找不到可以指控的内容吧？我正要出门，雷诺·范·伦贝克将我叫住：“凯维埃尔先生，你能向我保证没有从兴业银行挪用一分钱吗？”

我转过身。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态度突然变得非常严厉。“法官先生，我向您保证，我没动过一分钱。”我回答道。

“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雷诺·范·伦贝克继续问道。

我没有说话，我确实明白。法官先生那么严肃，那么孜孜以求捍卫廉洁，他确实和我心目中正直、严厉的形象一模一样。在这样一位法官面前我什么话都可以讲，是我犯下的错我会承认，看来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了。

我下楼办理出狱手续。我又见到了几个小时前我进来时与我四目相对的那位中尉法警，看得出他也为我重获自由而高兴。但是门外想必都是记者，怎样才能悄无声息地出去呢？这个关口法院外面的监控摄像头帮了

忙，法警们从摄像头上看到外面确实都是记者。有个法警甚至说：“外面简直是闹疯了。”梅耶尔律师和他们商量好，我和她分头走，由法警用摩托车送我出去，然后到尚佩雷城门和她碰面。但即便如此，现在出去也不成。有人说：“等到8点钟新闻节目播出后他们就老实了。他们就是想拍几张照片，真要发现没指望自然会走的。”于是梅耶尔律师在记者们的热切注视之下先离开了法院，而我和法警们一起等到8点再走。可是8点钟已经到了，出乎意料地是记者的人数并没有减少多少，仍然把法院围得水泄不通。

于是我们决定用一招调虎离山计。先放了一辆囚车出去，安排一位警察带着头套坐在里面，而且一路开得飞快。可惜记者们不中招，依旧在原地等候着，看来这些把戏对他们而言已经不新鲜了。法警又出了个主意：“不能再等了，不然得在这儿过夜了。你拿上这个头盔从侧面的小门出去，样子要尽量自然。我们到对面的街上碰头。”

我依计而行，脚已经有些挪不动步。外面的记者真多，还停着各种电视、电台转播车。我一步步朝他们走过去，尽量不引人注目。为了迷惑记者们，途中穿过一

个小广场的时候我还有意停下来点了一支烟。远处的法警看到了急得直跺脚。我走过去上了摩托车，他开了口：“嘿，叫你自然点儿，没说要慢腾腾地浪费时间啊。”

车开动了，周围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记者等了很久不见我出来，得出结论，在报纸上说我是藏在梅耶尔律师的后备箱里离开法院的。我和法警一起到了约定的地点，一路顺利。我下了车向他致谢，一面笑着说你把我放哪儿不好，偏偏停在了兴业银行的一家储蓄所门口！

梅耶尔律师和我见了面，立即一起前往勒瓦卢瓦，到了她那位计算机专家朋友的家里。我分别给母亲、哥哥和女友打电话报平安。接着我和律师他们一起喝了杯酒，有现成的饭菜，我吃了一点儿，一面跟他们讲那3天的经过。

其实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洗澡、换衣服，收拾出点人模样出来。但是我住哪儿呢？自己的家是回不去了。好在女友想到了前头，提前替我安排好了退路。我在兴业银行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朋友，而且后来一直有来往。他住在巴黎近郊，房子正在装修还没有完工，有一间车库临时整理了一下，可以给我住。车库就车库吧，总比没日没夜地受记者们围追堵截强。我已经受够

了跟他们躲来躲去。那群记者已经把巴黎变成了一个大围场，而我就是他们唯一的猎物。彩头就是：第一个拍到底片的赏金 10 万欧元。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知道想过太平日子是太难了。

我在这位朋友的车库里住了十几天，除了每天打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能被动地等待。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门，可以看看报，上上网。我的女友也在兴业银行上班，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门，我拿不准自己能不能见她，谨慎起见我们说好不见面。我觉得孤独、失落、紧张，兴业银行射来的冷箭已经让我十分痛苦，相比而言媒体的攻击更猛烈百倍。我常在电话里和梅耶尔律师探讨案情，为辩护做好准备。那段时间，各种流言一浪高过一浪。有个星期三，梅耶尔律师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我自杀了！据她说，这是参与调查的一方公布的独家爆炸性新闻。

好像是嫌乱子还不够多，我发现我的两个律师伊丽莎白·梅耶尔和克里斯蒂安·沙里埃·布纳泽尔之间又起了暗战。争端的焦点是辩护的领导权。最后，两人的矛盾完全不可调和，梅耶尔律师要我作出选择：要么是

她，要么是他，不能两人都用。

我对梅耶尔律师更加信任，毕竟当初是她独自和范·伦贝克法官激烈交锋，而且我和她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友谊。而沙里埃·布纳泽尔律师在我被拘留其间从没去看过我一次，他似乎对银行提起的指控不太注意，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媒体的反应上面。两相比较我很快作出了抉择，解除了和沙里埃·布纳泽尔律师的关系。因为案卷太多，而且她本人不是刑事律师，对金融技术方面又不太懂行，梅耶尔律师向我推荐了她的一位同行助她一臂之力。这个人就是纪尧姆·赛尔内，一位很年轻的男律师，为人热情、勤奋，工作效率很高。可惜悲剧再次重演，很快他们俩之间也不断地发生口角。

律师之间的不和在很长时间内对我的辩护起到了非常坏的影响。拜媒体宣传和兴业银行的律师团队所赐，公众舆论对此也做了错误的解读。在人们眼中我成了一个任性的孩子，因为没有从律师那儿得到自己想要的，就断然把他们解职而且把过错一股脑儿地推到他们身上。对兴业银行也好，对我的律师也好，我都被形容成了一个人格上极不成熟的人。

但是，实际情况绝不是如此。律师之间有了矛盾，



我总是设法从中调解，虽然常常不管用。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下决心更换律师，重组辩护团队。案情本身极其复杂，媒体关注度又高，我只能如此。我自己对司法领域一无所知，又没有钱给他们支付薪水，不这么做还能怎么着呢？倒并不是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其实有很多人向我毛遂自荐，愿意免费提供服务。我本人时间太紧，不能和他们一一接洽，我的案情其实都是他们自发从媒体上了解到的。

所以说找位律师并不难，麻烦是在后头。每一个接手的律师都和我说案情太过复杂，必须联合同行组成一个团队。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头脑中其实早已拟定了人选，而且说起来个个都有极好的专业素养。他们说面面俱到，我只好同意。既然没有能力给他们开工资，我对他们的控制力就很有限。说起来，我还应该对他们心怀感激，这样一来心理上的关系就很微妙、很棘手。

情形如此不堪，逼得我往往有了重要的想法也无法向他们下达，只好任由他们就谁是首席的问题争个不休，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哪个律师应该列在头一位？应该由谁负责向媒体发布消息？官方下达的文件应该寄送到哪位的办公室？勤奋工作的待在黑灯影里，而据说很

少翻看案卷的却频繁出现在摄像机前，这样是否正常，是否公允？我无法裁决，他们就像大明星一样，不时要耍点儿小性儿，总要我去适应他们的种种要求。

整个预审期间我的律师团队内部一直就是这样吵吵嚷嚷，一团乱麻。媒体乐得看笑话，更换律师、调整辩护团队的成员，这类举动给他们奉献了不少新闻头条（《凯维埃尔再次更换律师》、《凯维埃尔改变辩护策略》，诸如此类）。

和坊间传闻正好相反，我之所以更换律师，并不是由于团队与雷诺·范·伦贝克的辩论不够成功，也不是因为我本人更改了辩护策略。每次都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律师必不可少，另一方面他们之间无休止的内部争斗耗费了我太多精力。结果就是我无法抽出时间去考虑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到我身家性命的问题。有的律师甚至不征求我的意见擅自替我做主。我希望他们认真负责地为我组织辩护，不要仅仅把我的案子当成自己事业的跳板。

对我而言，那个星期三绝对是黑色的。先是我惊闻自己已经“辞世”的噩耗，接着梅耶尔律师又通报了一个坏消息：检察院已经就释放我一事提出上诉。预审法

庭将在 2008 年 2 月 8 日开庭审理。我觉得自己成了司法界猛烈攻击的活靶子。我要是有意出逃早就可以一走了之，而且之前的多次传唤也就不会出席。销毁证据的风险也根本谈不上，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掌握在兴业银行手里。那么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我做傻事吗？但是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自行了断啊。到底为了什么他们觉得释放我会有危险呢？莫非我扰乱公共秩序了？

梅耶尔律师好言劝慰我，同时立刻有条不紊地组织辩护。我去看过心理医生，经过一番诊断，医生认定我心智平衡、一切正常，并据此出具了一份报告。那位计算机专家打了包票，说可以为我谋到一份工作，这样一来可以保证我经济方面的独立，二来可以证明我没有出逃的打算。最后我又拍了一组照片寄给各大报社，报社很快大肆刊载。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避开媒体，出发点是想保持低调、审慎，但有些人认为这是虚伪和有意遮掩。寄出照片之后这种说法不攻自破，但我的头像也就变得家喻户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可能逃避司法审查呢？更何况我原本就没打算逃避。此刻我只有一个心愿：出庭为自己辩护，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就这样，2 月 8 日，我、伊丽莎白·梅耶尔、纪尧

姆·赛尔内 3 人来到了司法宫<sup>①</sup>，信心满满。此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曾经让我有些担心。那天的《世界报》刊发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说穆萨·巴基尔，2007 年与我合作的经纪人可能是我的同谋。兴业银行放出这样的风不是想影响公众舆论就是想左右司法审查。这条消息对案件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其巨大。

兴业银行的这种做法让我非常不快，首先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其次它把我的案子提高到了是一场卑鄙阴谋的程度，对我十分不利。我一度很恐慌，但很快恢复了自信，心想这种手段太过夸张、拙劣，不会起作用。所以 2 月 8 日出庭的时候我心情十分平静，甚至迫不及待地希望早点结束，因为那天下午有法国橄榄球冠军赛，我打算看看。为了节约时间，我连大衣和香烟都没有拿，全留在了梅耶尔的汽车里，心想要不了几个小时我还会以自由之身从法庭走出来。律师和我都坚信，这次出庭一定会将我当场释放，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快走到司法宫的时候，我发现这里也有很多记者，

---

① 原为法国国王圣·路易的王宫，后改做巴黎各级法院的办公场所。——译者注



都被围在安全栏后面。我们快步走进庭审大厅，因为这一场禁止旁听，所以旁听席上空空如也。很快法官们也到了。一开场情势就对我非常不利。庭长不许纪尧姆·赛尔内出庭辩护，声称自己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收到有关我方将有第二名律师出席的声明。纪尧姆·赛尔内惊呆了，因为就在一天以前他曾经和庭长本人在电话里确认过这件事。庭长冷冰冰地说：“律师！我不否认昨天我们确实通过电话，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收到你的声明，所以你无权参加当事人的法庭辩论。”我们面面相觑，都十分震惊。我觉得非常沮丧，辩论还没有开始我们这边一下子就少了一半的辩护力量。

随后，检方开始宣读要求将我收押的诉状，我注意到其中有这么一个比喻，十分无聊：“50 亿欧元，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抵得上 5 座核电站！”案件调查才刚刚开始，我已经被认定为全部“罪行”的唯一罪魁祸首，我还没能详细为自己辩护就已经被判有罪。检察长乘势接着话头说：“另外，2007 年 6 月他还曾经欺瞒银行，瞒报亏损达 20 亿欧元。”我听了差点闭过气去。眼前这个人，他真的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吗？随便哪个人，哪怕欠了别人 100 欧元，恐怕马上每天就要接到 10 个来催债的电话；一家银行，尤其是像兴业这样



的银行，检察官大人居然相信它会亏了 20 亿欧元还被蒙在鼓里吗？

接着，兴业银行的 3 名律师上了场，活脱脱把我说成了“头号公敌”<sup>①</sup>，必须马上关押起来，否则势必威胁社会秩序。他们轮番开火，口气、措辞一个比一个强硬，而且所讲的与事实完全不沾边，我仿佛觉得他们攻击的这个人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他们的陈述荒诞不经，好几次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有个律师昏了头，居然拿我的电话费来说事。照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电话费太高，那一定是在谋划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有那么几次，我无意中和一位陪审员四目相对，从她的表情中看得出她和我一样觉得非常惊奇。

后来，终于轮到梅耶尔律师发言了。她单枪匹马迎战检察官和兴业银行的 3 位律师，完全发挥出了她的才华，表现出了她的果敢与坚决。梅耶尔在法庭上再次重申我从来没有想过推卸责任、逃避司法制裁，相反拘留

---

① 《头号公敌》是一部法国警匪片，影片以法国著名大盗雅克·梅林为原型，该犯曾犯下多起持械抢劫、绑架、越狱与谋杀案。——译者注

期间我主动承认罪过，坦白交代了所有问题，警方出具的书面报告足可以证明。

最后，庭长让我做陈词，我语气坚定地说兴业银行的指控与事实不符，毫无依据，之前的历次传唤我均按要求出席，我也从来没有打算逃避预审。接着法官们退出法庭，下去合议。我很高兴地对一名法警说，一会儿就该放我走了，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事实上当时我心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45 分钟以后，法官回来重新落座，宣布了最终的裁决。我一直深信这一天的判决一定会对我有利，可是我没有听到这样的结果。法官接下来说的话我没有听清楚，我的听觉似乎已经失灵。我觉得天塌了。法官说“拘押通知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扭过头看梅耶尔律师，她的脸已经气得有点扭曲了。庭长让我跟着法警走，我仿佛刚挨了一记重重的上勾拳，已经完全懵了，茫然地站起身。庭长在我身后又补充了一句，语气中透着点儿兴奋：“对了，忘了告诉你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健康监狱<sup>①</sup>。”

---

① 位于巴黎第十四区，建成至今已有百余年。——译者注

我从审判庭门前走过，正好从门上的小窗里看到了哥哥的面孔，他的脸上满是疑问、震惊与怀疑，像是在问我：“怎么样，到底怎么判决的？你这是要到那儿去啊？”法警带着我往楼下走，我第一次见识了司法宫内著名的地下室和长长的走廊。我还不能清醒地意识到刚才都发生了什么，只突然觉得想吐。

法警先搜了我的身，然后把我关进了牢房，等待转运。很多警察对法庭的判决也大觉意外，所以对我颇感同情。其中一位甚至小声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无辜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啊。”一位女警察带着我四处看了看，一间9平方米的牢房——将来我就要朝夕生活这样的环境里了。警察甚至还跟我说，健康监狱的牢房和这里的差不多，看来她是想让我早点适应新环境！我还是觉得茫然。变故一个接着一个，我无法掌控，无法叫停，无法站住喘口气，定定心神。我是掉在了地狱里，打着圈儿地往下滑，丝毫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觉得想到了母亲，她听到这个消息该怎么办？打个电话，道一声保重，现在都成了奢望。

我忘了自己在那个陌生的牢房里待了多久。半小时、一小时，或者更长？说不清楚。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我默默地问自己，这一切真的能够完结吗？

# 8

## 监 牢

囚车趁着夜色向健康监狱开去，一路警笛长鸣。我没有戴手铐。看不清车子行进的路线，看不清我是怎么到的监狱门口，也看不清当时监狱门口是如何喧闹沸腾。

第二天，我在牢房里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那一刻的场景，简直把我惊呆了。原来我坐的囚车前面还有一辆侧开门的面包车，车门大开着，两名警察蒙着面左右站定，手中端着长枪。这时候监狱的大门打开了，又有两名便衣警察走出来，持枪警戒，监视路面情况。从囚车里出来一个黑影，在屏幕上一闪而过，这就是我吗？我完全认不出自己。长枪短炮，这么大阵仗，我在想该不是把“头号公敌”关进来了吧！无论如何绝对不可能和

我有关。要不，或许是押解“胡狼”卡洛斯<sup>①</sup>？

副典狱长接见了我。他先安慰我说“你不会在这儿待太久的”，而后问我是想要单人牢房呢，还是想和别人同住。我当然毫不犹豫地说要单人牢房。接下来，又是那一套常规性的流程，我已经渐渐习惯了，但这次是真正的监狱，所以更加让人痛苦。先填表，再取指纹，最后搜了身。一位监狱协理员问我想不想通知谁来探视。我回答说：“我哥哥。”我仿佛一个清清白白、一分钱都没偷过的人，蒙冤受屈被投进了法国最大的劳改营，那感觉宛如五雷轰顶。过了一会儿，有人送来一包东西，有毯子、床单、盘碗餐具，还有一套衣服。守卫又给了我几支烟，问我要不要请医生来看看，我拒绝了。不需要社会假惺惺地关心我的健康。我这不就在“健康”监狱里关着吗？这样就够了。

守卫们带我到了所谓的VIP狱区。这里有十几间牢房，说是“VIP”，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不像别的牢房那样人满为患，除此之外我只看到陈旧、丑陋、

---

① 恐怖分子，组织了一系列恐怖活动，试图以火箭袭击法国核电站，在法国策划多起爆炸案等。——译者注



脏乱、消沉。守卫打开了其中的一间，大约 9 平方米——倒是符合监狱制度，里面有床、桌子、椅子、洗脸台和厕所。我已经落到这般境地，牢房有这个模样倒也不坏，起码比我想象得要强。守卫叫我在里面一定要低调，还非常隐晦地叫我不要和别的人“搅在一起”。我倒在床上，心中非常焦躁，这是我在监狱中的第一个晚上。

睡不着，我已经很累了，但忍不住还要把白天的情景过一遍，把庭审的每一个过程再梳理一遍。我怎么没有料到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田地呢，怎么当初对预审法庭的判决会抱有那么大的信心呢？或许我过分信任那些审判长了，以为他们个个都像雷诺·范·伦贝克那么审慎、仁爱。完全想错了。也就是从这天夜里起，我明白了一点，在监狱里是没有黑夜可言的。

这天晚上，各种声响此起彼伏、彻夜不绝。牢门开合发出金属撞击声，老旧管道内传来汨汨水声，关禁闭的犯人一阵阵地叫喊，受不了命运折磨的人蜷在牢房深处号叫，也有人用手砸门甚至用头撞门。这些声音里浸润着痛苦、凄惨和恐慌。我被扔在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里，看不清未来会怎样。离开法庭时，梅耶尔律师说：

“我会马上提交申请，要求释放你出狱的。”我知道这只是她宽慰我的话，这条黑漆漆的隧道，走到哪儿才算是头呢？关在这儿，我怎么准备辩护材料？眼前的一切开始乱转，我又想到了母亲。又是一场灾难，她能扛得住吗？我的牢房里相对比较安静，所以才能够想想这些问题。过了好久我终于平静下来，昏昏沉沉地正要睡去，突然一束灯光打在我身上，我吓得跳起来，原来是夜间巡逻的监狱守卫。这天晚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有六七次。几天之后，我听说那天夜里守卫们轮番地巡逻为的是要看看大名鼎鼎的凯维埃尔长什么模样。

第二天早上，我穿衣服的时候发现我的腰带、鞋带前天夜里都没有被收走。原来把我这个罪犯关起来，目的是要保护社会，绝不是要防止罪犯寻短见——不收鞋带腰带，想上吊，自便好了。不是总说某人精神脆弱、心理不稳定，甚至有自杀倾向吗？那这样的“疏忽”是不是有些怪异？可见把我收监绝不像后来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要保护我。这还没完，那天牢房的墙上其实还垂着一条电视用的电缆……看来，司法界有时候也不能自圆其说。

接着，狱方给我安排了一名心理医生，是一位女

性，态度和蔼可亲但是举止行事有些奇怪。第一天，她还只是提了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建议我吃安眠药，被我拒绝了。后来，她竟然硬塞给我半瓶安眠药，回到牢房之后我就把药搁在了桌子上，整个监禁期间一直没有去动。我可不想被每天晚上的一片小药片牵着鼻子走。后来这位医生有时把我从牢房里带出去，谈谈她在报纸里读到的报道，问我些问题，也打听一下我对这样那样的新闻准备怎么回应。或许她感兴趣的不是我的精神状况，而是我的案子。

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回来正要进牢房时突然听到有人高声说：“嘿，热罗姆。”一个陌生人，我见过他吗？在哪儿见到的呢？经侦大队？经济法庭？司法官？或者说是刚进来那天晚上？那人身穿便衣，面相热情，他请我到一個房间里坐下。那间屋子看着像是囚犯的活动室，正对着通向牢房的走道。他不紧不慢地给我讲监狱的情况，比如说作息時間、体育活动室的情况、放风的时间等，接着问我需不需要什么，亲人什么时候给我送东西来。当时我猜想他可能是监狱系统的教导员一类的人，专门负责接收新进犯人的。他一边说话一边泡咖啡，用的是一个切去一半的咖啡罐子，而且他还往咖啡

里放了支温度计。这种做法相当怪异，不像是教导员该干的事儿。他接着说昨天中午刚过，我的名字就在监狱里传遍了，甚至连我那间牢房都提前打扫过，就等着我进来。我惊得跳起来。昨天中午刚过？那个时候预审法庭的庭审还没有开始呢！谁能够提前预知判决结果呢？那个人不回答，我心中疑窦重重。假如说那边还在审案子，这边就已经在打扫牢房，那毫无疑问我是被耍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儿。这个人是在逗我玩儿吗？难道逗新人玩儿是监狱里的惯例？再或者说真的是还没有审就定了怎么判决我了？我无法相信，可是又过了几天，一个我很信得过的人从司法渠道打听来一个消息：“这场官司，凯维埃尔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反正他都得到那儿（监狱）去。判决早就定好了。”

那个面相亲切的陌生人最终还是说出了他自己的情况，而且说得很坦然：“我是因为强奸罪进来的。我完全懵了，仿佛是在梦里。他接着又说出了他的身份，他叫帕特里克·特雷默。我听完没反应，这个名字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他却乐了，像宣布什么好消息一样说：“对喽！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停车场强奸犯嘛！”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还当他是监狱的管理人员呢，没想



到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这还是我第一次和这种人面对面。我这待的是什么地方啊？从此往后，整个监禁期间无论别人怎么关注我，我总是保持极其谨慎。后来那个人还缠着我，要给我讲他的光辉往事，我听着觉得恶心却又有一丝好奇，因为他在狱中的表现和对他的指控完全不一样。我试着了解他，了解他是怎么走上了这一步，在监狱里又怎么慢慢自我调节。他坦承说他自己有毛病，也曾经要求狱方给他诊治，但是一直没有下文。

每天早上很多人轮番过来，要瞧我一眼。可能是因为那段时期VIP狱区没有收押什么轰动一时的人物。后来我也稍微参加一点集体活动，免得被其他人边缘化，比如说我偶尔和他们打一打牌，仅此而已。我不太愿意出牢房，待在里面的时间居多，读书、看电视，有时也思考我的案子。我发现记者们还在继续践踏我的私人生活，而且没有一丝的尊重可言。他们把我的亲人们的名字、身份、照片全部赤裸裸地公之于众。我每天要受的考验太多了，但是连媒体也不放过我。

我从不出去放风，早上洗澡也不愿遇到人，所以总是去得很早。伊丽莎白·梅耶尔和纪尧姆·赛尔内每周来



看我一两回，3个人一起商量一下案情。我的哥哥和女友常来，是接待室里的常客。母亲来过一回。想起来我就觉得痛心。那次是在一个过道里和母亲见的面，我走进进去时她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么惊骇，那么迷惘。我坐在母亲面前，压抑着心里的情感，强忍着眼中的泪。我们就那样默默无语，坐了很久，最后才说了几句话。是的，我很好，他们待我也很好，妈妈你别担心。

我觉得是自己把母亲拉进了这场噩梦里，但我相信这场梦很快就会醒。可是这场梦似乎没完没了。按监狱的规定每次探视时间为45分钟。可怜的3刻钟啊，牢里的人得巴巴地盼上好几天，等盼到了却又像闪电般倏忽即逝。别人如此，我也是如此。每周可以去一次接待室，那就像濒死之人得到了一口氧气般的珍贵，接待室里有一扇窗户，从那里可以看到监狱外面，看到真正的生活。虽然进出接待室需要搜两回身，但我觉得无所谓，欣然接受。只要能见到我敬爱的哥哥、心爱的女友，再和他们谈上哪怕极短的一会儿，莫说搜两回身，搜上10回我也愿意！

除了这片刻的好时光之外，其余的只有死寂、沉闷。我不断在脑海中回想那几周发生的事情，想从中找

点什么，好与眼下的嘈杂相调和。这种无趣的时光也还算是好的，想起亲人，想到前途未卜，那才是钻心般的痛苦。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躲在牢房的角落里，谁也不想见，精神就要崩溃了。好在我常常收到很多来信，有亲友的也有陌生人的，让我在绝望与黑暗中看到一丝光亮。在此，我想借这几行文字，向那些可能素未谋面的人们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他们的信件和话语是从外面吹来的清新的风，让我从窒息中清醒。当然，有一封信是个例外，这封信给我当时的处境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兴业银行把我辞退了，理由是重大过失。

还有一封信，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是性格内向，原本很少写信的母亲寄来的。母亲在信里表达了对儿子全部的关爱与信任，我读着读着，不禁泪如泉涌。多年以来，我迷失了本真，去追求一种没有真正意义的生活。亲人的爱护，生活的真义，不知不觉间全被我抛在了脑后。我斩断了一切牵绊，竭力地追求卓越。一路上我当做朋友的人最终出卖了我，而那些爱我的与我爱的人却被我扔在了路边。我只知道向前冲，更快地向前冲。这场无休止的赛跑最终把我带到了这里，带到了这场巨大灾难的中心，在劫难逃。

有天晚上，负责分发食物的助工悄声叫我别碰他给我的东西：“扔了！一会儿再跟你解释！”看他态度这么坚决，我照办了，没有碰我的餐盘。过了几分钟，那位助工又神神秘秘地来了，一句话也没说，递给我一点儿面包、两个水果。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一面吃一面等他说明原委。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冲澡，听到有人低声叫我。还是那位助工，叫我一会儿去活动室找他。我去了。事情是这样的：事发那天他偶然听到有几个人在小声嘀咕——没听清是犯人还是守卫——据他说这伙人准备在我的饭里下药，等我生病去医务室的时候就可以拍到我的照片。看来，我在媒体眼中的价值仍然居高不下，弄到几张凯维埃尔在健康监狱坐牢的照片就可以换到真金白银。

我无法验证助工的消息是否属实，反正监狱里传得沸沸扬扬，各种版本都有，有的还煞有其事，有的则完全荒诞不经。这件事无论如何对我都有些干扰，于是我趁在接待室和梅耶尔律师会面的机会告诉了她，而且表示我很不放心。梅耶尔律师也十分惊诧，最后说：“光凭这件事，也应该尽快把你从这儿弄出去。”问题是怎么才能出得去呢？不久前，她刚刚提交过释放我出狱的

申请，据我看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我的想法是，刚把我收监，过了一个月就放出去，这不显得愚蠢透顶、自相矛盾吗？有关方面绝不会这么快推翻自己的判决结论的。从自我保护的角度考虑我也只能够这么想。即便说范·伦贝克同意释放，假如预审法院再次断然否决呢，到那时不是一点儿指望都没有了吗？昨天把我关起来，今天要把我放出去，这必须有非常站得住脚的理由才行，有没有呢？我想不出来。

过了几天，监狱因故将我转送到经济法庭。我认出车上的一位法警，我曾经和他说过几次话。我跟他讲了这次疑似投毒事件，他答应在他认识的守卫中间做一次秘密调查。第二天，副典狱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有些忧虑，问我：“你碰到什么麻烦了吗？”我回答说有些古怪的传闻，但是我还没有任何证据。这场照片风波是怎么传到他耳朵里的呢？本来传言就很多，这会儿又添了一团疑云。几天过后我又遇到了那位法警，他确认说确实有人想弄些手脚搞到我的照片，但是能掌握到的情况就这些。他又安慰我说管理层非常重视这件事，会设法保护我的。这一点我也有所察觉。VIP 狱区出了丑闻，涉及的又是媒体高度关注的人，对



监狱管理者来说这是个棘手的事儿，而且如果处理不好麻烦会越来越大。就这样，我在健康监狱的监禁岁月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真正遇到过危险。个别守卫偶尔会想当然地、毫无顾忌地对我恶语相向，除此之外别的工作人员都很公正，对我挺好。

监禁期间我曾经4次被转送到经济法庭，其中有一次还是两次是戴着手铐去的。每次去一趟要搜我两到三次身，回来又是两到三次：先在监狱搜一次，然后由警察搜一次，接着在经济法庭搜第三次。但是因为我常去，都成经济法庭的常客了，所以法警们常常把搜身给免了。免不免搜身没多大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其实很多东西我都已经习惯了。相反，我在意的是去法官办公室这件事，每次都感觉到一种屈辱感，仿佛我比他们低下一等。在监牢里准备抗辩，这并不容易，不仅资料匮乏，而且不能方便地见到律师，所以在法庭上我的反应不够敏捷，发言也不够有分量。

第一次去的时候，雷诺·范·伦贝克特意向我说明预审法院的决定和他没有关系：“我反对把你关押起来，你应该能体会到的。”看得出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不自然。我知道他的态度，但是有什么用呢，我不是一样



被关在牢里了吗。他询问我的精神状况和健康状况，我不愿意回答。我的心理负担已经够重了，何苦再受这些虚情假意的拖累。作为预审法官，看到当我是自由之身的时候和他合作良好，被监禁起来以后态度反而变得冷淡，范·伦贝克可能有点恼了，赌气再没和我说话。我不是有意如此，当时我就这么跟他说了。我对他的态度不会变，将来也不会对他的问题避而不答。

但是，司法系统里面的某些东西我确实很难接受，而且想到居然有人能够在这个里面捣鬼，我心里总是有些不快。就在我被监禁的当天，经纪人穆萨·巴基尔也被传唤到了拘留所。一家报纸立马刊发了题为《凯维埃尔与他的穆斯林朋友》的文章，同时借机老调重弹，翻出了在我家搜出《古兰经》那段事再次大肆宣讲了一番。穆萨于第二天中午释放，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兴业银行要求将我监禁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穆萨和我之间存在所谓同谋关系，既然穆萨只接受了几个小时的质询就被释放，就说明同谋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尽管如此，我却仍然被关在牢里。再说说穆萨，后来我读到了预审的书面报告，我发现他也不算上一个讲义气的朋友。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像这样的例子我还可

以举出很多。对机构我已经失去信心，那么对个人呢？从这个事件中我发现，有的人貌似朋友，其实也不值得太过信任，这一点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从 2007 年中期起我就一直和穆萨合作，而且当初是他向我伸出的橄榄枝。我们相识的时间还要再早几年，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助理交易员。接着，他加入了一家中介事务所，后来又回到了兴业银行，在子公司 FIMAT 担任经纪人。

有一次穆萨和我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回兴业银行后遇到了一些难题，表现得很担心。当时 FIMAT 正准备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子公司 Calyon 合并，穆萨担心公司合并之后会遭辞退，所以他迫切希望作出业绩。

我安慰了他一番，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与他合作，但是既然能够帮他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给他的部门打了电话，表示愿意抛出部分头寸。那段时间我经手的交易数额越来越大，所以穆萨从中获得了非常可观的佣金，这可帮了他大忙。

2007 年年底的一个晚上，他叫我帮他拿捏一下，看看向上级要求 5 万欧元的奖金是否过火。据我所知，他从我的交易中获得的佣金就有 600 万欧元之多。仅凭

这一笔业绩，就有理由申请 5 万欧元的奖金。而我从预审书面报告中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当年第三季度他获得了 50 万欧元的奖金，同年第四季度上司许诺给他 100 万欧元……

收入已经如此生猛，他干吗还在我面前装天真，还向我要主意呢？还有，由于他的交易额突然激增，2007 年年底银行内部的审查机构对他展开了调查，为什么他竟然丝毫不对我透露呢？

这些事让我气恼至极，它们再次证明金融从业者之间的信任是靠不住的，无论他们怎么跟你套近乎，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教训是惨痛的，苦涩的。我把 7 年的宝贵时光献给了一家公司，最后却被他们扔进了监牢里；我自以为交下了些朋友，没想到其实都是些虚伪的阴谋家。

电影《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警句：“如果你需要朋友，倒不如养只狗吧！”这句话是何等悲怆，又是何等真实。我的那些同事们，太平时节和我一起外出、过周末，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一旦出事，一个个心安理得地任由我遭难，而且纷纷从中渔利。以他们的业绩来说，其中有一位申报的年

度业绩实际上 6%是由我贡献的，另一位7%，还有一位高达 10%。但是司法部门问起来，他们就把这一切都给忘了。

3 月初的一天，法院要开庭审理我提出的释放请求，时间定在下午。这天早上女友来监狱给我打气，我正要下楼到接待室去，一个守卫把我叫住了。守卫二话不说要我马上去接受搜身，说是一会儿好“提出去”。我觉得莫名其妙，不是早就预约好了这会儿要会客的吗？守卫表示爱莫能助，会客必须取消。我心想，看来麻烦还多着呢，这天开头就不顺。一到司法宫，我就被关到了地下室里，而且还不是前一次那种地下室。面前是一排牢房，又脏又破，而且臭气熏天。我就待在那儿，回想着那段日子受的苦楚。早晨过去了，中午过去了，我就在那儿一直等到了下午 3 点。

在法庭上，我的两名律师都参与了辩论，他们据理力争，强烈要求法院将我释放出去。但是，跟一个月以前的那次庭审一样，兴业银行请来的律师团队也进行了猛烈地回击，可以说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照他们的说法，我给兴业银行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败坏了公司的风气，严重影响了全体公司员工的精神面貌。他们还多次



引用一句让人心惊肉跳的话：当事人让银行损失了5座核电站——这是第一次庭审中检察官对我提出控诉时打的比方。最后，他们又为我找到了一个同谋：马努埃·扎布拉涅吉。扎布拉涅吉也是一位交易员，当初我曾经与他合作共同开发了一种交易策略，而且私下里也是朋友，常常来往，庭审的前几天他刚刚被拘留。我心想，银行那边又抛出了阴谋论，看来是要故伎重施，没准跟上次一样真会把法官们给说服了呢。我本人和2月8日那场庭审时一样，静静地听着，但是心里无法保持平静了。

意外来自于为小投资者辩护的民事诉讼律师。他认为我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不要求将我收监关押。第一次庭审的时候他保持中立，这次他的态度发生转变，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意外的惊喜。轮到我发言了，我再次重申当初的论点，强调我没有任何同伙。

庭长打断了我的话：“预审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吧？提到托马·穆加尔的时候，你的意见可大得很啊。”

我回答说：“当时我只说他知道我经手的交易，仅此而已。”



托马·穆加尔是助理交易员，曾经与我合作过，当时这样的助理交易员还有好几个。预审时我对法官们说，穆加尔和其他许多人对我的交易操作都知情，我的目的是以此为例说明交易厅里的各种信息是畅通无阻、完全公开的。庭长误解了我的意思，认为我是在攻击这位同事。我当面纠正了庭长的话，气氛当即又紧张起来。接着，庭长宣布退庭合议，判决结果一周后再下达。再说说穆加尔，案发之后他第一时间受到了审查。他解释说自己只负责输入数据，并不知道那些交易是虚假的，连他在计算机系统中建立 15 亿欧元的保证金、删除业绩信息，也都是这种情况。审查结束后，司法部门宣布对他免于起诉。

我又被押回到地下室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极其烦躁，精神近乎崩溃。这在我被关押以来还是第一次。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到我的囚室去，现在那里是我唯一可以称做“家”的地方，是我唯一的生活场所。只有在那儿我才能觉得安心，才能躲避外界的骚扰。前面的 7 年，兴业银行是我的避风港；今天，监狱是我最后的收容所。我在自己的心灵之外努力寻找一个又一个的避风港湾，这说明我过得并不好。是时候

了，不要再逃避，外物保护不了自己，只有在自己的身上才能真正找回自我。但是在那一刻，我只会在心里默念着：我出不去了，与其毫无指望地盼着出狱，还不如像从前一样逃避。

律师比我乐观，他们对外透出口风说，如果这次的判决结果仍然对我不利，就将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判决。他们之所以作出这么大胆的估计，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场庭审之后，法庭的书面报告中居然有赛尔内的辩护词，要知道那天庭长把他赶出去了，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辩论。如果我方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庭长的职业道路必然为此蒙受不利影响，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书面报告的问题暴露出严重的程序错误，单就此点而论法庭也应该为我方作出有利判决。律师们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但刚才法庭上剑拔弩张的情境犹在眼前，我宁愿选择不抱太大希望。

虽说如此，接下来的一周我还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我特别留意电视上的报道，那种心情仿佛一头关在笼里的雄狮。有一天，牢门突然打开，守卫大声对我说：“律师来了！”我下楼，还没看清律师的脸就问：“结果不好吗？”“好极了！”梅耶尔律师笑得合不拢嘴。

或许是因为我对失败已经习以为常，有那么几秒钟我竟然回不过神。接着便是狂喜，我又自由了！梅耶尔律师让赛尔内到我的住处去取我的身份证，当初我把它落下了，出狱没有它可不行——虽然他们把我关起来的时候不要身份证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据说健康监狱的正门外还是有很多记者在那儿蹲守。梅耶尔律师委派了一个叫克里斯托夫·雷耶的人担任我的顾问，负责对外联系，现在就由他去与记者们交涉。最后谈妥，我出门的时候记者可以拍照，之后就得任由我们离开，而且不许跟踪。我们商量好从侧门出去。克里斯托夫在那儿等着我，领我走到甬道的尽头。我朝着记者们一路走过去，梅耶尔律师在一旁跟着。大约有 50 多个记者，都挤在道路两侧的栏杆后面。

我急于给这一切画上句号，心思完全不在眼前的这些记者身上，所以不知不觉间走得飞快，忘了刚才约定好要留一点时间给记者拍照，还要说两句话。梅耶尔律师从后面拽住了我的胳膊，让我给记者们打个招呼。于是我抬起手，微微笑了一下。

后来有记者说我抬起手露出五指，这明显指的是兴业银行亏损的那 50 亿欧元，我的微笑呢，是对兴业的

藐视与挑战。有家报纸甚至说我的姿势表达了一种“胜利的情绪”，于是写了篇题为《凯维埃尔走出戛纳式的明星步》的文章。说到媒体，记者们的本事总让我惊叹不已，他们可以从最细微处解读出深刻的含义，有人可以从一个微笑中挖掘出潜藏的个性，有人可以从举手投足间看到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但是那一天，所有的解读都错了，那绝不是一次得意洋洋、耀武扬威的出狱。当然，重获自由这让我欣喜，但是我从来没有表现出傲慢。

和记者们打完交道，梅耶尔律师把我们一行3人领到了她的家里。我先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两头我们都很激动。接着，梅耶尔给我讲了讲司法机关最近对我作出的管制措施。我不得离开法兰西岛<sup>①</sup>，不得会见兴业银行的某些人员，而且给出了详细名单，一共23人。奇怪的是，名单之中没有穆萨·巴基尔。穆萨，据信是我的同伙，却可以和我会面。据我想，这完全又是有关部门“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除上面两条之外，我还必须每周去警察局报到。可以说和以前的措施相比，

---

<sup>①</sup> 是法国本土22个大区（法国第一级行政区划）之一，该区域以巴黎为中心，因此又称为大巴黎地区。——译者注

这次确实是减压了。梅耶尔律师和克里斯托夫·雷耶一起去回答记者的提问。剩下我和纪尧姆·赛尔内两个人，我记得我们一起看了一期现场抢答节目《数字与字母》，我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那一刻是那么轻松，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真的，直到两三天之后我才渐渐真正明白那些天发生了些什么。

38天的铁窗岁月结束了，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呢？我完全不能预见，因为在那一个时期，预审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 9

### 预 审

头几次见面的时候，雷诺·范·伦贝克对我挺和善。在我被临时关押期间，他也为我感到焦急，后来预审法庭宣布将我释放时，看得出他也松了口气。范·伦贝克之所以有这样的立场，首先有人道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他本身就非常反对在作出最终判决前预先关押嫌疑人，其次还有司法方面的原因，我前面已经说到过，毕竟一个自由人更愿意和司法机关合作。

但是，我很快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原因或许是金融交易的技术性太强，他难以理解。他甚至和一些过从较密的律师谈过这个问题。金融技术确实很难懂，这一点我能理解。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过这类案件，所以对他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要想理解我和律师们的辩词，光有丰富的金融知识还不够，还

必须对交易厅的实际状况有敏锐的感知力。很遗憾，范·伦贝克法官没有这种能力。根本原因是，他对最新金融产品的了解非常有限。

20 世纪 80 年代金融产业对整体经济的控制力逐渐加强，全球范围内市场逐步自由化，金融产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进入新世纪以后，金融产品的发展进一步加快，而且出现了许多衍生产品。作为预审法官，对这些新生事物缺乏了解，这其实十分正常。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范·伦贝克法官似乎并不急于去获取这些知识。他盲目听信兴业银行，完全根据银行的陈述建立了自己对金融产业的理解。我认为，由于他的这种做法，他从预审一开始就被银行牵着鼻子走，最终走入了误区（后文中我会举一些例子）。而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犯下的一些过错从不加掩饰，总是直言相告。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对我很不利。

我或许确实有过错，而且是交易员这一行的典型性过错。犯错误的原因是工作中我拥有极大的自由度，而金融系统对此非常宽容，甚至予以鼓励。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的失职员工们本身就蠢蠢欲动；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交易员各自发挥所谓的创造性导致局势越发混

乱。这种情况其实正是银行希望看到的。话说回来，身为断案的法官，范·伦贝克的首要任务确实不是对一家银行机构作出判决，而是研究我的案卷，对我作出裁决。在我想向他传达的观点与他出于断案需要受人引导而形成的观点之间有一条鸿沟，随着时间流逝，这条鸿沟越来越宽。

有一天，我们之间的探讨又遇到了阻碍，我和律师都觉得不可理喻，不知道是谁忍不住说了出来：“怎么会这样？法官大人，您也是受过教育的人啊！”雷诺·范·伦贝克的脸板起来，气得发白，硬生生地说：“律师，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我认为他是故意这么做的。范·伦贝克正直、独立，所以容不得他人的质疑。他内心的信念是建立在一种道德判断上的。一边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机构，一边是单枪匹马却不断提出疑问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人难免会在不知不觉间受他人影响。近在眼前却视而不见，这句俗语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雷诺·范·伦贝克一辈子独立，无所畏惧，我想这恐怕是他第一次看走了眼，或许是证据太过明显了，所以他无法相信。

我的所谓预审，其实主要就是寻找罪证。兴业银行

控告我挪用资金、谋取私利、伙同多名同伙作案，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因为法官并不盲目相信。我对法官们说过，既然监管部门自己就会替交易员修改有问题的数据，我又何必去这么做呢？所以所谓“非法向计算机系统中输入数据”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或许正是由于我方的这些陈述，法官最初的看法终于动摇了。但法官同时认为这个洗脱不了我的罪名。我确实超过了资金限额，我确实做了虚假交易，有这两点就够了。至于说像兴业这样的大型银行不可能不知道其员工的交易模式甚至有意加以利用，这一点法官就置之不理了。雷诺·范·伦贝克似乎永远也不能透过个人的过错看清整个机构运营方式上的罪恶。同样的道理，他永远也分不清哪些责任应该由个人承担，哪些责任应该由机构承担。

我不知疲倦地罗列证据，却没有想到在法官们看来这些证据不仅不能为我洗刷罪名，反而把我自己越抹越黑。例如，我曾经对范·伦贝克说，3年间我的业绩增长了1700%，如果不是公然地违反规章制度，在什么公司里能够实现这样规模的业绩增长呢？还是在这3年里，我一共做了900多笔“不完全交易”。所谓“不完全交易”，是指我没有确认交易对手的身份。之所以如

此，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原以为银行与这些对手早就应该有过几十亿欧元的交易来往；第二，这些交易对手的资料里本来就没有任何相关信息。再追问一句，整个银行界一直致力于打击洗钱行为，这样神秘的巨额资金流动本应该引起他们的警觉，那么这个时候那些规章制度都到哪儿去了呢？

还有，法官们无法相信从一开始银行对我的操作行为都采取的是怂恿的态度。我当上了交易员，但并不能完全自主。就任以后，我很快觉得我对市场有一种潜在的直觉，以至于很多同事跑来向我要主意，问他们手上的交易该怎么做。预审期间有位同事就曾经坦言，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挣到 40 万欧元，而他自己花一个月也不过挣 70 万欧元！同事也好，上司也好，大家都知道我能够挣钱，而且都为此高兴，因为这样银行就可以最大幅度地获利。我和其他证人的话常常能够揭露银行系统的本质，只可惜范·伦贝克从不对此作出任何反应。我的这些供词不仅不能动摇他的错误看法，相反还使他更为坚定地认为我有罪，他的逻辑是：既然我做了 900 多手“不完全交易”，那么毫无疑问我有罪。我甚至觉得他已经不相信我的话了。



我和范·伦贝克之间的会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听证，一种是激烈的交锋。有一些会面是他提问我回答，并且对案卷中的一些情况发表我的看法，或者向他介绍我的工作。有一些会面兴业银行的人也会到场。有了几次会面的经历之后，我意识到双方的辩护力量极其不平衡。埃里克·科尔代勒、马夏尔·鲁耶尔、阿兰·德克莱克、尼古拉·柏南、菲利普·巴布兰，这些昔日的熟人如今和我形同陌路，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回答法官们的提问也是支支吾吾，似乎非常拘束。他们的证词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他们什么都没看到，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很明显，他们只是想把自己摘干净，同时这也反映出他们的失职。令我惊奇的是这两方面范·伦贝克竟然都不追究。他的逻辑似乎也可以归纳成一句话：这些人确实对属下故作宽容，但是当事人也没少利用他们的宽容啊。

兴业银行的高管中，第一个与我当面对质的是埃里克·科尔代勒。对质的次日，《世界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法官、交易员与天真汉》。接下来的一场会面中，范·伦贝克引用了这个标题，并且说他同意这篇报道的

意见，他觉得埃里克·科尔代勒就是一个天真、本分的人——这一点可和马夏尔·鲁耶尔的感觉完全相反，要知道，马夏尔眼中的埃里克可是一个老到的职场高手。还有，我的这位顶头上司（埃里克·科尔代勒）还对法官说，2007 年他的任务是到这个新岗位上锻炼锻炼。一位“天真烂漫”的经理，其直属团队捅了那么大的娄子，兴业银行还是给了他 70 万欧元的奖金，看来兴业银行还真是慷慨！我提醒范·伦贝克注意这一点，但是他不予采纳。

和让-皮埃尔·穆斯蒂尔的交锋要更为激烈一些。这位投行主管看上去身体有些虚弱，不怎么自信，回答问题含含糊糊，不那么精确——这也难怪，在兴业银行位子越高，到了法官面前恐怕就越难明白回话。

那次主要谈的是技术性问题。此前埃里克·科尔代勒和马夏尔·鲁耶尔都证明说部门 8 名交易员的总资金限额是 1.25 亿欧元，而这个资金限额是在工作日结束时针对计算所有余额之后投入资金的净值而言的。可是让-皮埃尔·穆斯蒂尔坚持说交易过程中实时投入的资金数量也应该低于这个限额。在场的克里斯托夫·米亚纳也这么说，但很显然这种说法是错的。我提醒在场的人

注意，无论是针对实时数额也好，日终结算也罢，归根到底这个资金限额其实只是一句空话——无数交易实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的一位律师立即提了一个很巧妙的问题：“先不说限额的含义，如果某位交易员超过了限额会怎么处理呢？”克里斯托夫·米亚纳不假思索地说：“他会被辞退。”律师接着问：“那么，你曾经辞退过什么人吗？”克里斯托夫·米亚纳说：“从来没有。”他的话无疑推翻了前面所有的证词，要知道这是银行主管说出的话，其分量非同寻常。这条证词说明：尽管银行内部有各种规章，但是谁都不遵守，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算违反了规章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但是范·伦贝克对这一番对话做了另一种解读。他认为既然谁都没有受过处罚，那就说明谁都没有违反过规章，而我开了这个先河！

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可以驳倒兴业银行有关限额的说法。2007 年我获得的经上级核准的收益有 5 500 万欧元，公司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做一个简单的计算——身为交易员每天都要做的计算——要取得这样巨额的业绩需要动用 15 亿欧元的资金。拿 1.25 亿欧元的限额来算的话，无论怎么计算都不可能有 5 500 万欧

元的收益。所以仅仅这一项就说明小组的 8 位交易员中有人突破了资金限额。既然公司高层如此重视 1.25 亿欧元的红线，这个漏洞怎么就逃过了他们的法眼呢？

与我的 n+3——菲利普·巴布兰的对质也是一场尖峰对决。那天早上，兴业银行通知法官说对待巴布兰务必要格外体贴，因为他患有心脏病，范·伦贝克立刻把这个指令下达给了梅耶尔律师。菲利普·巴布兰说，我在某些交易中间“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旨在隐藏业绩的手法”，法官当场表示这句口供不能记录——他或许在担心证人重读书面报告的时候这句话会让他受不了。在律师和我的一再坚持下，这句重要的话才终于得以保留下来。

这样的听证和当面对质加在一起有 100 多个小时，其中还有些事情颇值得一提。比如说方法误差的问题，随便找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能在 10 秒钟之内计算出一定的误差对应多大的资金额度，可我的上司们硬是昧着良心说我的误差不太大，所以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又说考虑到每天交易厅进出的资金数额很大，相比较而言那点儿误差并不算什么。他们的证词可谓是费尽心机但又漏洞百出。但是，面对那一大堆数字、术语和



演算，范·伦贝克显然是乱了方寸，在银行高管们的证词间反复纠缠，而且把他们的证词当做《福音书》一般深信不疑。

对欧洲期货交易所事件的审查也是这种情况。这件事在前面已经粗略地提到过，这里我再大概说一下。那是2007年11月，欧洲期货交易所的合规人员给兴业银行发来一封信，大意是该年我做了多笔巨额交易，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这一年，我曾先后两次前后总共动用了1200亿欧元，在德国市场上做了一系列买空、卖空交易。同年8月和10月，市场出现暴跌，我分别投入300亿欧元做买空，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前建立的仓位清空。这次动用的金额如此之大，可以说仅凭我的这两次交易就托住了德国的市场行情，而同期欧洲其他市场则一路下滑。

要知道，一般情况下欧洲各大指数总是以差不多的幅度波动的，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由于我的介入，一下子打破了这一规则。此举也激怒了德国市场上的其他交易者，他们呼吁交易所的合规部门展开调查，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人在操纵市场。合规人员最终锁定了当事交易员JK。合规部门当即决定给兴业银行发



一封正式信函，其中详细说明了热罗姆·凯维埃尔自年初起在德国市场投入了大笔资金。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很明白：为什么当事人要投入这么多钱？这种提问方式很少见，因为从本质上说我的这些交易并没有违反金融市场的任何规章。

2007年11月的一天晚上，兴业银行的合规部门给我看了那封信，埃里克·科尔代勒也马上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对信里提到的天文金额问都没问，反而一个劲儿地嘱咐我回信要尽可能含糊，千万不要透露我的投资策略。于是我在埃里克·科尔代勒的辅导下写了回信，信里谈到了虚拟头寸，但是语言尽可能模棱两可。很快又来了一封信，还是要求我作出解释，看来德国人已经发现了回信里的猫腻，而且这一次他们的话就不那么客气了。

德国人重点强调的仍然是投入的资金数额十分巨大的问题，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仅仅2007年10月的某一天，仅仅两个小时内我就向德国市场注入了15亿欧元。埃里克·科尔代勒和合规部门都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我们一起商量了一番，然后写了第二封回信，跟第一封一样基本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件事就搁在那

儿了，直到 2008 年 1 月德国人正准备再次重申他们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案子爆发了，他们也就收了手。

我认为，欧洲期货交易所事件对我的案子来说非常重要，原因有两点。首先，这次事件说明我的各级领导完全清楚我的行为，甚至还直接参与其中，其中埃里克·科尔代勒就绝对脱不了干系。然而，就是我的这位 n+1，在对质中居然说写回信的时候自己确实帮过 3 刻钟的忙，但是根本没有读过回信。其次，这次事件还说明兴业银行压根儿就不怕跟别的公司挑起利益纠纷。

其实银行的合规部门还预先和欧洲期货交易所驻法国的商务专员联系过，向他要主意，商务专员甚至还明白地告诉合规部门如果想平息德国交易所的怒气，回信中必须包含哪些要点。

结果问到这一段的时候，兴业银行不仅全然否定曾经参与过此事，竟然还声称自己根本就不知情。他们就差说案卷里的相关资料不是自己提供的了，其用心就是要把一切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稍晚些时候，他们又修改了辩护底线。有位先前的交易员同事私下里告诉我，银行内部开了通气会，统一口径说欧洲期货交易所那几封闹得沸沸扬扬的信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过我的

名字。

多么拙劣的手段，我的顶头上司和合规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无法弄清楚到底哪些人卷到了这件事里面，所以没办法应对，干脆一笔抹杀。这么多的异常之处似乎都没能引起范·伦贝克法官的重视，他好像并不想弄清楚事情的全部真相，只远远地看点轮廓和倒影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兴业银行碰到的麻烦大了，绝不仅仅是我这一个案子的事情。要知道在我的案子披露时，银行已经受到方方面面的攻击，日子本就难过。关于兴业银行投资次贷的传闻甚嚣尘上，一时间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2007年11月底，丹尼尔·布东多次发布公告，反复强调即便做最坏的打算次贷的亏损也不过2000万欧元，他的话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安抚投资者。两个月以后，大家也都看到了，实际亏损比他预计的高出10倍，而且从那以后每隔一个季度左右银行都要公布巨额的准备金，目的是修正股票的市值。到了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衍生品和次贷两项的总亏损攀升到了将近100亿欧元，其中的14亿欧元都是这一年最后一个季度创下的。

虽然败绩累累，但凭借账面上灵活的增值处理兴业银行最后居然也宣布赢利了。不过有证据表明，银行至今仍持有将近 350 亿欧元的有毒资产，而且这个数值还远远低于账面上登记的数额。兴业银行现任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乌代亚抓住一切机会安抚市场情绪，他之所以不把这些资产全部出手，唯一的理由是他认为这里面还有一点油水可捞。据他 2009 年 2 月份所说，2010 年将是一个反弹之年。我们姑且相信他的预言吧。但是，就当时兴业银行的困难处境而言，无论怎么说我的案子起码有一桩好处：我的案子充当了诱饵，为银行打了掩护，帮助它成功蒙混过关。

凯维埃尔这棵小树遮盖不了兴业银行这片罪恶的大森林。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在我的案子披露之后不久，美国股东爆发了集体抗议——在法国是见不到这种抗议的，法国规定股东只能以民事原告人身份介入司法程序。美国律师们公布的法律文件中提到，曾经有一些美国人所谓的“秘密证人”——其实就是一些不希望公开姓名的员工——披露说，2007 年 7 月包括让-皮埃尔·穆斯蒂尔在内的多位兴业银行高管曾经亲赴纽约，要求该行员工在计算机系统中修改某些市场参数。



文件中还引用了其中一位证人的证词。据他说，2007 年年中由于流动性出现严重问题，兴业银行持有的数百亿CDO/RMBS 金融衍生品无法得到稳定的报价，所以这些债券只好和其他交易性资产一样进行增值。因为价格缺乏流动性所以市场价格无法测算，只好使用模型价格，也就是说由银行确定价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正收益——尽管此举极有可能导致价值被严重高估，这位证人只好在兴业银行领导的授意下修改了计算机系统里的定价参数。银行总指责我向计算机系统中输入了虚假信息，其实它自己也未能免俗。兴业银行对上述指控百般抵赖抗议，但美国司法部门的报告上仍然白纸黑字地写着。看来，美国司法部门才真是一把快刀。

话说到这儿，那么银行公布的业绩还能够相信吗？首先，必须十分谨慎。兴业银行有将近 80%的交易性资产都是以模型价格为基准进行会计定价的（2008 年底全部 4 880 亿欧元资产中，有 3 890 亿欧元属于这种情况），由于不是以可见的市场价格为基准所以很难监控，哪怕有 1%的偏差都将对业绩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的那场集体抗议让法国有关机构极其不快，法国的媒体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应。现在大家应该都能



明白银行业必须非常谨慎的原因了，否则银行业的某些操作就会陷入下面这种怪圈：如果某项规章影响了业绩，那么把规章修改一番就行了。当初监管人员就是这么处理我的交易的，他们用内部模型价格替代市场价格，以此消除误差，从而使头寸回归票面数值。

起初的几次听证气氛还非常友好，越到后来情况越糟糕。渐渐的，雷诺·范·伦贝克简直不愿意听我说话，连我的律师们的要求都一概拒绝。我们多次向他提出，必须请独立的、专业的金融机构与计算机技术机构介入调查，因为案卷的所有材料都是由兴业银行提供的，所有的证人也都和银行有联系。每次法官都断然否决。后来，到了2008年6月份，他决定到兴业银行实地查访。他向我保证绝不和预审期间已经传唤过的证人见面，他说之所以要到兴业银行去看看，只是想了解一下我的工作情况，要取证也只找两边都不沾的人问。我提出和他一同前往。他不肯，但做了一点儿妥协：之前我提出有些补充性的材料应该加到案卷中来，这会儿他答应了我的申请，算是让了一步。梅耶尔律师建议我接受他的提议。不得已我勉强同意了，然而法官也玩这种讨价还价

的把戏，我内心实在不能接受。

范·伦贝克一从银行回来就一口咬定说我撒谎了。他说鉴于交易厅的环境，我完全有可能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完成交易。我立刻明白，兴业银行一定没有带他到我工作的交易厅去看。读书面报告的时候我又发现他此行约见了好几位已经做过证的人。我对他的信任顿时动摇了。这是预审期间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雷诺·范·伦贝克没有信守他的诺言，他辜负了我的信任。

2008年7月，法官通知我和律师，说他打算结束预审，还说他已经驳回了“要求加刑的诉讼请求”。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没有人告诉我。我发现律师和法官的态度都变得很恶劣，我想辩论的时候或许应当更强硬一点，但梅耶尔律师极力反对。她一向对范·伦贝克法官无比敬仰，我甚至觉得在预审期间她这种过度的仰慕有些不合时宜。与此同时，梅耶尔律师和纪尧姆·赛尔内的矛盾日渐升级，我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所以决定扩充辩论团队。

要想扩充队伍真是不容易。几个月以来梅耶尔律师东奔西跑，可谓尽心尽力，我自然希望她能负责到底。尽管梅耶尔和纪尧姆·赛尔内不太乐意，我最终还是给

团队里又引入了一位律师，名叫伯纳德·贝奈姆。这位律师来了不久，提出想再请3个顾问。有个叫埃里克·迪蓬·莫雷蒂的，擅长与媒体打交道，所以由他去对付范·伦贝克。剩下两位是弗朗西斯·蒂索和卡罗琳·沃瑟曼，负责技术方面的事情。

果然如我所料，梅耶尔律师不愿与外人合作，撂了挑子。过了不久纪尧姆·赛尔内也走了，团队扩大了，他觉得不自在。2008年7月，我向法官们通报梅耶尔律师已经引退，我又组织了新的辩护团队。范·伦贝克只好同意，很不情愿地说夏季过完再组织听证会。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准备案卷材料，因为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于是，我的身边有了4个新上任的律师，大家都觉得应该改用一种强硬的、带有进攻性的辩护策略。我给他们列出了一条条详细的摘要，写完后由弗朗西斯·蒂索通读、把关。

2008年9月和10月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往卷宗里加入了一些材料。看得出范·伦贝克读到这些材料后疑窦重生，我觉得这次局面终于稍微挽回了一点。

2008年12月，范·伦贝克决定第二次到兴业银行现场查访。他仍然拒绝我陪他一同前往，于是我转而提

醒他注意上次查访时一些不太正常的地方。我说银行在勒瓦卢瓦-佩雷另有一处站点，所有的计算机系统都设在那里，只要带上一位计算机专家就可以到那里安心查访，不用担心受银行其他人的影响。法官说：“我会考虑的。”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接下来的一次听证过程中，我的一位律师从话里话外揣摩出来法官将在下周一带一位计算机专家去兴业银行。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要知道法官第一次去查访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考虑我们的建议。

范·伦贝克回来了，状况和第一次查访完全一样。他认为我给他提供的情况全是假的，我从头到尾一直在搅局。他也不想想即便我真的搅了局，他不也没有站在我这一边吗？从专家出具的报告看，这位专家没干别的，就是在一旁看着兴业银行的人提取资料，所以完全无法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这位专家得出结论说：“从现有的技术材料分析，目前尚无法作出客观判断。”

这简直太过分了。我立刻要求再选派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前去调查。法官拒绝了，理由是他手中已经掌握了全部的证据。我一再坚持，甚至不惜使出激将法：如



果我害怕专家得出对我不利的结论，我干吗还一再坚持派人去调查呢？法官完全听不进去，接着把律师呈递的七八份要求补加材料的申请一并否决。我们提出要传唤某些证人当面对质，也被他否决。这些证人中，有一位是银行内部监控部门的主管，他一年到头的工作就是一份接一份地读稽核部门发来的报告，在后面附上一份由银行总裁签名的参考材料，材料的内容无非是说银行内部每天都会严格审查各笔交易的实际状况，各独立机构的交易情况都在审查之列。<sup>①</sup>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好几百笔毫无“实际状况”可言的虚拟交易逃过了他们的审查，而且其中一些交易还高达数十亿欧元呢？

上面提到的那些文件的签署人——丹尼尔·布东，法官不肯传唤；银行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负责领导银行内部调查并出具了那份让人错愕的调查报告，法官也不肯传唤。兴业银行到底是向股东撒了谎还是向司法机构撒了谎，抑或对两方都撒了谎？这个问题就成了永久的谜，永远没有答案。法官和我们一方已经不能用气氛紧张来形容，简直到了糟糕得无以复加的地步。

---

<sup>①</sup> 参见附录。



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辩护的机会。法官驳回我们的申请，我们便上诉要求撤销他们的决定。可是这么做也没有用。受理上诉的是预审法庭的庭长，而正是这位庭长曾在 2008 年 2 月份的时候判决将我临时收押，他丝毫不容变通，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召开庭审，而且认为我方的申请完全是在拖延时间。

有一天晚上，律师来通知我说召开庭审的申请又被预审法庭给拒绝了。申请无数次被否决，我压抑着满腔的怒气苦笑着对他说，我已经看出来了，后面只剩下一场庭审——判我下狱的那一场。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在我这一边是一支 7 个人组成的小团队，而对手是四五百个直接或间接为银行卖命的人。我尤其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法官和预审法庭一门心思地要否决我的申请？我提交了那么多申请，目的无非是一个：在法官面前证明我的证词是千真万确、有据可查的。

2009 年 1 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丹尼尔·布东良心发现了。我的案子爆发的时候，他对小投资者们说我的交易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年过去了，或许他对投资者

们的关切减轻了。丹尼尔对一家英国报纸说他觉得很放松，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他已经变了。他甚至还不无讽刺地说凯维埃尔事件确实给他带来了恶劣影响，因为他好几个月打高尔夫球时手气都很臭。丹尼尔良心的不安起码影响了他的球技，我真为他高兴。但我本人的麻烦还完全没有解决。

1月22日，范·伦贝克和我做了最后一次听证。我在蒂索律师的辅导下，预先写了一篇声明，当着法官的面念了起来，言辞很激烈。我说，这场预审实际上是兴业银行主导的，听到这儿法官的脸顿时白了。我接着逐条列举司法调查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总共有15页纸之多，然后回到兴业银行的监察系统上来，每条控诉都有证据作为支撑。

范·伦贝克阴着脸，听得很认真，一句话都没说。连最后的结尾陈词都没能带出他一星半点儿的话来，我说：“在预审阶段，我觉得必须把这番话说出来，必须把预审法庭上触目的污点指出来。这些污点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法庭采信的一切证据均来自于兴业银行，而且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急于结案。”

我坚持要求把这份声明也放到卷宗里，双方争执了

好半天法官们才最终同意。我还要求把从前的交易员同事与银行之间签订的解聘协议书<sup>①</sup>也放进去，这也费了半天口舌。他们被叫来作证的时候一个个缄口不言。后来他们继我之后也被银行辞退，银行给了他们大笔的封口费，要他们保证今后不说这位昔日雇主的坏话。协议书上写得明明白白，虚拟交易、隐藏各种交易信息，这些事儿他们也没少干。于是，他们紧张了，他们想自救。另一方面，他们离职前对兴业银行作出的那番承诺正好证明了我的供词。我只恨这些昔日的同事、昔日的朋友，一进了法官的办公室就把朋友义气、同事情谊全扔在了一边。更让人遗憾的是，法官们看到了这样的证据，却认为无足轻重也扔在了一边。

听证会在冷冰冰的气氛中结束了。结束前各位法官均提交了自己的预审报告，再过几天会正式通知我们。第二周正式文书送到了我们手里，预审已经结束了。确实，预审的实际时间比范·伦贝克预计的长了半年多，但这半年多时间并没有结出什么果实。我们预先又收集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放到了卷宗里，其中包括银行委员会

---

<sup>①</sup> 参见附录。

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对兴业银行的某些行为大加谴责，还有 2008 年 1 月对我的头寸进行清仓操作时的一些信息，以及稽核部门出具的几份文件——这几份文件足以证明交易员超越资金权限是常有的事儿。

面对这样的证据，范·伦贝克仍然无动于衷。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切早在夏天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事情越往后拖案卷就会越堆越厚，技术性问题会让他看昏头。有一天我向他建议指派一位专家来协助调查，他反问说：“如果我把权利移交给他人，我还能是预审的主宰吗？”什么都别再讲，这一句话已经说尽了。他觉得这预审一审就是一年，其中的 6 个月都是我在闹着玩儿。但是不管他怎么想，我对预审的公正和公平有着自己的理解。

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律师们又和我吵起来了。从这时候起，我不仅要应付摆在第一位的那场持久战，还要违心地敷衍媒体。一个律师要我给《名利场》杂志拍一组照片，我想方设法刚刚才推掉，那边团队的另外几个人又要我去参加什么采访活动。我跟他们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媒体已经介入太多，从案件爆发以来多次歪解我的意图，再者我的首要任务是说服法官。看到这一招

不灵，团队的律师们纷纷开发创造性，有的频繁对外发布言论，有的对外阐述其辩护底线，还有的大肆传播小道消息。

最后的一根稻草终于压死了骆驼，这根稻草就是《巴黎人报》刊登的一篇私人专访。那是2008年年底我的一位律师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一个忙。他说自己有位当记者的朋友刚刚休完产假，想了解一下我的案子，要请我和她见见面。我不乐意，拒绝了，但这位律师死缠着不放。想想自己从来没有给他们开过工钱，我想这点儿小忙能帮还是帮一下，于是我就答应见他的朋友，说好只谈案件的技术性问题。

会谈持续了大约45分钟，我给她讲了案件中涉及的金融技术，介绍了交易员这个行业的情况。过了几天，这位记者要求再见面谈一次，一开始我拒绝了，但是她接着又央告了好多次，我只好同意。我见了她半个小时，从技术层面谈了谈行业的灰色地带。接着她第三次要求面谈，我断然拒绝。

后来我了解到，就在我拒绝她之前，她已经连续找过我团队中的多位律师，想从他们那儿弄到案件卷宗里的一些材料并且威胁说如果得不到材料就把几次面谈的



谈话记录公布出去。于是我给当初从中联系的那位律师打了电话，把团队被勒索的情况告诉给他。他话锋转得很快：“你自己想办法去吧，我不就是你一个发言人嘛！”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是这种态度，当即挂断，又打给其他几位律师，叫他们千万别答应记者的要求。

2008年1月22日，这天早上将召开我的最后一场听证会。5点钟，我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短信：“看《巴黎人报》了吗？”我好比从万米的云端跌下来，两个小时之后我看到了报纸和当天的头条：《凯维埃尔开口了》。这篇文章把对的、错的、以讹传讹的流言、蹩脚的分析全搅在一起。连“bull”（牛市）、“bear”（熊市）这样的词语都写错了，写成了什么“boule”（情绪低落）、“beau”（帅）<sup>①</sup>。

那个记者上哪儿去弄来这么一篇东西？一时间我又觉得好笑，又觉得错愕和震惊。仅举一例，会谈的时候我曾经说过预审是在兴业银行的“支持”下进行的。报

---

<sup>①</sup> “bull”、“bear”是英语单词，分别与法语单词“boule”、“beau”发音相近。可能那位记者对金融行业不甚了解，面谈中记录时出了错。——译者注

纸上的文章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我的原意不是经济上的支持，而是说预审期间所有的证据都是由银行提供的，因此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

文章里还有很多话完全歪曲了我的意思。之后我还了解到，我的某些律师居然与报社串通一气，那份所谓的“专访”在出版前一夜曾经由他们审校过。无论如何，那篇文章出落得很蹩脚，这也顺便说明他们的本事是多么的不济。

我立即联系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出面辟谣。有位律师嘱咐我一定要慎重，辟谣的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仍然觉得应当立刻就进行。于是他立刻站到了经济法庭前的台阶上，对着下面的人群说：“跟记者说话，恐怕和跟杂货店老板说话并不一样。”我想他或许是想说我说出的话当然由我负责。我当即解散了律师团队，只留下了弗朗西斯·蒂索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他很能干。接着，我又开始寻找辩护律师。就这样我找到了奥利维耶·梅茨纳律师，其实之前就有人多次极力举荐他，但当时我生怕他不乐意接手。我和他接触了几次，决定把辩护的重任托付于他。

当然，我和某些记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短时间就能扭转的。早在我的案子披露那时候起，个别记者就煽

风点火，说兴业银行预备要好好地惩治我，他们一会儿说我“有自杀倾向”，一会儿又说我“狂妄自大”。艾利·鲁蒂埃，那个曾经凭借萨科齐和塞希莉亚的真假短信门事件迅速蹿红的家伙<sup>①</sup>，就拿我和穆萨·巴基尔先前来往的短信谱成了曲。有些短信其实就是朋友间的普通交流。有一次我做成了一笔交易，穆萨调侃说：“凯维埃尔的实力再次得到展现。”我当时放声大笑。这条短信也被艾利·鲁蒂埃篡改了，面目全非。照他的话来说我成了一个自我意识急剧膨胀的家伙，甚至于常常会用第三人称指代我自己。这个厚颜无耻的记者居然还拿我亲友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还要面谈，我没说几句就挂断了。看了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我还会信任它的作者吗？这个人又解释说他工作很忙，出错在所难免，请我理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记得有这么句话“报纸划的伤是永远不会愈合的”，忘了是谁说的，但说得真准，真有见识。

---

<sup>①</sup> 是法国著名周刊《新观察家》的资深记者，他声称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布吕尼婚礼前夕曾给前妻塞希莉亚发短信说：“如果你回来，我将不计前嫌。”后来，这条短信被改成歌曲，在网上流传。——译者注

奥利维耶·梅茨纳研究了 my 的案卷，大感惊愕。主办案件的两个法官也是 he 向来所敬仰的，他说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预审就出自他们之手。他尝试提请上诉，要求重启预审程序，并且要求指派专业人员协助。预审法庭再次驳回，甚至懒得组织一次庭审讨论一下律师的要求是否必要。

但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的脚步，我始终对祖国的司法体系保有信心，坚信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预审期间我提出的疑问全都被忽略了，现在我只有一面等待轻罪法庭的庭审，一面期盼到时候那些问题会得到重视。好多新消息进一步坚定了我的决心。范·伦贝克法官曾经从兴业银行取出过一些电子材料，但始终不愿向我们公布其中的内容，而且材料的复制品已经归还给了银行。现在，法庭的庭长给了我们一部分——我们终于获得了案卷中的最新材料。似乎非得让我站到轻罪法庭前面，我才能够得到司法机关的公正待遇。

我希望公开辩论的时候能够对那些指控提出异议，这样一来就可以缕清事实的真面目：银行是如何向下属发出些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指令并从中渔利，一旦需要将某位前雇员打倒时又如何篡改文件、抹杀证据。这

一切就都可以昭雪。新发现的文件中，有一些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明兴业银行自 2008 年 1 月 24 日以来的信息沟通方式。有了这些资料，我就可以揭露银行先后对媒体、公众舆论和专业人士的误导。我们还得到了一封克里斯托夫·米亚纳的邮件，邮件要求银行的交易员对外必须统一口径。我一口气读完，心里十分畅快。

从这封邮件里我还了解到，其实我真正的工作并不是“市场开拓者”，而是套利交易员。这两者一个涉及与银行账户有关的交易活动，一个则与客户联系，两者间差别极大，拿建筑作比方，简直可以说中间隔着一条中国的长城。要是早点儿知道这个信息就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进攻总好过老实实在地一个劲儿地交代自己的错误。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条“长城”的密封性能不怎么样。3 年里我在上司的安排下既为客户的账户交易，又为银行的账户交易。我从前的很多同事恐怕还在这样做，茫然不知自己已经违反了公司章程。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曾经还有人要我负责给巴黎市场上的一些重要基金做增值交易，其中包括 Lyxor、ETF、CAC 40、Eurostoxx 等基金，这岂不是把我换到



基金管理公司去了，而且我所在的团队中还有一人专门负责做市场开发。这些安排完全与合规部门的要求背道而驰，为了掩藏可疑痕迹，做这些基金的银行要想接到信息，必须经由 Lyxor 基金管理公司的邮政地址代转。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使那一条“长城”安泰长久。只可惜银行委员会的人不愿听我说，这里面的名堂实在太多了。

|                        |                      |
|------------------------|----------------------|
| 通告                     | 收件人：×××              |
| 发件人：×××                | 抄送：×××，×××，×××       |
| 2008 年 1 月 24 日 10: 43 | 主题：克里斯托夫·米亚纳的指示—内部通告 |

 注意：附件中，另有丹尼尔·布东的指示。

▼ 内部通告（问答指南）-英语版本

► 内部通告（问答指南）-法语版本

本文件为公司内部通告，可作为员工回答客户问题时的参考。因系内部文件，严禁向客户提供本文件的书面版本。

严禁向媒体透露通告内容。官方公告的发布，由联络部全权负责。

要点：\_\_\_\_\_

1. 兴业银行没有倒闭的风险。

我行运营状况持续坚挺，仅 1 月 20 日至 23 日就实现再融资 55 亿欧元。这笔融资来自世界级银行巨头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短短 3 天融得巨资，说明兴业银行运营稳健。获得这笔融资之后，我行的净资产跻身世界前列，我行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再创佳绩，持续发展壮大。

2. 前台部门的亏损是由某位交易员挪用资金造成的。  
该交易员设法绕过了各级内部监控机制。1月19日银行发现了这笔亏损，当时数额还不算十分巨大。因情势所迫，银行决定清空相关头寸，恰逢黑色星期一，清空操作进一步加剧了亏损程度。
3. 本次亏损只涉及套利业务。  
或者说，亏损和面向客户的业务毫无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两种业务之间隔着一道“中国长城”）。
4. 亏损属于孤立事件，并非前台交易模式的过错。  
尽管2007年第二季度市场行情非常不理想，如果刨除这笔亏损，前台部门的全年利润额实际上仍然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
5. 在此之前，前台部门曾多次应对危机事件，并且总能完美解决。  
例如，无论市场行情如何变幻，前台部门始终能够稳定其产品报价，确保正常提供服务。
6. 前台部门仍然是兴业银行的急先锋。  
尽管发生了亏损，前台部门仍将继续努力，始终不懈地将这项业务做大做强。
7. 兴业银行的评级已经下调，目前为AA-级（下调一个级别）。

## 问答指南

问：为什么兴业银行会发生这么巨大的亏损？

答：这次亏损是套利业务中的一个孤立事件，套利业务只和银行自身的账户有关，不涉及客户们的账户。套利业务和客户账户业务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别，可以说中间横着一道“中国长城”。

问：银行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这笔亏损的？

答：2008年1月19日，星期六。亏损被发现时数额还不算高，接下来的一周银行必须清空相关头寸，恰好当时市场行情不佳，导致亏损进一步扩大。亏损将计入2007年财政年度的账目。要不是出现了这笔亏损，该年度前台部门本可以创造一个赢利新纪录。前台部门的业务模式仍然是坚实可靠的，兴业银行管理层对此充满信心。

问：为什么银行没有及早发现问题？

答：涉案交易员设法绕开了各级监控环节，他利用银行系统和后台系统躲开了层层监察机制。案情最早是由一位经理发现的。

问：银行是否还有其他重大亏损没有向外界公布？

答：我们已经尽最大可能将银行状况公之于众。这是一个孤立事件，而且非常罕见，我们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有理由相信银行已经挖掘出了所有可疑交易。我们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严格监督，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问：涉案的交易与我们的业务有关吗？

答：没有关系。套利业务与客户业务毫无关联。两类业务之间可以说横着一条长城，密不透风的长城。涉案的交易员并不负责针对客户的产品报价，也不负责管理客户手中的头寸。

还有一些文件，我确信必定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在银行所谓的规章面前我的同事和我一样拥有同等的自由度。伪造及使用虚假文书、滥用信任、非法向计算机系统输入数据，这就是银行对我的指控，我将进行坚决的回击。我确实是犯了些错，但我的内心依旧是坦然的。

我并不是金融危机的象征，也不是那场在我案发后不久撼动全球金融界的飓风的先兆；我只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普通人，犯了过错，而长久以来这家银行一直纵容这类过错，因为它可以从中牟利。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对我的指控不过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整个体系都着了魔咒，要想驱走魔鬼恢复纯真无瑕，必须找到我这么一只替罪的羔羊。

2005年，这也是我从事交易活动的头一年，到年

底我总共获得了 500 万欧元的收益。此时我已经逐步开始触犯公司规章制度。上司非常明白这样的业绩是以违反制度、冒着巨大风险为代价换来的，可是他们要我 2006 年再赚到这么多钱。2006 年我为银行挣到了 1 000 万欧元，同时在违反制度规定的路上也越走越远。而实现 1 000 万欧元的利润又成了我 2007 年的新指标，别忘了，这一年我的经营领域被削减了 80%，而我挣到了 5 500 万欧元，当然违反制度的事儿干的也更多。如果我的案子没有曝光，2008 年他们还会要我挣多少钱呢？我不敢想象。

慢慢地，业绩文化变成功绩文化，接着还会变成勋绩文化。这一路跑下去是不会有尽头的。我在不知不觉中急急忙忙地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向前跑，或许永远也没有从中摆脱的可能。可以说，每位交易员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困在一场伊卡洛斯<sup>①</sup>的迷局里：不停地向上飞，离太阳越来越近，同时离坠落也越来越近。更糟糕

---

①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伊卡洛斯与代达罗斯绑上用蜡和羽毛做成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他因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被太阳融化，跌落水中丧生。——译者注



的是，一路上我竟茫然毫不自觉。一个又一个的指标仿佛一台强大的推动器，让我不停地向前奔跑。而且我还不无骄傲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的指标高，说明大家喜欢你，毕竟在这么一个和美的大家庭里，大家彼此间都互相帮助。

交易行业的动力来自方方面面，其中一条是这样的：既要允许每个个体待在自己的角落里做事，还要说服他们为了团体的业绩而战，所以大家各自对着自己的显示屏，但同时又形成一个所谓的同气连枝的团体。一个理想的交易员似乎可以享受到很多好处，一面享受自由工作者的独立，一面品味中小企业的舒适。但是我们要知道事实绝非如此。如果要给交易员体系起一个名字的话，应该叫做“齿轮机”。整个体系就是一部齿轮机，以人为齿轮滚滚向前，直至将他们绞杀碾碎。每个人的行为，相互倾轧也好，对物欲的无穷追求也好，都是齿轮运动的动力。最后这部齿轮机让人们失去自我控制力，让事实晦暗失去了光泽。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自由、集体的团结这样的漂亮字眼儿还有什么意义呢？严格来说一点儿意义也没有。

有 3 种征候共同主宰着交易大厅。欺骗症，拒绝作



证、不许透露半点细节，但是伤害储户利益的集体性欺诈如山峰般岿然不动。孤独症，人人对眼前所见之物仿佛毫无察觉。失明症，无论事实是如何在眼皮底下闪光，原本该通观全局的人就是看不见。

有了这样的环境，就算交易厅里出点儿什么事也从来掀不起多大风浪，这种情况根本不足为奇了。几个月前东京兴业银行的一位交易员卷入了和我类似的事件中，他被银行辞退了，但一切到此戛然而止，尽管银行委员会多有指责，但是兴业银行从未对此人提出任何指控。

在拉德芳斯区，在我原先工作的那一栋楼上，据称有一位交易员先是隐藏仓位，接着又亏了一大笔钱，但他个人没有从中得到半点儿好处。顶头上司把他好一通训斥，他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了。接着他给妻子打了电话，嘱咐她照顾好孩子们，然后走下楼，从天桥纵身跃下，当场死亡。银行只发布了一条极简短的讣告。

最近，还是在拉德芳斯区，一家报纸披露兴业银行某子公司的一位员工挪用 200 万欧元以饱私欲。这件事性质恶劣、让人惊愕，但是媒体关注度极低，而且似乎该员工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而就在现在，在巴黎、东京……世界各地的交易厅

仍然满负荷运营着，天文数字一般的资金仍然以光速飞驰着，仍然有人在派发丰厚的奖金，仍然有人挣到钱后彼此拍一下后背，仍然有人亏损后满脸写着狼狈。这一切依然存在，因为交易还要继续。

再过几周就将对我作出判决。两年以来，我从前的雇主与某些媒体戮力同心，把漫天的指责泼到我的身上，我经受住了；一场不完全的、受人拨弄的、不公正的预审，我经受住了；如今，我平静地等待着判决日期的到来。总听人说，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我的头顶之上。我不喜欢这个比喻。雷诺·范·伦贝克劝我早些接受预审结果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比喻：“早早结束预审对你是有好处的呀，凯维埃尔先生。拖得越久，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在你头顶上悬得越久。”我说，我不比速度，我要跑到终点，审再久都行，我只想让大家看清真相。

如今，生活只剩了一片瓦砾，我静静地看着。审判不开始，重建就无法启动，它主宰着我的未来。只有一件事情能够洗去父亲留给我的名字上的污泥，那就是重现真相。不要只说我的责任，要让所有人的责任发出一

声爆响，袒露在阳光下。只要一个条件就足够，这个条件又必不可少：面对法官，那些知情人会有勇气证明交易厅里发生的一切吗？私下里有几位向我表示会给予支持，但却至今仍然拒绝公开作证，他们担心别人的报复甚至工作的丢失。但是就在案件披露不久，还没有成为所谓的“凯维埃尔事件”之前，有几位当交易员的同事已经同意去自首了。2008年1月29日《世界报》的一篇文章就可以证明：

“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兴业银行一名前任交易员说。“据估计，凯维埃尔先生买入了14万手DAX指数合约，其他交易员谁也没有能力买这么多，这个数量很惊人。”兴业银行前雇员说。凯维埃尔先生买入这么多合约，是如何付的保证金，至今仍然不清楚，除非他当时是赢利的。凯维埃尔先生确实经常赢利，他的多位同事曾说：“除了最后那段时间，他从来没有亏过，就那一回他被逮住了。”“12月底的时候，他的净盈利还高得惊人，达到了15亿欧元。兴业银行内部纷纷传言他所在部门业绩也非常好，分到了十分可观的奖金。”

前面已经讲到过，仅一年时间银行就我的头寸支付或收取的保证金总计将近 300 亿欧元。受采访者说得很准确。这一段匿名证词还说明我的收益被人们深深地记在心里，而我的“坠落”只随着 2008 年年初的那股风吹来吹去。

在此，我想呼吁所有有能力提供帮助或者提供哪怕一星半点信息的人们，请勇敢地站出来作证。即便不能出庭作证，面对公众也好；即便和我的案子无关，能反映金融界现状便好。只要司法部门、全体民众都了解金融界的行为，那些了解内情的人就会不再害怕。恰好相反，能够为揭露真相出一份力，他们会觉得无比自豪与满足。至于说别的一些人，我不指望他们做什么，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如果朋友离你而去，那说明他从来都不是你的朋友。”

我从这段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多年以来工作是我生命里唯一的中心，我的一切都围绕着工作来设计安排，不知不觉间伤害了那些对我来说至亲至爱的人。现在我明白了，要想让生命坚实，就必须和亲人们一起建造。从 2008 年 1 月 24 日起，数不清的谣言、漫天的污水从四处泼到我身上，我将不懈奋斗，从父亲留下的姓氏上

把污泥、谎言一一洗刷干净。我知道这条道路将无比漫  
长、无比艰苦，我将不断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爸爸，我向你保证！



附 录

文件 1 会计部门内部邮件

|                 |      |                         |
|-----------------|------|-------------------------|
| 发件人：×××         | 收件人： | ×××                     |
| 2007 年 7 月 12 日 | 抄送：  | ×××，×××，×××             |
|                 | 主题：  | 回复：Clickoption 部门发现重大误差 |

你好：

麻烦查一查这些交易的对手方的身份，此事请务必优先办理。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对某些内容进行修正，急需相关信息。

这 5 项交易产生了 79 000 万欧元的误差，反映到资产负债表，将达到 10 亿多欧元。这样的结果，我们万万不敢上报。

考虑到 8 月初要发布公告，所有账目整合均提前了一天，所以今天晚上要冻结账户。

谢谢你的理解。

## 文件 2 金融与会计业务内部监控流程

### 独立于前台之外的会计数据流程

后台与中台部门独立于赢利团队之外，这是会计数据与监管数据的可靠性与客观性的根本所在。后台与中台部门应依照集团制定的一系列流程，对金融与会计数据实施监控，其中包括：

- 每天核查上报的数据信息，查验其真实性；
- 会计数据与监管数据各通过一套流程取得，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差距，应在指定期限内协调解决。

## 文件 3 解聘协议书 1 号

致×××先生

本协议书以挂号信的方式送达

巴黎，2008 年 5 月 20 日

先生：

此前，我们已于 2008 年 5 月 5 日做过一次面谈，现通知你，兴业银行决定将你解聘。

解聘的原因是失职。

此前，你在 Delta One 小组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因此，你应当细心跟踪该小组的业务，培养领导班子，严格管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与措施确保小组的各项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但是，你的监管却漏洞百出。

无论是你先前担任 Delta One 业务主管期间还是 2007 年初就任 Delta One 系列产品直接主管之后，情况都是如此。

在后面一个岗位上，你居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每日审核业绩，月末审核 CPM 数据）托付给他人，甚至知法犯法，对原本异常重要的日常风险跟踪工作漠不关心。

再者，你对团队的监管极其肤浅，只停留在表面，满足于听团队成员“汇报”，身为主管，却不实地查验。

你对业绩没有深入调查，仅限于听听下属极其简单粗略的解释（涡轮权证产品方面尤其明显），对于 2007 年 7 月推出的新型套利产品，甚至没有要求下属作专门报告。

此外，你从来没有认真考量下属交易员的贡献率，例如对热罗姆·凯维埃尔在 2007 年取得的业绩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某些业绩数额异常巨大，你却没有要求有关人员就其来源作出说明或证明。例如，曾有人申报了高达 2 500 万欧元的业绩，就涉及的业务性质而言，这笔收益极不正常，你却没有追究此事。

你曾经多次收到警告，其中提及一些极其可疑的现象，却没有作出回应。

2007 年 4 月、5 月，你曾多次收到电子邮件，其中提到了一些数额极大的误差（4 月份有一笔竟高达 9 400 万欧元）。如果深入调查，原本应该能从虚拟交易和 DAX 股指期货的巨额合同上看出一些端倪。

2007 年 7 月，热罗姆·凯维埃尔从外界挪借来 10 亿欧元，这一点也没有引起你的重视。你甚至没有想到，该交易员经手的交易根本不需要这么大额的资金。

此前，在 5 月 5 日的面谈中，我们列举了打算将你解聘的

原因，你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我们觉得，你的辩解尚不能让我们改变看法。

因此，我们不得不撰写此信，将解聘的消息通报给你。

从你签收本协议书的次日起，你将获得 3 个月的解聘提前通知时间。这 3 个月结束之后，解聘将正式生效。当然，你也可以在签收之后 10 日内申请复核，也可以委派代表或者请工会组织出面申请复核。

在本协议书正式生效之前，你可以继续领取薪金，薪金数额比对参考薪金确定。

提前通知期结束之后，你将领到剩余的薪水，同时还将向你颁发工作证明和工商就业协会证明。

依照《劳动法》第 993-6 条，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你有权获得 80 小时的就业培训。

如有此需求，请在提前通知期结束之前提出申请。除提供培训之外，还将为你开具能力证明和培训经历证明。

有关培训的其他条款，请查看协议书的附件。

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兴业银行投资银行部

## 和解协议

甲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738 409 055 欧元；

注册地点：巴黎；

注册号：B 552 120 222；

公司总部地址：巴黎，75009，欧斯曼大道 29 号；

甲方代表：×××（职务：人力资源主管），全权负责处理本事务；

乙方：×××先生。

双方就以下问题展开了谈判：

## 1. 事实

乙方（×××先生）于××年××月××日受聘于兴业银行，担任交易员。

截至事发前止，乙方升任 Delta One 部门主管，负责追踪该部门业务进展情况，确保该部门的交易符合规章要求。

兴业银行控告乙方玩忽职守，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尤其在业务追踪、监管与领导等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上述情况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公司决定对乙方启动解聘程序。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2 日以信件的方式通知乙方参加解聘面谈。面谈最终于 2008 年 5 月 5 日举行。

乙方于 2008 年 5 月 26 日收到公司发出的挂号信。至此，乙方因失职正式被公司辞退。

## 2. 乙方立场

乙方告知兴业银行，他认为解聘无论在程序上还是本质上都不符合有关规定，与事实情况不符，并且对他的职业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

乙方对解聘的动因提出异议。乙方认为，鉴于其拥有的权利有限，应该说任职以来他已经正常完成了承担的各项任务。乙方强调，无论如何公司提出的指控绝不能由他一人承担。



乙方认为，其所在部门之所以运营失常甚至出现种种乱象，根本原因在于组织不到位。这一切与他的领导指挥无关，而且他曾多次向上级汇报过此事。

乙方认为，其所在部门人员配备不足，下属单位又陆续有多人离职，且管理工具匮乏。乙方指出，他曾经给 Delta One 系列产品负责人下达过明确指示，要求此人在负责常规业务监管之外接受相关培训。

乙方透露，2008 年 1 月底其上级曾要求他继续执掌 Delta One，并将其发扬光大。乙方认为上级的这种表态足以推翻所谓“失职”的指控。

乙方声称，由于事发突然，公司此前又推迟发放他的年度奖金，所以解聘的决定使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乙方认为，公司的解聘行为不符合程序规定，没有事实上的正当理由，在职业前途上、物质利益上和精神上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乙方要求兴业银行赔款，弥补他的损失。

### 3. 兴业银行的立场

兴业银行认为，对乙方的指控完全属实，由此作出的解聘决定无懈可击。

兴业银行称，乙方玩忽职守，工作上存在重大失误，重点体现在其承担的监督职责上，相关情况完全属实，且有据可查。

兴业银行对乙方的最大指控是：乙方没有采取必要的监管与审查措施，而仅仅满足于下属们极片面的报告，同时没有对相关部门的多次警告作出回应。

兴业银行指出，上述情况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无法容忍。

兴业银行认为，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必须解除。

银行指出，公司规章对类似情形早有明文规定，因此乙方不可能从所谓“被推迟发放”的年终奖金中获得任何补偿。

银行特别强调，上面所讲的一切均有依据。

兴业银行表示，乙方为弥补自己所谓的损失，开列的赔偿金额太过高昂。银行对此提出异议。

最后，双方多次接触，在两方顾问的介入下互相作出让步，确定了以下和解条件。

## 1. 界定离职的性质

1.1 双方商定，×××先生的终止劳动合同提前通知期已于2008年8月27日晚结束。

在此期间，×××先生不得履行其工作职责，但仍然可以按照正常标准领取工资。截至目前，工资已经领取完毕。

1.2 兴业银行以结余款项的名义，向×××先生发放以下款项：

- 截至2008年8月27日，×××先生有当休未休的“带薪休假日”共计26天，折合补偿金8 171.50欧元；
- 按照规定，截至2008年8月27日，×××先生本应享受“半工作日休假”总计12.5天，折合补偿金3 994.08欧元；
- ×××先生的“时间储蓄账户”<sup>①</sup>中共有19.74天，折合4 480.71欧元；

---

① 法国的一项劳动保障制度。雇员和公司签订专门合同之后，可以把应休未休的假期和带薪假期积攒起来，将休假的权利留到以后使用，或折算成一定的薪酬补助。——译者注

- 按规定，支付解聘补偿金 49 035 欧元。

(前 3 项款项需要扣除相应的社保费用。)

1.3 ×××先生不得与其交易对手形成竞争关系，为此，从 2008 年 8 月 27 日起，×××先生每月可以从交易对手处领得退场补助金 6 923 欧元。本项禁令将于 2008 年 10 月 27 日解除，届时补助金也将停止发放。

1.4 为避免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再次发生争端，兴业银行愿意弥补×××先生所提出的若干损失，将向其一次性支付和解补偿金共计 750 000 欧元。

按规定，必须从这项补偿金中扣除社会债务公摊费等社保性费用。

扣除相关费用之后，补偿金净值为 678 600.59 欧元。该笔款项将在协议书签字当日发放给×××先生。

## 2. 双方的义务

2.1 ×××先生承诺，其掌握的所有与兴业银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已上交。

2.2 ×××先生确认，本文件第 1 条中所列举的款项已经涵盖了他在兴业银行任职以来能够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获取的全部金额。

×××先生宣布，今后绝不向兴业银行及其下属子公司索取任何形式的实物或现金（包括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津贴、补助、期权、股权，以及各种形式的补偿金，如提前通知期补助、带薪假期补助、解聘补助、损失补助等）。

2.3 除本文件第 1 条中所列举的款项外，×××先生承诺，不以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领导主

张任何形式的权利，也不提起诉讼。

×××先生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尤其不得提供证据）任何针对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领导的诉讼行为。

相应的，在×××先生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兴业银行绝不以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先生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

2.4 ×××先生承诺不伤害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领导的利益。

承诺如下：

- ×××先生任职期间，曾有机会掌握公司信息。离职后，应严格遵守保密要求，不得泄露有关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的信息。

- 不得就离职情况与在兴业银行的工作情况发表任何评论，也不得发表任何声明。

- ×××先生应维护兴业银行、其下属子公司及其员工、领导与投资者的形象与声誉。不得散布有可能伤害他们形象与声誉的言论，不得策划、参与有可能伤害他们形象与声誉的举动。

相应的，兴业银行承诺，绝不伤害×××先生的利益。

必须特别强调，上述条款是本协议的先决条款。违反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影响本协议的最终执行。

### 3. 双方和解及其机密性要求

3.1 除出于法律方面的必要，协议双方不得透露协议内容。鉴于维护双方形象与声誉的需要，协议双方不得对本次离职发表任何公开评论。

双方达成一致共识，机密性是本协议的先决条件，如不遵守此项要求，则本协议无法达成。因此，一旦违反此项要求，本协议即告失效。

- 3.2 本协议是在《民法》第 2044 条及其以下条款框架下达成的双方和解协议，必须特别遵守第 2052 条的要求，该条条款内容如下：

“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法律效力不因协议中的法律性错误或某一方显失公平而受影响。”

2008 年 9 月 3 日，巴黎

本协议一式两份

签名：×××

签名：×××

## 文件 4 解聘协议书 2 号

致×××先生

本协议以挂号信的方式送达

巴黎，2008 年 5 月 19 日

先生：

此前，我们已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做过一次面谈，现通知你，兴业银行决定将你解聘。

解聘的原因是失职。

此前，你在 Delta One 小组工作，担任交易员。



你应该对交易的管理与执行时刻保持警醒，做到精益求精。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07年12月19日，有若干笔交易本应计入你的某位同事的账户（即热罗姆·凯维埃尔的账户），但你却任由他把交易记在你的账户上。

随后，你又允许他将一笔巨额收益（10亿欧元）放在你的户头上。

你向我们解释说，曾经收到指令（中台曲解了上层的指令），准许你这样操作，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你满足于这种说法，而且没有将此事通报给上级。这说明你玩忽职守——起码是缺乏批判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接着，2007年12月20日，你又任由同事将数笔保证金存入你的一个户头，并且在24日分两步将其删除。这件事又进一步说明你在工作中是如何放纵。

再后来，2008年1月3日，你又将几笔交易放进你的户头，以此将2007年的业绩挪到2008年。照你的说法，是为了应付“业绩检查”。

这说明你连最起码的谨慎意识都没有。

更为严重的是，整个过程中你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透明操作的作风也被你抛到了脑后。

你缺乏职业精神，扰乱了管理秩序，使得公司无法正确统计每位交易员的贡献率，严重降低了交易的可追溯性。

身为交易员，你的交易应当透明，作风应当严谨。而你的所作所为却与之格格不入。

面对这样严重的失职行为，兴业银行不得不启动解聘程序。

此前我们已经召集你做了面谈。

面谈已于4月29日举行，公司向你通报了终止劳动合同的理由，也倾听了你的意见。你的辩解尚不能使我们改变主意。

因此，我们不得不撰写此信，将解聘的消息通报给你。

从你签收本协议书的次日起，你将获得3个月的解聘提前通知时间。这3个月结束之后，解聘将正式生效。当然，你也可以在签收之后10日内，申请复核，也可以委派代表或者请工会组织出面申请复核。

在本协议书正式生效之前，你可以继续领取薪金，薪金额度比对参考薪金确定。

提前通知期结束之后，你将领到剩余的薪水，同时还将向你颁发工作证明和工商就业协会证明。

依照《劳动法》第93-6条，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你有权获得80小时的就业培训。

如有此需求，请在提前通知期结束之前提出申请。除提供培训之外，还将为你开具能力证明和培训经历证明。

有关培训的其他条款，请查看协议书的附件。

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兴业银行投资银行部

## 和解协议

甲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38 409 055 欧元；

注册地点：巴黎；

注册号：B 552 120 222；

公司总部地址：巴黎，75009，欧斯曼大道 29 号；

甲方代表：×××（职务：人力资源主管），全权负责处理本事务；

乙方：××× 先生。

双方就以下问题展开了谈判：

## 1. 事实

乙方（×××先生）自 2001 年 1 月 11 日起，受聘于兴业银行。

事发时，乙方分属 Delta One 小组，担任交易员。

兴业银行指控乙方工作不够严谨、透明，在日常操作，尤其在账目管理、交易结算中常有疏忽之处。

上述情况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公司决定对乙方启动解聘程序。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1 日以信件的方式通知乙方参加解聘面谈。面谈最终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举行。

乙方于 2008 年 5 月 23 日收到公司发出的挂号信。至此，乙方因失职正式被公司辞退。

## 2. 乙方立场

乙方告知兴业银行，他认为解聘不符合程序规定，与事实情况不符，并且对他的职业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

乙方对兴业银行提出的解聘理由表示抗议。乙方否认在工作中有放纵表现，对失职一说提出了反驳。

乙方指出，在此之前兴业银行从没有对他有过任何指责，银行让他独当一面，这是对乙方能力的有力证明。

乙方辩解称，他让同事把交易记在自己的账目里，绝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乙方指出，登录有关交易时，他本人的年度评定已经结束了。

乙方称，因为交易转移是在同一组织之内发生的，所以对整个架构并无影响。乙方提醒说，他的上级在年终时也核准了相关操作。

乙方称，相关操作在兴业银行内部是家常便饭，银行之所以以此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其实只是受了年初事件的影响。

乙方还指出，公司的解聘行为对他造成了极大伤害，将使其处境艰难，并且难以找到工作。

乙方提出，无论如何，公司没有理由扣留 2007 年的年终奖金。

乙方称，他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的陈词。

乙方认为，公司的解聘行为不符合程序规定，没有事实上的正当理由，在职业前途上、物质利益上和精神上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乙方要求兴业银行支付年终奖金，并且赔款弥补他的损失。

### 3. 兴业银行的立场

兴业银行认为，对乙方的指控完全属实，由此作出的解聘决定无懈可击。

兴业银行称，乙方工作不够严谨、透明，相关情况完全属实，且有据可查。

兴业银行指控，乙方不仅任由某位同事将部分交易转移到乙方的账户，还隐瞒了相关交易的巨额收益。

兴业银行同时指出，巨额的保证金往来、分步骤将相关信息删除、隐瞒业绩留到下一年度，这些都不是正常操作。

兴业银行坚持认为，乙方从来没有将有关交易通告其上级，而从交易信息上来看，似乎上级已经知情。

兴业银行指出，上述情况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无法容忍。

兴业银行认为，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必须解除。乙方提出，银行之所以以此为理由终止劳动合同，其实只是受了年初事件的影响。对此，银行表示严重抗议。

兴业银行认为，考虑到截至 2008 年年初的各种情况，乙方的业绩数据不准确，存在严重偏差，因此乙方无权获得年度奖金。

银行特别强调，上面所讲的一切均有依据。

最后，双方多次接触，在两方顾问的介入下互相作出让步，确定了以下和解条件。

## 1. 界定离职的性质

### 1.1 双方商定，×××先生的终止劳动合同提前通知期已于 2008 年 8 月 24 日晚结束。

在此期间，×××先生不得履行其工作职责，但仍然可以按照正常标准领取工资。截至目前，工资已经领取完毕。

### 1.2 兴业银行以结余款项的名义，向×××先生发放以下款项：

- 截至 2008 年 8 月 24 日，×××先生有当休未休的“带薪休假日”共计 33.5 天，折合补偿金 7 491.15 欧元；
- 按照规定，截至 2008 年 8 月 24 日，×××先生本应享受“半工作日休假”总计 2.5 天，折合补偿金 579.41 欧元；
- ×××先生的“时间储蓄账户”中共有 30.24 天，折合 4 978.73 欧元；
- ×××先生的“工作日时间储蓄账户”中共有 15.5 天，



折合 3 595.10 欧元；

- 超时工作共计 22 天，折合 5 608.67 欧元；
- 年底双薪补助 3 251.65 欧元。
- 按规定，支付解聘补偿金 16 312 欧元。

(前 6 项款项需要扣除相应的社保费用。)

1.3 ×××先生不得与其交易对手形成竞争关系，为此，从 2008 年 8 月 24 日起，×××先生每月可以从交易对手处领得补助金 5 022 欧元。本项禁令将于 2008 年 10 月 24 日解除，届时补助金也将停止发放。

1.4 为避免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再次发生争端，兴业银行愿意弥补×××先生所提出的若干损失，将向其一次性支付和解补偿金共计 599 160 欧元。

按规定，必须从这项补偿金中扣除社会债务公摊费等社保性费用。

扣除相关费用之后，补偿金净值为 541 575.51 欧元。该笔款项将在协议书签字当日发放给×××先生。

1.5 最后，为帮助×××先生重新就业，兴业银行将向其指定的事务所支付 15 000 欧元补助金。

## 2. 双方的义务

2.1 ×××先生承诺，最迟于 2008 年 8 月 24 日前将其掌握的所有与兴业银行有关的文件、资料上交。

2.2 ×××先生确认，本文件第 1 条中所列举的款项已经涵盖了他在兴业银行任职以来能够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获取的全部金额。

×××先生宣布，今后绝不向兴业银行及其下属子公司

索取任何形式的实物或现金（包括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津贴、补助、期权、股权，以及各种形式的补偿金，如提前通知期补助、带薪假期补助、解聘补助、损失补助等）。

- 2.3 除本文件第 1 条中所列举的款项外，×××先生承诺，不以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领导主张任何形式的权利，也不提起诉讼。

×××先生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尤其不得提供证据）任何针对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领导的诉讼行为。

相应的，在×××先生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兴业银行绝不以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先生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

- 2.4 ×××先生承诺不伤害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领导的利益。

承诺如下：

- ×××先生任职期间，曾有机会掌握公司信息。离职后，应严格遵守保密要求，不得泄露有关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的信息。
- 不就离职情况与在兴业银行的工作情况发表任何评论，也不发表任何声明。
- ×××先生应维护兴业银行、下属子公司及其员工、领导与投资者的形象与声誉。不散布有可能伤害他们形象与声誉的言论，不策划、参与有可能伤害他们形象与声誉的举动。

相应的，兴业银行承诺，绝不伤害×××先生的利益：

— 不就离职情况与在兴业银行的工作情况发表任何评论，也不发表任何声明。

— 不散布有可能伤害×××先生形象与声誉的言论，不策划、参与有可能伤害×××先生形象与声誉的举动。

必须特别强调，上述条款是本协议的先决条款。违反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影响本协议的最终执行。

### 3. 双方和解及其机密性要求

3.1 除非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和社会机构有所要求，协议双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协议内容。鉴于维护双方形象与声誉的需要，协议双方不得对本次离职发表任何公开评论。

双方达成一致共识，机密性是本协议的先决条件，如不遵守此项要求，则本协议无法达成。因此，一旦违反此项要求，本协议即告失效。

3.2 本协议是在《民法》第 2044 条及其以下条款框架下达成的双方和解协议，必须特别遵守第 2052 条的要求，该条条款内容如下：

“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法律效力不因协议中的法律性错误或某一方显失公平而受影响。”

2008 年 10 月 1 日，巴黎

本协议一式两份

签名：×××

签名：×××

5年监禁、49亿欧元罚款，罚金要超过170000年才有望  
“偿清”，创下法国历史上对个人罚款金额之最——全球银  
行业最大规模违规操作欺诈案终于尘埃落定。

一个毕业于法国三流商学院的年轻人，要如何绕过5道安  
全控制系统和由2000多人组成的庞大监控网，在短短几个  
月内，用49亿欧元在股指期货市场上豪赌并输掉49亿欧元？  
这是法国银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欺诈案？

事发后，有人说他“性格阴沉，是个电脑天才”，有人说  
说他“聪明，有点像汤姆·克鲁斯，比较听老板的话但并不  
是电脑天才”；有人说他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有人说他“无意间成了拯救世界经济的英雄”。

这名才30岁出头的法国交易员足以使搞垮英国巴林银行  
的尼克·李森相形见绌。他到底是金融体系的“替罪羔  
羊”，还是臭名昭著的“魔鬼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  
将在本书中揭示真相，为你呈现交易员世界的纷繁乱象和庞  
大金融体系的黑暗内幕。

# L'ENGRENAGE MÉMOIRES D'UN TRADER

上架建议：投资理财

ISBN 978-7-5442-5791-6



9 787544 257916 >



定价：29.80元